

列寧著

兩個策略

卜世畸譯

Н. ЛЕНИН (В. И. Ульянов).

ДВЕ ТАКТИК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И В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еревод с русского
Е. ПРОЛЕТАРИЕВА.

Издание Ун-та Трудящ. Китая им. СУН ЯТ-СЕНА. 1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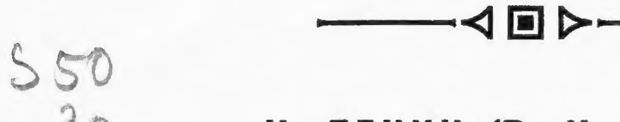
3023

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列寧著

兩個策略

卜世畸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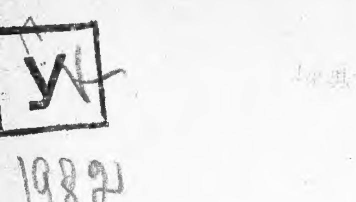
Н. ЛЕНИН (В. И. Ульянов).

ДВЕ ТАКТИК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И В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еревод с русского
Е. ПРОЛЕТАРИЕВА.

Издание Ун-та Трудящ. Китая им. СУН ЯТ-СЕНА. 1927.





Стеклография Ун-та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им. Сун Ят-Сена. Москва, Волхонка, 16.

Главлит 91021. УТК № 730. Тираж 1000.

I

譯者序

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個策略：一個是孟塞维克的机会主义的策畧，一個是波塞维克的馬克思主义的策畧。前者对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持的態度是对岸觀火的，是从旁来推促資產階級去革命的，是害怕資產階級离開革命，因之而自己（無產階級的政党）不採取堅決行動的；後者是主張積極参加革命的，是主張堅決行動的，是主張取得革命領導权，達到工農革命的民主專政，以澈底完成民主革命的。

中国現在还是经过着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已招局部的失敗。这个失敗当然由中国共產党过去的指導者負一部份的責任。如為着保存與資產階級的联合战綫，怕資產階級离開革命，致不決心加深農村革命，不堅決的進攻（尤其在武漢政府將叛变的時候）等，这種錯誤，很使我们回想起一九〇五年新„火星”報在策略上的錯誤，也可説是中国的„新孟塞维克主义”。我们知道，固然在共產国际的指導之下，中国同志过去所犯的錯誤已正在这裏改正，但这并不是説中国„新孟塞维克主义”的傾向，從此就完全消滅了，用不着我们去與它鬥爭了。我们知道每个革命党裏的机会主义的傾向不是偶然的，是有其社会基礎的，現在中国共產党内的机会主义的傾向不是例外。我相信我们從今以後與中国机

会主义鬥争的責任，是一個理論上重大責任，也不是一二日内所能觧决的責任。

列寧的这本偉大著作，給我们與中国机会主义鬥争的重要武器之一。故我们把它趕快的譯出来了。

為明顯起見，多数專门名詞下曾載有譯者附註。因為倉忙的原故，許多專门術語都未仔细去斟酌，語氣上想亦不免錯誤。希望同志们讀時把翻譯的錯誤指示出来，以便于日後用鉛版付印時，能夠改正。

士畸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正誤表

頁	行	誤	正
1	23	„團体"	„社会"
9	6	绝不相容易仇視的党	绝不相容且仇視的党
11	3	普通直接選挙制的標準	普通直接選挙制為標準
20	6	在口实上	在口頭上
21	13	他们完了	他们忘了
24	4	辭譯	辯釋
30	7	難同情	難回情
31	15	為應持	而應持
32	14	的(声不响!)	的一声不响!
32	20	(参阅„解放社"的政党)	(参阅„解放社"的政綱)
34	2	尾巴不可	尾巴了
38	2	不経过資本主义	不経过这个資本主义
39	16	三人们	工人们
42	6	指時出	指明出
49	13	梅林報	梅林格
53	15	代那个	把那個
56	16	模仿経済派	描寫它傾向於経済派

IV

頁	行	誤	正
58	3	什么負責	什么不負責
65	9	对傑有过	对你们有过
68	20	斯先生不久以前曾把欧洲資產階級的机関報"法国報"	不久以前欧洲資產階级的机関報"法国報"曾把斯先生这樣称呼过
69	19	己再成了	己弄成了
72	13	米里蘭主义	米勒蘭主义
73	1	自下而下	自下而上
73	17	上書建設	上書建議
80	14	重新發生原則向題	重新發生後原則向題
84	17	但这不是不	但还是不
91	20	誠心建設	誠心建議
98	2	法蘭克府	佛蘭克府
100	12	只有它無远近的	只有它能無遠近的
101	12	甚到與無產階级	甚致與無產階级
110	8	不要使資產階级	致不使資產階级
115	15	逮住自己	縛住自己
125	15	卡托龍策難赤	别德龍怯維
144	9	基礎上社会主义	基礎上為社会主义

民主革命中的两個策略

序

革命時期中，事变的發生異常迅速，給革命党以鑑定策略口号的新材料亦異常之多，使我们很难来得及一一去考究。此書是在偶鉄史（Одесса）城事件發生以前脫稿的。我们不已經在„無產者"第九期中（„革命的教訓")說过嗎，那些事件甚致使創造爆動过程論（Теория восстания—процесса）和反对宣傳臨時革命政府的社会民主党員都已在事实上变到或已开始变到自己的反对党方面去了。革命教訓這樣迅速這樣澈底，自然是平時政治生活中所感覺不到的。尤其重要的是這個革命的教訓，不僅是教訓首領，且是教訓群众。

革命將教知俄国工人群衆以社会民主主义，這是毫無疑义的。革命將証实社会民主派党綱和策略之正確，表明社会各階級之本来面目，表明現代德謨克拉西之資產階級性和農民所懷之真正的願望，就是這个農民的革命性是帶着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色彩的，其將来思想上的傾向不是什么„社会化"（«Социализация»），而是農村資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之新的階級鬥爭。從前民粹派的夢想，現在还遺留在„社会革命党"的党綱草案中，如他们对于俄国資本主义的發展，对于我们的„團体"的民主主义，对于農民暴動完全勝利的意义等

等问题無處不显露出民粹派的頭角，這些夢想定然将為革命掃尽無餘。革命定然将授社会階級以真正的洗禮。這些階級離開革命時是将帶着一定的政治面目的，牠们不但在牠们的党綱和政治口号中表現出牠们自己的思想，而也且将在群衆底公開政治行動中表現出牠们的原形。

革命能教訓我们，能教訓群衆，這是無疑义的。但現在在革命政党前面的问題是，我们能否教訓革命以一点别的東西？我们能否運用社会民主主义學說的正確和我们與無産階級（唯一澈底革命的階級）的联系，俾革命因受着無産階級的影响，实际上能繼續到真正的勝利，使資産階級的不澈底性動摇和叛变能不發生作用呢？

我们應注全力以求達到上述之目的。而達到這目的，一方面要靠我们对于政局觀察的正確，我们在策畧上口号的正確；另方面，要靠工人群衆以实际力量对于這些口号之擁護。本党各机関和各組織已在日常工作中，如宣傳鼓動和組織各方面已力求擴大且鞏固我们與群衆的関系。這種工作在任何時候都是必要的，可是在革命的時期，這種工作可比任何時候都感覺得不够。因在這種時期，工人階級自動的起来作公開的革命鬥争，我们應将這種争鬥的責任正確的規劃出来，便使這些責任得尽可能的普遍于群衆，使牠们認識，使他们瞭解。对于我们與群衆联系而發生的悲觀主义，特别是現在，常々掩蔽了对於無産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資産階級的見解，這種情形我们不要忘却了。我们对于訓練工人階級與組

織工人階級還有許許多多的工作要做，這是無疑义的，不过現在的全部问题是在這個訓練和組織工作的主要政治重心点應該在什么地方？是在職工联合会和其他公开的社团呢，还是在武装暴動和事实上建立一革命的軍隊與革命的政府呢？在這两種情形之下，工人階級都得受訓練和組織，這两種办法自然都是必要的。但是現在的全部问题（在目前的革命中），是在我们訓練工人階級和組織工人階級的重心点應該在什么地方，在前者呢，还是在後者？

革命的結局如何，要看工人階級的作用如何，為資產階級助手，那時論力量它能給專制政府以大打擊而在政治上將無能為力还是為民衆革命的指導者。資產階級中之覺悟的份子，对這一点異常明瞭。故„解放”報這樣誇獎社会民主派中之亞坡瑪夫派與„經濟派”，因他们把職工联合会和公开的社团看作是現時第一重要工作。故斯脫盧威先生重視（見„解放”第七十二期）新„火星”派中亞坡瑪夫一流人之原則的傾向。故斯先生对于俄國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的决議認為是一種革命的狹隘傾向，拼命攻擊。

社会民主派在策畧上正確的口号，对于現在指導群衆有特別重大的意义，在革命時期中而輕視原則上正確的策畧口号之意义，這是最危險沒有的事。如„火星”報一〇四期实际上已变到社会民主党中之反对派方面了，但同時，对于实际生活，指示革命運動道路的口号和策畧

上的決議却藐視其意义，以為会發生許多失敗和錯誤，相反之，一個要在馬克思主义的正確原則上去指導無產階級的政党不僅止跟着事变的發生而隨風漂蕩，而要採取正確的策畧上的决議，实有莫大的意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的決議案中和由這党分裂出来的部份份子所開臨時大会的決議案中，我们看見一些當上的長年實經用很費了思索且最精確最完滿的語句表現出来，這些見解不是出于一般臨常著作家之口，而是無產階級的代表社会民主派之負責者所通过的。我们的党是先于其他一切政党的党，有精確且為全体党員所通过的党綱。它于自己策畧上的决議應事实上發嚴厲的態度，以為其他政党之模範，以别于民主資產階級之机会主义的"解放"賴和社会革命党之口頭上的革命談，——他们平日不做事，到革命的時期来「抱佛脚」，才提出党綱"草案"，才開始研究他们目前經过的革命是否為資產階級的革命等問題。

因此，我们認為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及臨時大会関于策畧問題決議案之澈底的研究，对于這些决議案之离開馬克思主义原則的分析，对于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之具体任務之說明，為革命的社会民主派目前急需之工作。為適應這需要，故作此書，且对于要想不僅止在口头上鶯難，而在实际上準備一致的策畧以作俄國社会民主工党將来完全統一之基礎者，以馬克思主义的原則和革命的教訓為立場来檢驗我们的策畧亦有必要

著者 一九〇五年七月

第一節 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

我們目前所處的革命時期有一個問題，就是召集國民大会的問題。這問題應怎樣解決，意見極不一致。現在正形成三種政治傾向，即：(一)「沙皇」政府承認有召集国民大会之必要，但極不願意這個大会成為一個全民的立憲大会。若按報紙所載関于「清力根委員会」(註一)的消息，似乎「沙皇」政府所同意的会議，是在选举的時候不準宣傳自由，选举的資格必須以財産之多寡，教育程度之高低，或以狹隘的階級制為標準(註二)。(二)革命的無產階級，既受社会民主派之指揮，則要求全部政权交与民立憲大会，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僅要達到普通选举权，亦不僅要達到宣傳之完全自由，而且要達到從速推翻「沙皇」政府，代之以臨時革命政府。(三)自由資產階級，拿所謂"立憲民主党"的首領做工具以表示自己的願望，不要求推翻「沙皇」政府，不主張臨時政府的口号，致怎樣保証选举完全自由且正確，怎樣保証代表大会，使之成為真正全民的代表大会，使之成為真正立憲的代表大会，這些問題的实际办法是自由資產階級所不主張的。实际上，自由資產階級是現在"解放"派唯一的社会力量，它只想使「沙皇」與革命民间衆之政权問題，尽可能的和平解決，同時，這種和平解決的結果，要使資產階級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多，而

革命的民衆（無產階級與農民）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少。

〔註一〕「蒲力根委員会」成立于一九〇五年夏天，其責任在起草関于国会的法律。至革命潮流高漲時這些法律的草案已被破滅無餘。——譯者。

〔註二〕狹隘的階級选举制是指选举的時候，除上層階級外（貴族，商人，神父等），其餘無被选举权。——譯者。

這就是目前的政治状况，也就是根源俄国現社会的三種主要力量而產生的三種政治傾向。„解放”派怎樣用德謨克拉西的辞句以掩蔽自己叛変和賣革命的政策，這問題已在„無產者”〔註一〕報上（第三，四，五期）屢次論及。我們現且来分析一分析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怎樣的估計目前的責任。在這一点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註二〕和由本党分裂出来的一部份份子臨時大会所通过的両個決議案為最好的材料。這両個決議中那一個观察目前的情形較正確，那一個規定無產階級的策略較正確，這問題实有重大的意义，且每一個社会民主主义者，若要有覺悟的执行宣傳鼓動和組織的工作，都應徹底瞭解這問題，致不涉及問題本身的事情應完全不理。

〔註一〕„無產者”是俄国「布尔塞維克」派的報紙，于一九〇五年五月十四日在瑞典的京城日内瓦出版至同年九月十二日停版。——譯者。

〔註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三次大会是于一九〇

五年五月在倫敦举行的，僅「布尔塞維克」派到会，「孟塞維克」派拒絕参加，却于同一時向自己在日内瓦独立举行臨時大会。——譯者。

党的策略是政党政治行為的方向和方法。党的大会採取策略上的决議，為的是要適應某種新的責任或某種新的政治情况，俾全党的政治行為有所準繩。已經开始的俄国革命已造成一新局面，這新局面，就是絕大多数的民衆表示絕对不能與「沙皇」政府相容。目前的新问題是拿什么实际方法来召集真正的全民代表大会，真正的立憲代表大会（召集這種大会，理論上，社会民主派已先于其他各政党，早在自己的政綱中正式規定了）。民衆若已經表示與現政府不能相容，且覺悟到有建造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則以推翻現政府為目的的党就應当想想，拿什么政府来代替舊政府。因此，現在的新问題是臨時革命政府的问題。為对于這问題有完滿的回答，覺悟的工人階級的政党應当明瞭：(一)臨時革命政府在現時革命中以及無産階級的全般奮鬥中有何意义，(二)工人階級自身與臨時革命政府的関系，(三)社会民主派参加臨時革命政府之確当的条件，(四)如社会民主党不参加臨時革命政府，則自下而上的威逼条件如何。祇有明瞭這些问題後，本党目前應持的態度才得正確且明顯而不動搖。

我们現在且將〃关于臨時革命政府的决議〃録下，俾知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对于上述各问題是怎樣解

决的。

「関于臨時革命政府的决議案

(一) 為獲得最近将来的利益與達到社会主义的終極目的，無產階級要求在政治上尽可能的完全自由，因此要求推翻專制政府，代以民主主义之共和政府。

(二) 要使民主共和政体实現于俄国，只有民衆暴動勝利的結果才有可能，民衆暴動之機関為臨時革命政府，只有這種政府才能保証选举国民代表之宣傳自由，並以普通直接选举制為標準，規定不記名投票法，召集真能代表民意之国民大会。

(三) 此種民主革命行于俄国社会經濟制度之下，非但不致使資產階級之統治趋于衰弱，而反使其強大。資產階級于相当時期，必不顧一切以圖尽可能的奪取無產階在革命時期已得之勝利。

因上数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特决議如下：

(一) 必須在工人階級中对于革命必經之行程為具体之宣傳，且指明于相当的時候有產生臨時革命政府之必要，無產階級向這個政府的要求，便是实現本党党綱中最近将来的政治與經濟的要求（最低限度的党綱）。〔註〕

(二) 以实力之分化和情勢之变迁（現在还不能確实說定怎樣变迁）為轉移，本党得派全权代表参加臨

時革命政府，其目的在猛烈反抗各種反革命的陰謀，並主張工人階級的特殊利益。

(三) 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必須条件，是党对自己全权代表之嚴厲監督，和社会民主派独立地位之完全保持，因社会民主派是要完成社会革命的党，它是與其他資產階級政党絕不相容仇視的党。

(四) 不管可能參加臨時政府與否，本党應号召受本党指揮之武裝的無產階級隨時威逼臨時政府，并將這種必要向工人群眾為普遍的宣傳，以達保持革命已得之勝利並擴大其之目的。』

[註]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一九〇三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党綱曾分為兩部份，即〝最低限度的党綱〞與〝最高限度的党綱〞是。最低限度党綱的要求是当時最近將來的要求，即推翻專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普及教育，教堂離政府独立，八小時工作制，劳動保護法的頒佈，罷工，集会，結社等自由之確定……。最高限度的党綱是以剷除資本制度達到社会主义為終結目的，实現這個目的的主要条件即無產階級專政；俄国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即將這个主要条件实現了。——譯者。

第二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関于臨時革命政府的决議給我们以什么？

俄國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所通过的决議，按其標題，即可知道全部都是関于臨時革命政府的問題，這就是說，社会民主派之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是大会问题的一部份。另方面，這裡的问題僅祇是関于臨時革命政府的问題，而不是関于别的政府的问题；故関于„奪取政权”等一般的问題這裡毫未涉及。第三次大会把„奪取政权”等一般的问题放在一边不提，是否正当呢？当然是正当的，因為俄國目前的政局对于這一類的问題絕不要求馬上解决。反之，现在被全民众提出且要馬上解决的问題，是推翻專制和召集立憲大会。党大会提出来要解决的问題，不是一般著作家偶然説及或不偶然説及的问題，而是因目前的条件和社会發展之客观行程致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的问題。

臨時革命政府在现時革命中和無產階級的一般奮鬥中有什么意义呢？上述第三次大会的决議案首先就解答這问題，指明以„最近将来的利益”為观点，以„社会主义的終結目的”為观点都必須„政治上尽可能的完全自由”。而達到政治上的完全自由，與本党党綱所承認者一樣，必須以民主的共和政体代替「沙皇」專制政体。大会决議案中特别注重民主共和政体的口号，這在邏輯上與原則上都是必要的，因為無產階級（為德謨克拉西而奮鬥的先鋒隊）在這次革命中所要達到的就是政治上的完全自由。此外，特别注重這個口号在现時尤為必要，因為现在頂着民主主义旗幟在社会舞台上高唱的正有不

少的保皇派，如所謂„立憲民主党”或„解放党”是。要建立共和政体，自然須要有民衆的代表大会，同時，必要是全民的代表大会（以普通直接选举制的標準，并規定不記名投票法），立憲的代表大会。這在上述决議案中已是承認。不但如此，要建立一„真能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僅只叫這代表大会為立憲大会还不夠；必須使這大会有权力来„立憲”。决議案因覚悟到這点，故不僅限于„立憲大会”之形式上的口号，而且加以实际的条件，使這個大会真能执行自己的責任。這種条件的指示使口頭上的立憲大会能在事实上成為立憲的大会是必要的，因為自由資產階級（如君主立憲党）總是有意的曲解全民立憲大会這口号，使這口号成為口頭的空話。

上面這個决議案說，要保証选举国民代表之宣傳完全自由，并召集真能代表民意之大会，只有組織臨時革命政府才有可能，且這個政府要同時成為民衆暴動机關的政府。這話对不对呢？誰想否認這是对的，他便應当認定「沙皇」政府是不会跑到反動方面去的，它能在选举的時候保守中立，且能注意求得真是表示民意的大会。這種論斷謬誤至極，無論誰都不敢公開起来擁護，可是我们的„解放党”却拿着自由的旗幟，正在暗地裏照這種論斷行事。立憲大会應由誰来召集，选举的自由與正確應由誰来保証，对于這個大会的權权應由誰来委托，——這些都非革命政府不可，它是暴動的机關，它能很誠懇的求其实現，并有力量以求其实現。「沙皇」

政府将必然的反对這種办法。自由資產階級的政府正與「沙皇」分肥去了，它不依靠民眾的暴動，不誠心要想国民会議，縱或誠心想要這種会議，也不能具体的促其实現。所以本党所提出来的民主主义的口号是唯一正確的口号，是完全澈底的口号。

但是估計臨時革命政府之意义的時候，若不注意到民主革命的階級性，便要錯誤。因此，决議第三条說，民主革命将使資產階級的統治强大起来。這是現時資本主义社会經濟制度下必然的現象。但是資產階級对政治上稍為自由的無產階級之統治愈增强大，則前者後者之向争奪政权的鬥争必然日加激烈，而資產級階„奪取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已得勝利”之企圖亦必日無忌憚。所以無產階級站在各階級之前，且領導各階級為民主主义而争鬥，同時，对于資產階級民主主义中所包含的新矛盾和新鬥争，不可一刻置諸度外。

這樣，决議案中関于臨時革命政府的意义一部份，我们已分折完滿：臨時革命政府與争取自由和共和政体的関系，臨時革命政府與立憲大会的関系，臨時革命政府與發展新的階級鬥争之民主革命的関系，——這些都已說过。

其次的问題，就是無產階級对于臨時革命政府之一般的態度應該怎樣？大会决議案這回答问題，首先即謂要在工人階級中宣傳臨時革命政府之必要。工人階級應該覚悟到這種必要。„民主主义的”資產階級对于推翻

「沙皇」政府的问題總是不顯明的提出来，在這時候，我们應把這问題看作是目前的第一個重要问題，并主張臨時革命政府之必要。不但如此，我们还應為臨時革命政府指出一個合于目前歷史客現条件，且合于社会民主派目前責任之行動的政綱。這個政綱，即本党的全部最低限度党綱，亦即本党最近將来全能見諸实現的政治要求與經濟要求，這是一方面，根拠社会目前經濟関系的必要，另方面，為今後的鬥爭起見，為实現社会主义起見，這都是不可少的要求。

這樣，大会决議案对于臨時革命政府的性質和目的都已完全解釋。按其產生及其根本性質，這種政府当為民衆暴動的机関。按其形式上的意义，這種政府当為召集全民立憲大会的工具。按其行動上的内容，這種政府應当实現社会民主党最低限度的党綱，因為只有這個党綱能夠保証革命民衆反对專制的利益。

有人可以反駁說，臨時政府既為臨時的，便不能实行積極的党綱，还未為全民確認的党綱。這種反駁僅只是反動派的一種詭辯法。所謂不实行什么積極的党綱，就是說要忍耐專制下的農奴制度。能夠忍耐這種制度的只有对革命事業变節的政府，而不是為民衆暴動机関的政府。若是現在有人藉口謂立憲大会也許还不能承認集会自由，故提議在立憲大会未承認集会自由以前不要在事实上实現集会自由！這是一種滑稽，只可当笑話說。又有些人反对以臨時革命政府来從速实現最小限度党綱

这也是同样的滑稽。

還有一点，就是這個决議案只說臨時革命政府的責任是在实行最小限度的党網，這樣一來，便把那些要熱于实現最高限度党綱和熱于要奪取政权以行社会革命之半無政府的思想，一概撇開了。俄国目前経済發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無產階級的覺悟與組織程度（與客观条件緊相聯連的主观条件）使工人階級一時徹底解放成為不可能的事。祗有那般最唱高調的人，能把現時民主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性質置諸度外；只有那般最無聊，最作樂观夢的人，能不顧到目前的工人群衆是如何还不瞭解社会主义的目的，及其实現的方法。但是我们相信，工人解放只有是工人自身的事情才有可能；若群衆無覺悟與組織、無準備與訓練，無反对資產階級之公開的階級鬥爭以鍛煉自身，則社会革命，簡直無從說起。对于那些帶着無政府性質的反对，以為我们似乎停滯了社会革命，我们要回答說：我们并不是停滯社会革命，而是采用唯一可能的方法與唯一正確的道路，即民主共和政体的道路以实行達到社会革命的第一步。凡要想達到社会主义而不想経过民主政治的人，他無論在経濟上和政治上都会必然的走到反動的結論上去。若是有工人份子在相当的時候向我们：為什么我们不实行最高限度的党綱呢？我们便要回答他们，指明現在帶着民主主义色彩的民衆是如何的見外于社会主义，階級矛盾是如何的还不显明，工人群衆是如何的尚欠組織。你们去把全俄数

千百万的工人組織起来吧！把自己的黨綱去向他們宣傳，以起他們对于這党綱的同情吧！你們只試々去幹這事，不要徒在口頭上說些無政府党的話語，那便即刻覚得，要实現工人群衆的這種組織，傳佈社会主义的理論，在在都需要尽可能的完滿实現民主主义的改革。

臨時革命政府的意义，以及無產階級对它的関係既已解释瞭白，便發生這樣一個问題，即可否参加臨時革命政府和参加的条件如何（自上而下的動作）？自下而上的動作又当如何？上項决議案对于這兩个问題都有正確的回答。对于前一问題，議案中肯定的說，社会民主派参加臨時革命政府（在民主革命和爭得共和政体的時期）在原則上是許可的。這種態度，使我們與原則上反对参加臨時革命政府的無政府主义者截然不同，且與社会民主派中之尾巴主义者（如馬丁諾夫及「新火星派」之流）恐嚇我們，謂将来或者可有参加臨時政府之必要的論調亦显然有別。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的這種態度，同時把新„火星報”以為社会民主派之参加臨時革命政府是一種米勒蘭主义的变形，如資本制度之神圣不可侵犯一樣，為原則上所不許可等一類的意見也完全推翻了。

但是僅說原則上是許可的问題，自然还沒有回答這種参加在实际上有何益处的问題。在些什么条件之下才能使本党大会所承認的新的鬥爭形式（即自上而下的鬥爭形式）成為有益的鬥爭形式呢？具体的条件，如各階

級力量的相互關系等問題，自然現在 能說定，决議案也自然不能將這些条件預先一一定妥。具体的问題必須按具体的情勢来决定，任何聰明脚色也不敢預下斷語。但我们参加臨時革命政府的性質與目的可以預先規定，并且應当規定，所以議案中指明下列两个目的：(一)猛烈反抗各種反革命的陰謀。(二)主張工人階級的特殊利益。自由資產階級喜談反動的心理（見„解放”第七十一期，斯脫盧威之„一封公開的信”），想藉此以恐嚇革命的民眾，并引誘他们对專制政府讓步，——在這種時候，無產階級的政党方面應特別覺醒民眾，不要讓忘記與反革命真正宣战的責任。要解决政治自由與階級鬥争的偉大问題，結果非武力不可；我们應注意這種力量之準備與組織，以便不僅為消極的防禦，且為積極的進攻。從「巴黎公社」(註)起，歐洲即為反動局面所籠罩，我们的思想方固之太專注于„自下而上”的動作，使我们所眼見的鬥争亦太祇限于防禦性質的鬥争。現在不同了，我们現在所處的時期已是一新時期，即政治已開始恐慌和革命已開始發展的時期。我们處在這樣時期的範圍，自然不能「仍舊慣」，「食古不化」了。我们必須宣傳自上而下的動作，必須準備激烈的攻擊動作，并且必須研究這種動作的条件和形式。那些条件自然很多，上項决議案把其中的重要者提出了两点，其一是関于社会民主派参加臨時革命政府之形式方面的条件（党对自己全权代表之嚴厲監督），其二是関于這種参加之性質方面的条

件（時刻注意完成社会革命的目的）。

〔註〕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号，正值普德战争　巴黎無産階級乘机奪取政权，建立工人政府，「巴黎公社」之產生即源于此。因自身無堅固之組織，亦無政党之指揮，「巴黎公社」存在僅七十二日，即為資産階級所征服。工人死于是役者達二万五千，充軍者万五千餘。「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法蘭西及其他国家的政府為是役所驚慌，乃大举反動，对自己国内之革命運動压迫不遺餘力。——譯者。

這樣，在„自上而下”的動作之下（差不多是空前未有的新鬥爭方法）党的政策，應該如何，上項決議案已從各面解釋明白了。不但如此，大会決議案还觀察到自上而下之動作若不成功時的办法，即自下而上的威逼臨時革命政府，是我们隨便什么時候都不應放棄的。為要实行自下而上的威逼，無産階級必須武装起来（因在革命時期中的民衆運動能特别很快的変到直接的国内战争）并受社会民主派之指揮。無産階級武装威逼之目的，在„保持，鞏固且擴大革命之勝利”，以無産階級的利益為觀点，這些勝利應為本党全部最小限度党網之实現。

对于第三次大会関于臨時革命政府決議之簡畧的分析，我们就此停筆。讀者看完這个分析之後，可知上項決議案对于新问題的意义，对于無産階級政党與這问題之関係，对于本党对臨時革命政府之自其内而外和自其

外而内的政策，都有明白的观察。

我们現在且来看々„臨時大会”对于這個问題的决議是怎樣。



第三節　何謂„革命對「沙皇」制度之澈底勝利”？

„臨時大会”的决議案是関于„奪取政权與参加臨時政府”问題的决議案。這个问題的立场就已經含有乱雜的观念。一方面，把這個问題看得太窄狭；只說我们参加臨時政府，而不說党对臨時革命政府的一般的責任。另方面，把两個完全不同的问題，即我们参加民主革命中一個階段的问題與社会革命的问題，混成一塊。实际上論起来，所謂社会民主派„奪取政权”一語，若用在普通的直接意义上，那就是社会革命，而不是什么别的革命。若把這個術語的意义看作不是為社会革命而奪取政权，而是為民主革命奪取政权，那末，何以不僅只說我们参加臨時革命政府，而又一般的說要„奪取政权”？這話是何用意？大概是„臨時大会派”自己都未曾弄清楚，究竟他们應說什么：說民主革命，还是說社会革命。誰曾注意对這问題所發表的著作，他該知道上面那種混乱的观念是肇始于馬丁諾夫同志所著的„两個專政”；新„火星”派对于這个足為尾巴主义模範作品中所提问題的立场，固然不願意回憶，但這作品对于臨時大会有

思想上的影响，是用不着懷疑的。

我们且把這個決議的標題放在一边，再来分析這個決議的内容，便可看出其中最大錯誤。這個決議的第一段說：

„革命对「沙皇」制度澈底勝利之可能，或由建立自民衆暴動勝利而產生的臨時革命政府来達到，或由某種代表機関的發起，在革命民衆直接威逼之下，決定組織全民立憲大会来達到”。

這樣，這段決議案告訴我们說，革命对「沙皇」制度之澈底勝利可以由暴動勝利来達到，也可以由……代表机関的一紙決議組織立憲大会来達到！這是什么？怎么是這樣？澈底勝利可由一紙„決議”以組織立憲大会来達到嗎？？而且把這樣的„勝利”與建立„自民衆暴動勝利而產生的”臨時政府相提并論嗎！！臨時大会未注意到民衆暴動的勝利與臨時政府的建立是說革命在事实上勝利，而„決議”組織立憲大会是說革命只是在口頭上勝利。

「孟塞維克」派和新„火星”派的臨時大会，犯了與自由派和解放派常犯的錯誤。解放派常在口頭上說些関于„立憲”大会的話，同時，無廉恥的閉住眼睛，不看見力與权是把持在「沙皇」的手裏，忘却了要„立憲”便要有實力来立的问題。臨時大会也忘却了，不知從任何代表的一紙„決議”到实現這個決議还隔「十万八千里」。臨時大会忘却了，不知政权一日在「沙皇」之手，

任何代表的任何決議都好，都会與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時歷史上有名的佛蘭克府国会〔註〕的„決議”一樣，只是成為一紙可憐的具文。因為当時有這種事情，所以革命的無產階級的代表馬克思在其„新萊茵報”中曾用極激烈的諷辞怒罵佛蘭克府的自由主义的„解放派”，說他们只在口实上說了些好聽的話語，採取了民主主义的各種„決議”，„規定了”各種自由，但在事实上却把政权放在国王的手裏，自己没有組織武装实力以與受国王統治的軍隊力量战鬥。等得佛蘭克府的解放派还在唱空調時，国王已得了空闲的時间，鞏固了自己軍事力量，反革命乃得憑藉实际力量把民主派及其一切好看的„決議”打得粉碎。

〔註〕佛蘭克府国会（ФРАНКФУРТСКИЙ ПАРЛАМЕНТ）是一種国民会議，于一八四八年革命時召集以起草德意志的憲法，会議于佛蘭克府城故名。——譯者。

臨時大会拿来與革命澈底勝利比較的那樣東西（譯者按：即指„代表机关”的那紙„決議”），恰々是欠缺革命勝利基本的条件那樣東西。承認本党共和政体党綱之社会民主主义者怎樣能犯這種錯誤呢？為要明瞭這個奇怪的現象，須得一提第三次大会关于自本党分裂出来的一部份份子的決議。這個決議中，指出本党内部現在还有„根源于經濟派”而產生的各派别存在。我们的„臨時大会派”（可見他们不是жи虚受了馬丁諾夫思想上的

指導）現在觀察革命問題與經濟派前此觀察政治鬥爭或八小時工作時間制一問題所持態度，毫無二致。当時的經濟派隨即運用了自己的„法寶"——„階段論"曾經這樣主張：(一)為权利而爭鬥；(二)政治的煽動；(三)政治的爭鬥——或是：(一)十小時的工作時間制；(二)九小時的工作時間制；(三)八小時的工作時間制。從這種„策畧过程"(„ТАКТИКА ПРОЦЕССА")後來得着了什么結果，這是大家所知道的，這裡用不着細說。現在的„臨時大会派"却也向我们提議，把今後的革命好々地分成階段：(一)„沙皇"召集代表机関；(二)這個代表机関在„民众"威逼之下，„決定"組織立憲大会；(三)……関于第三階段，„孟塞維克"派还未商量定妥；他们完了，不知民衆之革命的威逼正遇着„沙皇"之反革命的威逼，故結局，或者是„決議"不能实現，或者還是要民衆暴動的勝利或失敗來決定問題。臨時大会的決議案與經濟派的論調完全相同，如經濟派說：工人徹底勝利之可能，或用革命手段实現八小時工作制來達到，或用特許方法行十小時工作制後再„決定"採取九小時工作制來達到。這與臨時大会的決議案简直沒有絲毫差别。

說到這裡，也許有人反对我们說，起草決議的人并不是有心要將暴動的勝利拿來與„沙皇"所召集的代表机関的„決議"相比較，而只是預先觀測党在這種或那種情況之下應持的策畧。我们对于這種說法的回答是

(一)決議案的原文是直接了当且毫無二可的把代表机関的„決議”叫作„革命对「沙皇」制度之澈底勝利”。也許這是編輯者不小心的結果，可以把這決議案拿来根拠会議記録更正，但在它未更正以前，其意見只有一個，且這個意見，全部都是„解放派”的意見。(二)解放派式的思想方法（臨時大会決議案的起草人就運用了這種方法）在新„火星”派的其他出版物和論文中向更表現的透澈。例如在梯虎里司委員会的机関報„社会民主党”(用格魯精文出版的，曾為„火星”報第一百期所称贊）中所載„鄉紳会議與我们的策略”（註）一文，簡直說，„擇定鄉紳会議(関于這種会議的召集，我们現在还全不知道！——著者。）為我们行動中心之”..........„策略”，„比較”武裝暴動和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的„策略”，„對我們有益”。我们在下面还要回頭說到這篇文章的。(三)要預先討論党在革命勝利時的策略，以及党在革命失敗時的的策略，在暴動成功時的策略和暴動不能擴大成為一真正利害時的力量策略，自然不可反对。也許「沙皇」政府能夠召集代表会議，藉以達到與自由資產階級分贓的目的，——第三次大会的決議案觀察到這点，直說這是„假面具的策略”，是„假的民主主義”(„Псевдодемократизм”)，是„所謂鄉紳会議一類的一種人民代表会議的化裝笑劇”。唯其如此，所以在関于臨時革命政府的決議案中不說到這点，因為這與臨時革命政府沒有関系，這会把暴動和建立臨時革

一致的問題排去重要問題的範圍之外，……
現在不是說有各種情況之可能的問題，不是說……
利與失敗，直的大路與彎曲的小路的問題，而……
民主主义者關于真正革命的道路不應該淆乱工……
憩，不應該像解放派一樣，把对于革命勝利只缺……
条件的東西謂為革命之澈底勝利。也許人小時的工作……
我们一下子得不着，而要經过長的道路才能得着，但……
在有一個人，他把無產階級之無力與懦弱，致將不能
阻碍資產階級的遷延，遲疑，叛变與反動之無力與懦弱
謂為工人们之勝利，你们对于這樣的人將怎樣說法？也
許俄国的革命，如„前進”報曾經有次說过的一樣，以
„立憲流產”而中止，但是這難道就可為社会民主主义
者的口实，在決战要開始的時候即謂這個„流產”為革
命对「沙皇」制度的澈底勝利嗎？也許就有一個最壞的
結局，我们不但爭不到共和政体，且連憲法都是一個想
像的憲法，„錫波夫式”的憲法，但在社会民主主义者
方面，難道就可以抹殺自己的共和政体的口号不提嗎？

〔註〕„鄉紳会議”（Земские соборы）是俄国解决国家重要問題的一種会議，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中曾經召集过，对「沙皇」有發言权，其中所含份子為貴族，神父，商人等。——譯者。

當然新„火星”派还未達到抹殺這個口号的程度，但是革命精神已經離開他们到了什么程度，他们那種無生氣的清談已使他们如何的离開了目前战鬥的任務，……

在他们的决議案中，恰々忘了関于共和政体的问题一点看起来，特别現得明瞭！這固屬奇怪，但是事实。他们曾經在臨大時会的各項决議案中，对于社会民主派的一切口号都加以審定，重述，解譯，仔細規劃，甚致連工人按机関选举組長和代表的问題都未忘掉，但只有関于臨時革命政府和共和政体的问題，從未在决議案中，找得机会說一說。既談民衆暴動的„勝利”與臨時政府的建立，而不指明這些„步驟”和举動对于争得共和政体的関系，這無異于起草决議案不是為指導無產階級的鬥争，而是為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背後毛隨跟行罷了。

總括起来說，臨時大会决議案的第一段是；(一)完全未按照争得共和政体和保證真正全民大與会真正立憲大会的観点来說明臨時革命政府的意义；(二)把恰々不夠根本条件以達到真正勝利的主張拿来與革命对「沙皇」制度之澈底勝利相比較，是直接滴亂了無產階級对于民主主义的認識。

第四節 肅清君主制度與共和政体

現在再来看々該項决議案的第二段：

„……這種勝利，在前一情形與後一情形之下，都可為革命時期中新的局面之開始。

„社会發展的客觀条件对于這一新局面自然而有的責任，便是在政治上已得解放的資產階級社会各份子向，為实現社自身会利益和直接握得政权的相互

爭鬥过程中，对君主等級的全部統治，為最後之肅清。

„所以臨時政府，負有实現這个按歷史性質是資產階級革命責任的臨時政府，應当在調節正得着解放的民族中各階級相互鬥爭的時候，不僅要把革命的發展推往前進，而且要與那些危及資本主义制度基礎之力量奮鬥”。

這是該決議案中单独的一段，我们且来分析一分析。此段中的主要意思與第三次大会決議案第三条相符合。但試将這兩個決議案中這一段拿来仔細比較一下，其间根本不同的地方便馬上顯露出来了。第三次大会的決議很簡畧的説明了現時革命的社会經濟基礎，即把全部目光都注射于各階級為着一定的利益而行一定的激烈鬥爭，且把無產階級的作战任務視為首要的向題。臨時大会的決議案，又拉雜又不清楚地叙述着現時革命之社会經濟基礎，関于為着一定目標的爭鬥，却説的很不明顯，而且関于無產階級的作战任務，絶未提及。臨時大会的決議案説，要在社会各份子间相互爭鬥的过程中肅清舊制度。第三次大会的決議案説，我们是無產階級的政党，應該起来实行這個肅清的責任，且説，要真正肅清舊制度，只有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我们應該爭得這樣的共和政体，我们為着這樣的共和政体和完滿的自由，不僅将與專制奮鬥，且当資產階級将要企圖（它必然要企圖）奪取我们的勝利品的時候，我们还将與資產階級奮鬥。

第三次大会的決議案是号召一定的階級去為着一定不移最近目標而鬥爭。臨時大会的決議案，却在那裏說些各種力量相互向的鬥爭。一個決議案是表現着積極鬥爭的心理，另一個是表現着消極旁觀的心理；一個是充滿着号召活潑行動的精神，另一個是充滿着死板的推論。兩個決議案都說，現在的革命对于我们僅只是革命的第一步，繼續第一步，必有第二步，但從這一点出發，一個決議案所作的結論，是因此必要更快的經过這第一步，必要更快的結束它，争得共和政体，猛烈的压倒反革命以造成第二步的基礎。而另一個決議案，却用很多辞句在那裏描寫第一步的情況，且如嬰兒食奶一樣（恕我用了這句粗鄙的話），津津有味的在那裏玩賞這種情況的意味。

第三次大会的決議案，採用了馬克思主义的舊見解，且是永遠新鮮的見解（関于民主革命之資產階級性的見解），作為說到民主革命奮鬥，且為社会革命奮鬥的先進階級之首要任務的緒言或其第一個出發点。臨時大会的決議案，却簡直就流連在這個緒言当中，嘗着文章的快樂生活，用着才子的本領在那裏辯解這個緒言。

上述這個不同点，恰是好久以前把俄国馬克思主义者分成两派的那個不同点：在從前合法的馬克思主义那時代，是辯論派和战鬥派；在群衆運動開始的時代，是經濟派和政治派。一般的階級鬥争，尤其是政治鬥争，都有經濟上深远的原因，——這是馬克思主义的正確的觀点；經濟派從這個正確的觀点出發，便做出一個巧妙的

結論，就是說要把背心来对着政治鬥争，阻止牠的發展，不讓牠擴大，蔑視牠的責任。政治派却相反，從同樣觀点出發，却做了另一種的結論，就是：我们現在爭鬥的根源若愈深，那我们要愈廣泛，愈勇敢，愈堅决，愈積極的来实行這個爭鬥。現在我们的争論是同樣的争論，不过環境变迁，形式不同罷了。民主革命絕对还不是社会革命，這個革命絕对不僅只对于無產者有關，它的深遠的根源是隱藏于全部資產階級社会之不可免除的需要與要求——這是我们共有的出發点；我们從這個出發点所做的結論，是先進階級因此應更勇敢地提出自己民主主义的責任，應更堅决地澈底主張這些責任，直接提出共和政体的口号，宣傳必要臨時革命政府和必要猛烈压倒反革命之主張。而我们的反对派——新„火星”派，從同一点出發，却做出另一種的結論，以為不要把民主主义的結論談得澈底，以為在实际的口号当中可以不提出共和政体，以為可以不宣傳必要臨時革命政府的主張，以為關于召集立憲大会的一紙决議也可稱謂澈底的勝利，以為與反革命奮鬥的責任，可以不作為我们積極的責任，而把它拋入不可捉摸的„相互爭鬥的過程”（我们在下面可看見這個術語是不对的）。這简直不是政治家的口吻，而是一種保管文書官吏的濫言！

若讀者对于新„火星”派决議案中的一些詞句愈用心觀察，則上述那些根本特点便能更看得显明。如那個决議案說„政治上已得解放的資產階級社会中各份子向

相互争鬥过程”的話。回想起該决議案的標題（臨時革命政府）使我们發生疑问，就是既説相互争鬥的过程，那末，関于政治上奴隸資產階級社会的份子，何可默置不理？„臨時大会”派是不是想要説，他们既假定革命勝利，則這樣的份子便已經消滅了嗎？這類的观念，是荒謬絕倫的，且是政治上的浪漫和近視。革命対反革命勝利之後，反革命不会消滅的，它必然要向着新的更激烈的鬥争。当我们在自己的决議案中分析革命勝利時候的任務，應当对于压倒反革命強烈抵抗的責任與以十二分的注意（如第三次大会的决議案就是這樣），而不能把社会民主党最近將来的日常緊急政治任務拿些在現在革命時期之後將会怎樣的説話來敷衍，拿些„在政治上得了解放的社会”已經实現時將会怎樣的話來敷衍。經濟派曾經以政治受經濟左右的一般原則為口实，敷衍了他们自己对于日常政治責任的不瞭解；現在的新„火星”派也是一樣，以在政治上已得解放的社会內部鬥争之一般原則為口实，來敷衍自己对于這個社会求政治解放之日常革命責任的不瞭解。

試拿„对君主等級的全部統治，為最後之肅清”一語來看。俄文上所謂对君主制度作最後的肅清，便是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但是我们那位賢良的馬丁諾夫及崇拜他的人都覺得後面一句話太通俗而明显；他们一定要把這句話想得„深奥”点，把它説得„精彩”些。其結果，那種深思遠慮，只是費了像支八分錢那樣可笑的，„企也

劳",——這是一方面。而另方面，却把一個口号弄成了記事，把号召前進的壮烈的口号弄成了一種機械式的回顧。這和像我们看見我们的面前不是一些現在即時要為共和政体而奮鬥的活人，而是一些以万古不易之理的觀点来觀察現在向題的木乃依。

再者："………臨時政府，負有实現這個……… 資產階級革命責任的"……。從决議案的這两句話看起来，很痛快了当的表現出了"臨時大会派"对於横在無產階級政治首領面前的具体向題的觀察。但是関于臨時革命政府的這樣具体向題，在"臨時大会"派的眼目中，却又為今後許多将要实現資產階級革命責任之一般的政府向題所埋没了。若是你们願拿"歷史的眼光"来觀察這向題，那末，歐洲諸国無一不是你们的好例，就是許多政府（决非"臨時的"政府）都曾經实現資產階級革命之歷史上的責任，甚至那些[于]征服了革命的政府都曾經不得不还要实現這个被征服的革命之歷史上的責任。可是，"臨時革命政府"决不是像你们那樣說的就叫作臨時革命政府；所謂"臨時革命政府"是個革命時期的政府，直接起来代替已被推翻的政权且直接憑托民眾暴動之政府，而不是憑托一些什么自民眾產生出来的代表机関的政府。臨時革命政府是一種求革命即時勝利，且即時压倒反革命的机関，而决不是一種求实現資產階級革命一般歷史責任的机関。先生们，我们可讓拿在将来"俄国"将来的歷史家去界說我们同你们或這種政府和那種政府

实現了資產階級革命的何種任務吧——這種事情，再过三十年都还可来得及作的，而現在呢，我们对于為共和政体而争鬥，对于無產階級努力參加這個争鬥的问題，要馬上提出口号且與以实际的指導。

因上述各種原因，我们对該决議案第二段中的最後幾個意思也不能滿意。如説臨時政府應当„調節”各階級间的相互鬥争，這話是極不妥当的，或至少是很難同情的：馬克思主义者不應当運用自由派和解放派的術語，因為這種術語可使人家聯想到政府可不為階級鬥争的机関，而為階級鬥争的„調節者”………。政府應当„不僅要把革命的發展推往前進，而且要與危及資本主义制度根本之力量奮鬥”。這個力量恰々就是無產階級，該决議案的説話，就是代表這個階級的説話！他们不説無產階級在現在這時候應当怎樣„把革命的發展推往前進”（把它推得比立憲民主資產階級所想的更往前進），不説用怎樣一定的方法去准備，俾当資產階級反轉来反对革命勝利時，以與資產階級奮鬥——這些都不説到，而僅做些革命过程的一般的叙述，関于我们行動上的具体任務一点也不提到的叙述。新„火星”派分析自己思想的方法，很與馬克思所批評的（見馬氏関于費巴黑的„批評”）那種和辯証論没有関系的舊唯物論相同。馬克思説，哲学家僅曾以各種方法来解釋宇宙，而问題却是在怎樣去改变這個宇宙。新„火星”派也是一樣，他们儘可叙述且解釋正在他们眼前所経过的鬥争的过程，但不能用

在這個鬥爭中提出半个正確的口号。他们努力的很辛苦，但是很不会指導，对于已覺悟到革命的物質条件且已站在先進階級前頭之政党在歷史上能夠而且應当担負的指導作用，他们置之不理，因之就輕視了对于歷史的唯物的認識。



第五節 應怎樣„把革命推往前進”？

我们現在且將臨時大会決議中的最後一段挙出来分析一下：

『在這些條件之下，社会民主派于革命全部过程中應保持之地位，是要最能保証自己可能把革命推往前進且在要與資産階級政党自私自利的政策，不澈底的政策奮鬥時，不使自己倒对，不致使自身為資産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所瓦解。

因此，社会民主派自己不應当以奪取政权或在臨時政府中分得政权為目的，為應持極端革命之反对政府党的態度』。

主張採取最能保持社会民主派可能把革命推往前進的地位，——這一主張，倒是我们很欢喜很欢喜的。不過除了這個可愛的主張而外，我们還願有直接具体的指示，就是在現時政治局向之下，在関於召集国民代表大会的議論紛紛，計劃百出的時候，究竟社会民主派應当怎樣把革命推往前進。不懂得解放派要民衆與„沙皇”„妥協”那種危險理論的人，把一紙„決議”召集立憲大会

謂為勝利的人，不把宣傳必要臨時革命政府視為目前積極任務的人，——這些人能否把革命推往前進？把共和政体的口号抹殺不提的人，能否把革命推往前進？這樣的人，事实上不是把革命推往前進，而是把它推往後退，因為在政治實踐上，他们已與解放派的態度立于同一水平線上。我们的党綱是要求以共和来代替專制的，倘在採取策略上的决議案以規定革命時期中党在現在和最近將来的責任的時候，对于為争得共和政体而奮鬥的实际口号抹殺不提，那他们承認這党綱有何意义？原来解放派的態度，——立憲民主資產階級的態度，在現在這時候实际上特別與我们之不同，恰々是因為他们在决議召集全民立憲大会的時候，把這决議看作是澈底的勝利，而对于臨時革命政府與共和的问題卻很靈敏的(声不响！要把革命推往前進，要把它推出資產階級之君主派所推到的範圍以外，再往前進，那末，必須把與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之„不澈底性”不相並容的口号，積極提地出来，且把它看作首要的问題。這樣的口号現在僅止有二，即(一)臨時革命政府，和(二)共和政体，因為「全民立憲大会」的口号是資產階級之君主派所假意接受的(參閱「解放社」的政党)，其假意接受的用意，就是要無形的避免革命，不讓革命党全勝利，使大資產階級得與專制分肥。臨時大会对于上面這两个唯一能夠把革命推往前進的口号有何関系呢，我们看見他们对于共和政体的口号完全忘却了，而对于臨時

革命政府的口号却拿来與解放派的口号「全民立憲大会」相对比，把两者（即「臨時革命政府」與「立憲大会」——譯者）都謂為"革命之徹底勝利"！！

是的，這樣一個無容疑义的事实，我们相信定將能為俄国社会民主派中將来歷史家叙述歷史的路標。俄国社会民主党曾于一九〇五年五月举行臨時大会，通过一个决議案，其中說些関于必要把民主革命推往前進的好話，而事实上却反把這個革命推往後退，事实上沒有越过資產階級君主派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再往前進。

新"火星"派喜欢來非難我们，說我们不看見無產階級將為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解体的危險。我们很想有這樣一個人，他能把這個非難根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所通过的决議原文證实一下。我们関于這问題現在回答我们的反对派說：在資產階級社会基礎上行動的社会民主派，在這種或那種的单独情形之下，若不與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併列前進，則它將不能参加政治。在這個问題上，我们與你们的分別是，我们與革命的和要求共和政体的資產階級併列前進，同時不與它打成一片。而你们，却與自由主义的和要求君主政体的資產階級併列前進，也同時不與打它成一片。說来就是這樣一回事。

你们代表臨時大会在策略上所提出的口号，與"立憲民主党"，即要求君主政体的資產階級政党所提的口号相符合，同時，你们自己並注意到且未覺

悟這種正相符合的情形，因之，你们实际上就变為解放派的尾巴不可。

我们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在策略上所提出的口号，與民主革命的和要求共和政体的資產階級所提出的口号相符合。這個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現在俄国還未形成一個大的民眾政党。〔註〕

〔註〕„社会革命党”是一個主張恐怖行動的智識份子的集團，虽然這个集團行動在客观上的意义，結局是实現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任务，但还說不上是這個階級政党的萌芽。

這樣一個大政党雖然未还形成，但若有人懷疑這種政党的份子的存在，那就証明他对于俄国現在所經过的事情，一点也不明白。我们準備（在俄国革命進行順利的時候）不僅指導已為社会民主所党組織的無產階級，而且指導能同我们併列進前的這個小資產階級。

臨時大会因自己的决議案，致無意識的低降到自由主义的和要求君主政体的資產階級之水平綫。第三次大会因自己的决議案，卻是有覺悟的把那些有能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份子提高到自己的水平綫去战鬥，而不是去妥協。

這樣的份子，在農民中是最多的。在观察社会各份子，按其政治上的傾向分成各大部份的時候，我们可把革命的和要求共和政体的德謨克拉西看作與農民群眾一樣，這自然没有大錯誤的——不过要知道，当我们把這

两種東西看作是一樣的時候，是以我们把工人階級與社会民主派看作是一樣的々觀点和附帶条件為觀点且為附帶条件的。我们可用另種說法把我们的結論表現出来：臨時大会在革命時期是用自己全民的和一般的(註)政治口号，無意識的把自身低降到地主们的水平綫。第三次大会是用自己全民的和一般的政治口号把農民群衆提高到革命的水平綫。要是有人看了這個結論，便責備我们好說矛盾話，那我们就要請他試々推翻下面一個正確的觀点：若是我们將不能把革命实行到底，若是這個革命居然以「沙皇」所召集的那種代表会議（謂這種会議為立憲会議，只是滑稽），即解放派式的„徹底勝利"告終結，則這個革命將以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成份佔優勢。反之，若是我们能經过一個真正的大革命，歷史不讓這次革命„流產"，我们有力量以实行這次革命到底，使它達到徹底的勝利（不是解放派和新„火星"派所声称的那種„徹底勝利"），則這個革命將以農民和無產階級的成份佔優勢。

(註)我们在此處不提及農民運動的專門口号，因对于這些口号已有另決議案說到。

或許有人以為這種「佔優勢」的論点，拋棄了我们相信現時革命之資產階級革命性的態度？若從„火星"報中那樣濫用名詞看起来，這種懷疑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就這個问題表現察一下，也不是多餘的事。

第六節　無產階級與不徹底的資產階級奮鬥時將自己制財的危險從何而來？

馬克思主义者自然相信現時俄国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性質。這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說，在現時俄国成了必要的那些政治制度上的民主主义的改革和社会經濟上的改革，其本身不但不会破壞資本主义的基礎，破壞資產階級的統治，而且相反，這些改革恰々能夠真正肅清大道，使資本主义得普遍迅速地發展，使資產階級的統治成為可能。社会革命党不明瞭這個理論，因為他們不知道商品生產與資本主义生產發達之祖淺規律，不知道縱使農民暴動完全成功，縱使能滿足農民的願望把全部土地都均分給他們（如„黑分派”及其他同類社團的主張），那時还是不会消滅資本主义的，反之，均分土地，恰是促進資本主义的發展和農民本身中階級的分化。小資產階級中無覺悟的思想家，社会革命党对于這个原則是不瞭解的。主持這個原則，于社会民主派不但在理論上有大的意义，而且在实际政治上也有大的意义，因為從這一点的結論，就是無產階級的政党應在現時„全民德謨克拉西”運動中保持階級完全独立的地位。

但從這一点，絕对不能說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經濟意义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对于無產階級就沒有大的利益。絕对不能說，民主革命不可以在有利于大資本家，財東，„受过洗禮”的地主之形式中实現，又可以在有

利于農民和工人的形式中实現。

新"火星"派，对于「資產階級革命」一現念的内容與意义，根本上瞭解不正確。他们的論述中，常見有這樣一種見解，就是把資產階級革命，看得似乎只是一種于資產階級有利的革命。這種見解是最錯悞沒有的見解。資產階級革命是這樣一種革命，這種革命是不超过資產階級，即資本主义社会經濟制度範圍的。資產階級革命是表現資本主义要求發達的革命，它不但不消滅資本主义的基礎，反而擴大這個基礎。因此，這個革命不但表現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表現全部資產階級的利益。但因在資本主义下面，資產階級对于工人階級的統治是必然的，故可大體地說，資產階級革命所表現的無產階級的利益，終不如資產階級之多。不這新"火星"派的見解，說資產階級革命完全不表現無產階級的利益，這是大錯而特錯的。這個錯悞見解的結果，或者是走到老民粹派的理論，說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的利益相衝突，故我们不要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或者是走到無政府主義，否認無產階級參加一切資產階級的政治，參加一切資產階級的革命，參加一切資產階級的國会主义。這種見解，在理論上是忘却馬克思主义関于資本主义根拠商品生產必然發展的粗淺原則。馬克思主义告訴我们說，以商品生產為基礎，且與先進資本主义国家發生交換関系的社会，到了發展的相当程度時，它自己必然走上資本主义的道路。民粹派和無政府主义者以為像在俄

同一樣，可在資本主义範圍之外，不是階級鬥爭，而另自別種道路以不經过資本主义的發展，避免這個資本主义或躍过這個資本主义，——馬克思主义对于這類的夢想是毫無関系的。

上述馬克思主义的原則，已為一般的情形所詳細証实，也是為俄国的情形所証实。而從這些原則所得的結論，就是要救工人階級，除了在資本主义今後發展中去尋找出路外，想在任何地方去尋找出路的見解都是反動的見解。在俄国這樣的国家裏，工人階級所受得資本主义的痛苦，倒还比不上它所受得資本主义發展不够的痛苦。因此，工人階級無条件的需要資本主义最普遍，最自由，最迅速的發展，消滅国内所有一切碍障資本主义普遍，自由，且迅速發展的殘餘舊制，对于工人階級自然有利。資產階級的革命，正是最能決心消滅国内農奴制度殘餘（属于這種殘餘制度的不僅止專制君主政体也在内）的革命，也是最能保証資本主义最普遍最自由，最迅速發展的革命。

因此，資產階級的革命对于無產階級十分有利。以無產階級的利益着想，資產階級的革命是無条件的必要。若資產階級的革命来得愈決心，愈徹底，則無產階級為着社会主义與資產階級之鬥争亦愈有保証。祗有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粗淺原則的人们，少見多怪，以為這個結論是一種新的邪說。而這個結論中间，同時还有一個見解，就是在相當的意思上，可以說資產階級革

命对于無產階級的利益較大于資產階級。在什么意思上可以說這個見解是無疑义的呢？原来資產階級願依托国内少数殘餘制度，如君主制和常備軍等々以反对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以為資產階級革命不要把国内的一切殘餘旧制度掃除得太乾净，而要稍許保留幾種，就是說不要使這个革命太徹底，太堅决，太無情，方有利于自己。這種意思，社会民主派常拿另一種話来表現，即謂資產階級对自身变節，資產階級出賣自由，資產階級不能為徹底的民主主义而奮鬥。資產階級為了有利于自己，寧可使資產階級民主主义方向的各種必要的改革，不用革命的方法来進行，而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漸々地，緩々競々地来進行；使這些必要的改革，对農奴制度的（如君主制之類）„尊嚴的”机関要尽可能的謹慎；使這些必要的改革，对平民（即農民，尤其是工人）自動的革命性和自動的精神能力，要尽可能的少激發，因為若不如此之人們便較容易„把所荷的槍枝由右肩轉到左肩”（如法国人所言），就是說較易利用資產階級革命所給予的武器，利用資產階級革命所給予的自由和農奴制度被推翻後所建設的一切新機関，倒轉来反对資產階級自己。

工人階級則反之；它為有利于己，以為資產階級民主主义方面必要的各種改革，不要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進行，而要用革命的方法来進行，因為改良主义的方法是使腐朽的旧制度漸々歸于「死亡」的方法。在這種旧制度腐朽而致于「死亡」的过程中，最受痛苦的首先就

是農工群衆。革命的方法是一種直接痛快的方法，這種方法，对于君主制及其染有腐朽氣味的一切机関，如像「利及斬麻」，是最少讓步，最少謹慎和客氣，簡直把它消滅的方法，而对于無產階級，却是最少吃虧的方法。

唯其如此，所以自由資產階級出版物之害怕革命，拿革命二字以恐嚇「沙皇」，設法避免革命，卑躬屈節地去求「維新」，找得改良主义道路的基礎，不僅是為着出版物受檢查的原因，也不僅是因為他們因恐怖而害怕革命道路之可能，而实有很深的社会階級利益為背影。站在改良主义的观点說話的，不僅止„俄国新聞"，„祖国之子"，„我們的生活"，„今日"等報紙，且連非法的，自由的„解放"报都是。資產階級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因自身階級的地位，必然產生它在民主革命中的不徹底性。無產階級因自身階級的地位，逼使它不得不為徹底的民主主义者。資產階級的頭是往背後看去的，因為它害怕民主主义的進化，因為這個進化有使無產階級厲害起来的危險。無產階級却除了落失套在自己頸上的鍊鎖而外，什么東西都不会失落的，而得民主主义的之，它可得着全世界。所以資產階級革命在其民主主义的改革方面若愈愈徹底，則這个革命对于資產階級有利的範圍将愈縮小。若資產階級的革命愈徹底，則它愈能保証無產階級與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

馬克思主义給與無產者的教訓是，对于資產階級的革命不要取「隔岸观火」的態度，不要不参加這個革命，

不要把這個革命的指導权交給資產階級，而要很熱烈的參加這個革命，很堅决地為無產階級的徹底的民主主义而奮鬥，為革命到底而奮鬥。我们固然不能跳出現在整個革命之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範圍，但我们能擴大這個範圍，我们能夠而且應当在這個範圍之内，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奮鬥，為無產階級目前的直接需要及其達到最後勝利之实力准備条件而奮鬥。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还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有鄉紳君主派，他们是主張上議院，要求"普通选举权的，而暗地裹，關于口袋不全的縮變憲法问題和狡猾的專制政府分肥，——這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者，運用有武力反对地主和官僚，以"天真的共和主义者的性情"要求"驅逐沙皇"的農民，——這也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者。有德意志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还有英吉利資產階級的民主制；有奧大利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还有美利堅和瑞典資產階級的民主制。一個馬克思主义者，若在民主革命的時候把民主主义的程度及其各種形式向各種性質的分別輕視了，而只憑着"聰明才學"說，簡直這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簡直這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果，——這樣的馬克思主义者是不明瞭实际的馬克思主义者。

我们的新"火星"派，就是這樣一批以近視自尊的"聰明才子"。且不說新"火星"派对于不徹底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與徹底的無產階級的民主主义中间有何分別的问題未曾观察到，甚致当我们要将共和革命派的德

謨克拉西與自由資產階級君主派的德謨克拉西中間有何分別一問題分析明瞭的時候，他们还是一味的空談著革命的資產階級性。當我们說，現時革命中要予以民主主義的指導；要注重民主主义的激進口号，以别于斯脱魯威等一流人物的变節口号，要把無產階級與農民之真正革命鬥争的最近的任务很简切了当地指時出来，以别于地主和工廠主那種自由主义的妥協態度，——在這種時候，新„火星”派却拿些„各階級相互鬥争的过程”等消極的説話以自滿，他们的確在事实上成了„癡人木偶”呵。先生们，你们简直未見到現在問題的要点就在這裏，即我们革命的結果，還是達到真正的大勝利，还是以一可憐的分贜了事；我们的革命還是能達到民主革命的農工專政，還是„徒費駒劳”，僅僅得到一紙自由派的謝波夫式的憲法！

表面上看来，当我们提到這問題，似乎离开了本篇題目的範圍。但這只在表面上感覚是樣這。实际上，現在已經使俄國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所採取的策畧與新„火星”派臨時大会所採取的策畧，二者間原則上形成分裂之点，就在于這一問題。新„火星”派在解决本党于革命時期中最複雜，最重要且最实际的策略問題的時候，重犯經濟派的錯悞，這已經不是倒退两步，而是倒退三步了。所以我们必要很注意地来分析上面所提出的問題。

臨時大会的决議案，就上面摘録下来的一段看来，

曾指出這樣一個危險，就是恐怕社会民主派在與資產階級不徹底的政策奮鬥時，致自己制肘，致自己身為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所瓦解。関于這個危險的見解佈滿了新„火星”派的全部專門著作，這個見解才真正是本党分裂的全部原則問題的中心（自从這時候起，本党争論的一些小问題已完全值不得注意了）我们也毫不支吾彷彿地承認說，這個危險的確存在，尤其是現在，当俄國革命已經爆發的時候，這個危險已特別值得注意。我们社会民主派所有的理論家或（我对于自己就想這樣称呼）政論記者應把這问題仔細分析，究竟在事实上這个危險是從那一方面發生的，——這是一樁急不容緩的事，是異常重要的任务。因為我们分裂的起点，不是在于争論有沒有這種危險存在，而是在於争論這種危險的產生，是由於所謂„少数派”的尾把主义，還是由於所謂„多数派”的革命主义。

為避免悮解和悮会起見，應首先申明，我们所說的這個危險，不在於主观方面，而在於客观方面；不在於社会民主派取要採取的形式上的態度，而在於現在全部革命鬥争的物質行程。问題不在於這部份社会民主派或那部份社会民主派願不願在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中间瓦解，他们覺悟到还是覺悟不到自己那裏被瓦解，——関于這点沒有问題。我们不懷疑社会民主派中誰有這類的願望，况且這问題與願望沒有関系。问題也不在於這部份社会民主派或那部份社会民主派，能否在革命的全

部过程中对于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保存自己形式上的独立，形式上的特别。他们終可不僅止宣佈這種„独立”，且終可在形式上保存這種„独立”，但事情的結果，也許他们與資產階級的不澈底性奮鬥時，還是使自己制肘。雖然能夠保有形式上的„独立”，雖然社会民主派能保全自己組織上的自立和党的自立，但革命最後的政治總結也許表現它在事实上不能独立，表現它不能对於事变的行程以顯示出無產階級的自立，也許政治鬥争最後的結果，表現它完全力量沒有，而自身的被„溶解”於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還是一個歷史的事實实。

這才是真正危險的所在。我们現在且来觀察一觀察，究竟這危險是那一方面来的：還是如我们所想的一樣，這危險是從社会民主派新„火星”報之右傾而来呢，還是如新„火星”派所想的一樣，這危險是從社会民主派„多数”與„前進”報等之左傾而来呢？

我们在上面已經說过，這问題要看各種社会力量動作之客觀結構如何才能決定。這些社会力量的性質，已根据俄国的实際情况，按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理論上分析得很親楚了，而現在实践上，這些力量的性質，要看革命行程中各階級的公開行動如何才能決定。馬克思主义者在現時革命時期好久以前对于俄国实际情况的全部理論上的分析，以及对于革命事件發展之一切实际上的觀察都証明給我们看，俄国革命有兩種行程和結局的可能。按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方向来改革俄国現時的經

濟政治制度是必然而且不可避免的。地球上沒有這樣一種力量能夠阻碍這種改革。但按現在各社会力量動作的結構可有兩重結果，或這個改革的兩重形式。兩者中间只能有一種，即：(一)還是„革命能对專制徹底勝利”，還是(二)達到徹底勝利的力量不夠，結果，專制政府與資產階級中最„不徹底的”和最„自私自利”的份子分贓妥協。致其他一切詳細的推論和定奪誰也不能預先鑑定，而全盤計标起来，也不外乎上述兩種的歸納，或是前一結局或是後一結局。

我们現在且来观察一观察這兩種結局：第一，按這兩種結局的社会意义来观察；第二，按社会民主派在前一結局與後一結局時的地位（社会民主派之„瓦解”及其自己„制肘”）来观察。

何謂„革命对專制的徹底勝利呢”？我们在上面已經說过，当新„火星”派運用這個語句的時候，連這語句的最近的政治意义都不懂。他们对於這個观念的階級意义的認識尤為淺薄。馬克思主义者，無論如何不應該像現在的多數革命民主主义者一樣（如加般一類的人）拿„革命”或„俄国大革命”等口頭上的話語以自欺。我们應該自己的確明瞭，究竟與„專制”（這個完全实际且是大家所知道的力量）对立且能对專制„徹底勝利”的是些什么社会实际力量。大資產階級，地主，工廠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会社”是不能成為這種力量的。我们知道些這社会份子，甚致不想要徹底的勝利。我们

知道他们按自己的階級地位是不能與專制堅决鬥爭的．因為私有財產，資本．土地等太把他们的脚纏住了，幹不了堅決的鬥爭。因為他们為反对無產階級與農民，太需要專制政府及其警察官僚和軍事力量了．不能為推翻專制而奮鬥。能夠„对專制澈底勝利”的力量，只有民衆，如果拿根本的最大的力量来看，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而城市與鄉村的小資產階級（也是„民衆”）可就這两個根本力量分插進去。„革命对專制的澈底勝利”，即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這個結論是„前進”很久已指出来了的，我们的新„火星”派總不能逃出這个結論。因除了這根本力量而外，無論誰也不能对專制有澈底的勝利。

且這樣的勝利，定將成為一個專政，就是說這樣的勝利，必然應当要依靠軍事力量，依靠群衆的武装和暴動，而不是依靠什么别的机関——用„合法的”，„和平方法”而造成的机関。這只能是一個專政，因為工農所需要的一些急不容緩的改革要实現，必然引起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專制政府的拼命的反抗。要打破這個抵抗，粉碎反革命的企圖，没有專政是不可能的，但這自然將是一個民主主义的專政，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專政。這個民主主义的專政是不能動搖（没有革命發展的許多过渡的階段）資本主义之基礎的。它至多不过能把土地私有权根本上重新分配一次，以满足農民的利益，施行澈底的完滿的民主主义，直至共和政体為止，根本上剷除鄉

都生於農工廠生活中的一切亞洲式的和奴隸式的特點，認真開始工人地位的改良，及其生活程度的提高，最後（按數目上是最後，而不是按重要性為最後），把革命的火焰牽移到歐洲去。這樣一個勝利，還是不能從資產階級的革命做出一個社会主义革命来的；民主革命是不能直接逃出資產階級社会經濟關系範圍的；虽然如此，但這種勝利对於俄國將来的發展和全世界將来的發展是有莫大意义的。能將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提高到這樣程度，且能將全世界無產階級達到完全勝利的道路如此縮短的，只有俄國已經開始的革命之徹底勝利。

這種勝利的可能如何，——這是另一问題。对於這问題，我们当然不是抱着蒙目的樂欢主义，我们並不是忘却這個責任的大困難，但当我们開始鬥爭的時候，我们應当希望勝利，而且應当指出達到這個勝利的真正的道路。能夠達到這種勝利的傾向現在是有的。当然不錯，我们社会民主派对於無產階級群衆的影响還很不充分，革命運動对於農民群衆的影响還很小很小，無產階級和農民（尤其是農民）的放散及其知識上的黑暗还是很大，但革命潮流能很快地把他们結合起来，很快地使他们覺悟起来。革命發展的每一步驟，都能喚起群衆，且以莫大的力量吸引他们跟着革命的党綱前進，因為這是徹底表現真正群衆利益的唯一的党綱。物理学的定律告訴我们，動力與反動力成正比。歷史上革命的破壞力量也差不多是一樣，即破壞能力的大小，要以[illegible]白力量之

大小為標準，要以反古的„上層築物”與現代新鮮活潑力量向矛盾之深淺為標準。且現時国际上的政治情況，在許多問題上是最有利於俄國革命的。工人和農民的暴動已經開始，虽然這種暴動是分散的，自然爆發的，但誰也不能否認這種情形，是証明能去堅決鬥爭且能達到徹底勝利的力量，实是存在。

如若這種力量不夠，——那么，專制政府便來得及把分贓的事情結束，况且這種分贓的事情已有布靈根和斯脫盧威一般老爷们在那裏双方準備。那末，革命的結局，就是一紙口惠不全的憲法，或甚致是（壞而又壞的結局）狂式一種憲法了事。這也將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不过是流產，半生子罷了。

社会民主派自是不自己妄想的，它知道資產階級變節的根性，縱有資產階的憲法取得„謝沒夫試的”光榮之一日，它還是不灰心，不拋棄自己对無產階級之革命訓練的努力和忍耐工作的。這樣的結局，將與十九世紀中歐洲所經过的一切民主主义革命差不多不相上下，而革命的發展，亦將According困難，長遠且久已開闢而為我们所已經認識的道路進行了。

現在且向這兩個結局中，社会民主派在那一種結局之下，在反对不徹底的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的時候致自己实际上削肘？致自己实际上被瓦解，或差不多被瓦解於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

只要把此問題的本身這樣看清楚，便毫無犹疑地可

以回答它。

若是資產階級拿其專制分贓的方法得將革命破壞——那時社会民主派要反对不澈底的資產階級定将实际上制肘，那時社会民主派定将要解除"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因為那時候的無產階級不能得自身对革命有很显著的影响，不能用無產階級的手段，就像馬克思曾經所説过的一樣，"用平民的手段"以对專制政府。

若是革命得能澈底勝利，——那時我们得能用甲可賓的手段，或用"平民的手段"以对付專制。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曾在"新萊茵报"説过："全部法蘭西的恐怖主义不是什么别的方法，而是待对資產階級的敵人，对待專制，对待封建和小資產階級心理的一種平民手段"（見馬克思。與昂格思文集，梅林编出版第三卷，第二一一頁）。現在民主主义的革命時期，有些人非難俄国社会民主派的工人為"甲可賓主义"不知這些人对於馬克思的這兩句話曾經加以思索没有？

現代俄国社会民主派中的「華浪特」派（註），新"火"星"派，雖未與解放派打成一片，但在事实上，因其口号的性質，以致当了解放派的尾巴；而解放派——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想要用和緩，改良的方法对付專制；对貴族，皇親讓步，不要得罪他们；謹慎而敦尊，恭順而和睦，用貴人的客氣態度，帶白色的手套（如一九〇五年六月六日别龍刻維 ПЕТРУНКЕВИЧ 在尼古拉欢迎"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帶的手套之類）。

〔註〕「基浪特」派（ЖИРОНДИСТЫ）——十八世紀末法国大革命時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右派，為大商工業資本的政党。——譯者

現代社会民主派中的「甲可賓」派〔註〕——布尔塞維克派，„前進報”派，第三次大会派，——是想要用自己的口号，把革命的和要求共和的小資產階級（特别是農民）提高到無產階級（完全保存自己階級特立的無產階級）徹底民主主义的水平淺。他们想要民衆（即無產階級與農民）用„平民的手段”对付君主專制和貴族，对自由的敵人要無情的消滅，对敵人的反抗要用武力来压倒，对農奴制，亚洲式的專橫與侮辱人们的苛殘淫虐等遺孽，要毫不讓步。

〔註〕「甲可賓」派（ЯКОБИНЦЫ）——為革命小資產階級的組織，曾推翻君主專制與封建，使法国革命達到完全勝利。——譯者。

這自然不是說，我们定要拿一七九三年的「甲可賓」派做模範，採用他们的党綱，口号，及其行動的方法。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我们自己的党綱不是舊的，而是新的——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小限度党綱。我们自己有新的口号，——即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若是我们能達到革命的真正勝利，則我们亦將有適應自己政党性質與目的之行動方法，即工人階級政党達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動方法。我们只是要拿這樣一個譬喻，以說明二十世紀之先進階級的代表，即無產階級的代表——社会民

主主义者之分成两派（機会主义派與革命派），一如十八世紀之先進階級的代表，即資產階級的代表分為「基浪特」與「尹可賓」兩派一樣。

只有民主革命能得完全勝利的時候，無產階級與不澈底的資產階級奮鬥時，方不致自己掣肘，也只有在這種時候，無產階級方不致瓦解於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而对於全部革命行程都能與以無產階級的影响，或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影响。

總之，要在與不澈底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奮鬥時不使自己掣肘，無產階級就應有相当的覺悟與能力，俾能把農民提高到革命的自覺，領導其鬥爭，致自己能單独实行無產階級澈底的民主主义。

與不澈底的資產階級奮鬥時致自己掣肘的危險一問題是應該這樣来观察的，像新〝火星〞派那種說法，全不能使我们滿意。資產階級是永遠不会澈底的。規定某些条件和執行某些条件，然後認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不会為民眾的假朋友——這種办法是無聊也沒的了。能為民主主义澈底奮鬥者，只有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之能為民主主义奮鬥勝利，只有在農民群众参加革命鬥争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若是無產階級達到這個勝利的力量不夠，那時資產階級便要成為民主革命的首領，且使這個革命帶着不澈底的性質和資產階級自私自利的性質。若要免除這種現象，除了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外，沒有第二個方法。

這樣，我们便得着這樣一個結論．就是新„火星”派的策略，按其客現的意义，正符合着資產階級的願望。宣傳組織上的渙散，甚且主張平民投票，妥協原則，使党的出版物離開党的指導；輕視武裝暴動的責任；把無產階級的一般的政治口号與資產階級君主派的口号混為一談；曲解„革命对專制澈底勝利”的条件，——這些綜合攏来，正造成一個尾巴主义的策略，錯乱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对于问題的認識，破壞其組織，蒙混其覺悟，而蔑視社会民主派的策略，对於達到勝利的唯一道路，使要求共和的一切民衆革命份子都联合到無產階級口号之下的等々问題，全然置之不理。

ムムム　　　ムムム　　　ムムム

我们由分析臨時大会决議案而得到了上面的結論，現在為証实這個結論，且將該问題由另方面来觀察一下。第一，我们来看々那個真直而公開的「孟塞維克」在格魯精„社会民主党”上是怎樣解釋新„火星”派的策略。第二，我们来看々在現時政治局面之下，究竟新„火星”派的口号事实上為誰所利用。

第七節　「排斥政府保守党」的策略

我们在上面已經略為提及「孟塞維克」派提弗利司「委員会」機関報（„社会民主党”第一期）所載的那篇文章：„鄉紳会議與我们的策略”。這篇文章的著者還未完全忘掉我们的党綱，故提出共和政体的口号，但

他对於策略的問題却這樣說：——

為要達到這目的（共和政体），可指出两條道路：或对於政府所召集的鄉紳会議完全置諸度外，用武力推翻政府，建立革命政府，召集立憲大会；或宣告鄉紳会議為我们行動的中心，用武力威逼其人員及行動，强廹他宣告自己為立憲大会——或由他召集立憲大会。這两個策略的分别是很明顯的。現在且来看々，這两個策略中何者对于我们比較有益。

這就是新„火星”派对於我们在上面已經分析过的臨時大会決議案理論的解釋。我们要注意，這篇文章是在对馬島　事件之前發表的，那時候，㴝利根的„草案”完全還未出世。甚致連自由主义者都不能忍耐了，在公開的出版物中曾对政府表示不信任的意見，而新„火星”報的社会民主派，却比自由主义者还要堅忍。他们宣称鄉紳会議正在„召集”，信任專制政府，他那個还未实現的鄉紳会議（也許那是一個„国会”或是一個„参議院”吧？）要我们拿来作為自己行動的中心。是文的著者(提弗里司人)，比較起草臨時大会決議案的人要爽直痛快得多，他不把他所提的两個„策略”比較一下（而仅止無聊的説明了两句），便直説第二個„策略”較有益”。聽他説下去吧：——

第一個策略是你们知道的，目前的革命是一個資産階級的革命，這個革命要造成的新制度不但于無産階級有関，即对于全部資産階級社会亦有関。現

在一切階級都反对政府，連資本家自己也是反对政府的。正在奮鬥的無產階級與正在奮鬥的資產階級在某種意見上是共同前進的，是共同從各方面向專制政府進攻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政府，完全孤立，得不着社会方面的同情。故要消滅這政府是很容易的。俄羅斯的無產階級要以自己階級起来实行革命，那还缺乏覺悟，太無組織。即使它能以自己一階級起来实行，那它实行的不是資產階級革命，而是無產階級（社会主义的）革命了。所以我們為有利於自己起見，應使政府不能得着同盟者，不能離向反对它的各派勢力，不能把資產階級拿攏，而使無產階級陷於孤立的地位。……

這樣，為着無產階級的利益，要使專制政府不能離向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喂：去錯了吧，為什么格魯精的機関報名為„社会民主党"，而不名為„解放"？請讀者注意，這是民主革命之何等世界無双的哲學观呀！難道我們还不明白，這位可憐的提弗里司人对於„資產階級革命"一观念完全陷入了尾巴主义的迷夢嗎？他分析無產階級有在民主革命中可能孤立的危險，但他忘却……忘却了一樁小事……農民！從無產階級可能的同盟者中，他知道且注意紳士和地主，而不知道農民。這还是在高加索說話呀！這樣看起来，我們說新„火星"報不設法把革命的農民提高為自己的同盟者，而反因自己的論調致將自身低降到資產階級君主派的水平綫——

這話難道不对嗎？

……否則，無産階級必然失敗，而政府必然得勝。專制政府就正想達這目的。它在鄉紳会議上，必将貴族，城市，大學等資產階級机関的代表拿攏到自己方面。必将以小的讓步使這些代表軟化，而使他们與政府妥協。政府能得這樣鞏固，便把自己所有的力量來对付孤立的工人民衆。我们的責任，即在於提防這種不良的結果。但要達到這目的，是否可走第一条道路呢？假定我们現在对鄉紳会議完全置諸不理，而自己一心開始准備暴動，到某日某時，我们的武裝勢力便到街上去暴動起來，奮鬥。那時，我们面前不是一個敵人，而是兩個敵人即政府和鄉紳会議。且当我们准備的時候，他们已來得及商量，互相妥協，締造一個于他们有利的憲法，而彼此分割政权。這简直是於政府有利的一個策畧，我们應一律的拒絕……

這才是老实的話了！要决心地拒絕准備暴動的"策畧"，因為在"這時候"政府可與資産階級瓜去分肥！在"經濟派"旧的著作品中可否還找得出與這樣污辱革命社会民主派相似的論調嗎？工人和農民之暴動，再接再厲，此起彼起——這是事实。鄉紳会議，就是蒲利根的勾当。提弗里司城的"社会民主党"公然决定：拒絕准備暴動，而等候鄉紳会議為"行動的中心"……

……反之，第二個策畧，正是要使鄉紳会議受我们

的監視，不給它以按自己意志行動而與政府妥協之可能（用什么方法使鄉紳們不按自己意志行動？不是一紙特别文書吧？——著者）。

我們擁護鄉紳会議，是因為它與專制奮鬥；当這種会議與專政妥協時，我們还是與它奮鬥的。我們用武力把這種会議的代表隔離起来（哼！真是„深奥”的策畧！没有武力在街上争鬥，而„隔離代表”却有武力了。聽呵！提弗里司的同志，吹牛是可以的，但要知道吹牛的大小程度…………——著者），急進的代表們，——我們與之联合，保守党人，——我們将他排斥于政府之外，這樣一来，我們便可将全部鄉紳会議扶上革命的道路。這樣的策畧，使政府常久是孤立的，而使反对政府的力量是厲害的，如此，造成德謨克拉西制度便容易了。

好吧，好吧！現在讓人家去説我們把新„火星”派模仿經濟派的蠢笨太„張大其辞了”吧。這简直與用治粉来对付蟑螂一樣：捉住一個蟑螂，撒些粉在牠身上，然後一棍一棍来打死牠。用武力来隔離鄉紳会議的代表，将„保守党人排斥於政府之外”，而全部鄉紳会議便走上革命的道路了………不用任何„甲可賓式的”武装暴動，而用温雅的態度，好像在国会裏的办法一樣，„强逼”鄉紳会議的代表。

可憐的俄罗斯！人們都説它永远只带歐洲抛弃不用的旧式帽子。現在国会还没有，連蒲利根都还未来得及把

它締造出来，而吟詠国会主义的聲調却是高莫可比了。

……怎樣去干涉這個鄉紳会議呢？我们首先就應要求，要這種会議用普通平等，直接选举权和不記名投票法来召集。在這種选举法頒佈的時候（在„火星”報上頒佈。——著者），應規定选举前宣傳的完全自由（由尼古拉規定么？——著者），即集会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且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权利應完全不受侵犯，政治犯應一律解放。选举的時期應愈遲愈好，因我们要有相当的時间以認識民众并准備民衆。且因召集鄉紳会議的規則，已任命内務大臣蒲利根的委員会起草，故我们亦應强逼這個委員会及其会員（這就是所謂„排斥保守党人于政府之外”的策畧！——著），如果蒲利根委員会不能滿足我们的要求（我们這方向既有正確且費过深思远慮的策畧，不会不能滿足我们要求的！——著者）且把选举权只交給有產階級，那時我们應干涉這個选举，用革命的手段逼迫选举人选举先覺的份子，且在鄉紳会議上要求立憲大会。末了，我们可用種種方法，如巡行示威，罷工，且于必要時，暴動以逼迫鄉紳会議召集立憲大会，或要它宣佈自己為立憲大会。立憲大会的保護者應当是武装的無產階級。二者（是無装的無產階級與被從政府排斥出来的保守党人嗎？——著者）并肩齊進而到達民主主义的共和政体。

這就是社会民主派的策略，只有這個策略方能保証我们的勝利。

讀者不要以為這篇無聊已極的論文是一個什么負責任和没有声望的新„火星”派初出茅蘆的文字。不是的，這是在新„火星”派的整个执行委員会（提弗里司委員会）機関報上發表的。不但如此，這篇無聊的論文，简直還為„火星”報所称贊，該報第一期論„社会民主党”說：

„第一期的内容，已編得有生氣而精粹，可知編輯員兼著者是一位富有經驗的聰明能手……。我们可肯定的說，該報定能很壯麗的執行自己的使命”

不錯的！如果這個使命是在将新„火星”派的思想上的完全腐敗明白告訴人家，那真的可說执行得„很壯麗”。要将新„火星”派低降到自由資産階級机会主义水平綫的情形這樣„有生氣而饒有興趣”地描寫出来，那真個除這位„能手”外，誰也办不到。

第八節　解放派與新火星派

現在我们且来看々関于新„火星”派另外一個有政治意义的証据。

斯脫盧威先生在其最優秀，最可領教的„怎樣找着自己”（見„解放”第七十一期）一文中與我们过激政党的„党綱革命主义”開战。斯脫盧威先生特别是不滿

意我们人〔註〕。致我一方面，对斯先生是滿意也没有的了：在反对新„火星”派的„經濟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完全没有原則的態度一点上，他是我最好的同盟者。斯先生和„解放”報曾經怎樣地在实践上証明了社会革命党党綱草案中对於馬克思主义加以„修改”的反動性，這问題我们当另作討論。当斯先生每次在原則上贊同新„火星”派時，他是如何的誠心帮助了我，関于這一点，我们已經屢次說过〔註二〕，现在不妨重說一次。

〔註一〕„以列寧及其同志等先生之革命主义為比較，則西歐社会民主派如柏柏尔及柯祖基之革命主义实一機会主义也；雖然，即列寧等先生革命主义之基礎，亦已為歷史所洗滌而徹底沈濟焉”。這一棍却打得很猛烈。可惜斯先生只以為我是一個死人，什么都可堆到我身上来。我却只要質问斯先生一下，他便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在何時何地我曾把„柏柏尔和柯祖基的革命主义”叫做机会主义？在何時何地我曾主張在国际社会民主派中創立特樹一幟的方向，——不與柏柏尔和柯祖基相同的方向？在何時何地我與柏柏尔和柯祖基之间曾經發生过意見上的分裂，——與柏柏尔和柯祖基之间所曾發生的異見（如関于布列斯拉夫的土地问題）相似的，我曾有过沒有？請斯先生試一回答這三個问題。

而对於局势方面，我们應告訴的是：自由資產階級無所無地不用它慣用的手段，就是告知国内自己的同情者說，国内的社会民主主义是最愚蠢的，而其处在隣国的同志却是„好孩子”。德国資產階級舉柏柏尔和柯祖基学法国社会主义者——„好孩子”已經不止數百次。法国資產階級不久以前也要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好孩子”——柏柏尔為模範。斯先生，這是人々知道的舊套子！只有小孩子和新娘子能被你引上這釣鉤吧！国际革命社会民主派在党綱和策略的一切大问題上是完全一致的，——這是一個毫無疑义的事实。

[註二]讀者應回憶„不做什么？”（„火星”第五十二期）那篇文章，曾為„解放”大吹大擂地襃揚一頓，它認為這是一个对机会主义者表示讓步的„顯著的轉变”。新„火星”派之原則上的趋向，曾為„解放”報所特別嘉許，以為這是德国社会民主派分裂的表徵。関於托洛次基所著„我们的政治責任”一書，„解放”報謂是書著者的見解與前此„工人事業”派克里秋夫斯基，馬丁諾夫和亞坡洛夫等所曾發表的見解同一性質。馬丁諾夫的„两個專政”亦為„解放”報所称贊。還有斯達洛屋尔对於老„火星”的口号：„先要分开後再联合”所懷的不滿，也為„解放”所特别同情的。

斯脫盧威先生那篇文章中间有許多最有與趣的見解，我们現在不能詳論，只得畧提。斯先生預備„建立一个俄国民主派，其力量不在於鬥爭，而在於階級協作”，同時，„在社会上有特权地位的智識階級”（斯先生所特别崇拜的„文明貴族”之類）„把自身所處社会地位的能力”（錢袋的能力）用於這個„超階級的”政党。斯先生表示願意把人们所說„資產階級已經害怕了，賣了無產階級且賣了自由的过激語套”不適用于俄国的情形告訴一班青年（我们十分歡迎這種„願意”。馬克思主义中這種„語套”的得着証明，莫过於斯先生对于這一„語套”之宣战。斯先生，請你做起来吧，不要把這個很好的計劃擱遲了吧！）

对於本題重要的，是要指出俄国資產階級中這位在政治上很灵敏，且对於風色的絲毫变動都能注意得到的人物，現時用些什么實際口号在這裏战鬥。第一是共和政体的口号。斯先生確信這个口号，現時还為„民衆所不瞭解，且為民衆所見外”（忘記了添上一句：民衆是瞭解的，不过于資產階級不利！）。我们願斯先生能到我们的小組会議和群衆会議上去看々，工人们对這问題有什么回答！或許說工人们不是民衆？那末，農民呢？拟斯先生說，農民的共和主义是„幻稗的共和主义”（„驅逐沙皇”），——但是自由資產階級相信將来代替幻稗共和主义的不是有覺悟的共和主义，而是有覺悟的君主專制主义！斯先生，這还要看情境和何才能決定

哩。無論專制政府也好，資產階級也好，都不能不反対沒置地主土地以根本改良農民的生活，而工人階級在這一点上卻不能不襄助農民以達到目的。

第二，斯先生說，„国内战争中攻擊人家者，総是不対的”。這個見解已經與上述新„火星”派的傾向很相接近。我们当然不能說國内战争中攻擊總是有利的，——反之，有時候一定要有臨時的防禦策略。但是像斯先生所提出的這種見解，若拿来應用於俄国一九〇五年的事件，那就是恰々表示着一部份„过激語會”的現实性（„資產階級害怕，且出賣自由”）。現在誰不想攻擊專制政府，不攻擊反動勢力，不準備這個攻擊，不去宣傳举行這个攻擊，——他就是空負革命党人的名字，絲毫沒有價值。

斯先生很非難„秘密”工作與„暴動”（這是„葫蘆裡的暴動”）。他以„接近的群众可能！”為現点，蔑視„秘密”，又蔑視„倒乱”。我们只要问向斯先生：知像„他看来是極端革命的人所著的„做什么？”一書中，他能否指出宣傳倒乱的話語？致於„秘密”的问題，譬如我们與斯先生之间的分别究有多大？不是我们两個人都為„秘密的”報紙而工作且„秘密”地運到俄国以供解放社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組織之用嗎？我们的工人集会常是„秘密的”——這是一個缺点。但是解放派先生的集会呢？斯先生，試问你有什么可在主張秘密的人的面前誇大自吟？

識然不錯，工人们要得到槍枝，非加倍的栽磊不可。在這一点上，斯先生却比較說的更痛快了。你们聽他說吧：„致於武裝暴動的爭情，或革命的技術方面，那只有把民主主义政綱在群眾中普遍宣傳，才能造成整個武裝暴動之社会心理上的條件。這樣，即使根拠把武裝暴動看作是為現代自由而战的必然的結果一觀点（我所不贊同的观点）来說話，——使群眾認識民主改革的思想，亦还是最根本，最必要的事情”。

斯先生費尽氣力地想離開问題的本身。他不說為革命勝利，故有武裝暴動之必要，而只說暴動之必然。現在暴動已經開始不过它是無准備的，是自然爆發的，是散漫而無联系的罷了。自然誰也不能担保這個暴動一定能擴大到總個的民眾武裝暴動，因為這要看革命力量(這種力量的大小，要在实际战鬥中才能完全度量出来的）如何才能決定：要看政府與資產階級的態度如何，又要看其他現在不能的確計标出来的許多情况如何。依斯先生那種对於具体事变絕对確信的態度来說「必然」，简直是徒費口舌。說是要說的，不过斯先生若想做一個革命的党人，他便應說：為着革命勝利，是否有暴動之必要，是否有積極地主張宣傳，且從速努力地准備這暴動之必要。斯先生不是不瞭解上面這两個意思间的分别：譬如他不把在目前革命过程中獲得普通选举权之必然的问題（对于政治家費爭論而且没有实踐意义的问題）拿来埋没那每个民主主义者所不争論的普通选举权之必

要的问題。斯先生有意把暴動必要的问題放在一边，這就很明显的表示了自由資産階級政治態度的本質。資産階級是準備與專制調和而不把專制推翻的，——這是第一；第二；資産階級無論如何總是厭惡用争，而拿起槍来对付工人的。這就是斯先生避开武装暴動之必要一问題的實際意义。也就是斯先生避開這问題不提，而祇拿什么„社会心理”的條件和預先„宣傳”的问題来敷衍的原因。一八四八年的法蘭西革命，在要抵抗政府的武裝力量，群衆運動„已發展到”武装战用之„必要”口頭上的批評（在準備時期必要的批評）己只是表示資産階級的„束手無策”和懦怯的時候，国会中資産階級的代表们还在那裏起草决議案，宣言，和計劃，举行„群衆宣傳”，造成„社会心理的條件”等事，——現在的斯先生正是這樣：避开暴動的问題，拿口頭上的話語来敷衍。斯先生這樣很明显的表示，却是許多社会民主主义者所看不清楚的，就是革命時期與平常一般的，歷史的，準備時期之區别，即在於群衆的感覺，群衆的怒潮，群衆的認識，應当在行動上表現出来，且正在行動上表現出来。

平凡的革命派，不懂得講話也是一種事情；這对於一般的歷史，或对於没有群衆公開政治運動（這種是為任何道路所不能代替的，也是為任何高明手段所不能引起的）的歷史時期是毫無辯解的。革命党中的尾巴主义者，不懂得在革命時期已經開始，回的„上層建築物”

已經全部動搖，創造新上層建築物之階級和群衆的公開政治鬥爭已經成為事实，国内戰爭已經開始的時候，还只「仍照慣」的只„講話”，不提出直接„作事”的口号，只以造成„社会心理条件”和„宣傳”為藉口而避開動作，——這就叫做死無生氣，「專尚清談」，或叫做出賣革命，对革命变節。法国民主主义資産階級的失敗者——即這種变節和清談懸挙在歷史上永誌不忘的標幟。

你们要不要解释俄国社会民主運動歷史上平凡革命派與尾巴主义间的這個分别？我们能对你有個這樣的解释試一回想一九〇一年和一九〇二年的事，這两年的功夫过去还不久，而現在我们便感覺得那是好久以前的事实。当時巡行示威運動開始了。平凡的革命派便大叫„衝鋒”起来（見„工人事务”報）〔註一〕，大發„流血的傳單”（我还記得這傳單是由柏林發出的），攻擊„文學派”和以報紙為方法施行全俄宣傳運動的官僚世界的思想（拉德金）〔註二〕。尾巴主义派当時的態度却是相反，他们宣傳説，„經濟鬥爭為政治煽動之最好的方法”。那時候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曾作何態度呢？它对於上面這两派都是反对的。它曾痛罵那些関於衝鋒的糊鬧和輕薄的狂叫，因為当時大家都知道或應当知道公開的群衆運動还沒有爆發。它曾痛論尾巴主义之不是，且直接提出武装暴動的口号，甚且是全民暴動的口号。自然這個口号的在当時用意不是在於即刻号召群衆去暴動（斯脫盧威先生在那時候是找不出我们举行„倒乱”的口号的），

而是一種必要的結論，是要去„宣傳”（馬先生到了現在才想到這個宣傳，——他对這些问題，總是事後数年才知道），要去准備為那些手忙脚乱，咬文嚼字的自由主义者所„悲歎驚嘆，不合時節”，僅到現在才講到的„社会心理条件”。那時候的宣傳與煽動，煽動與宣傳，因客观情形的要求，的確是首要的任务。那時候准備暴動的中心工作是（曾經在„做什么？”一書中提出）出版一全俄政治机関報，不过原定每週出版一次的計劃未得实現罷了。那時候的口号是：做群众的鼓動工作不要直接的武装暴動；做准備社会心理条件的工作，不要輕薄的狂叫——這是那時候革命社会民主派唯一正確的口号。現在呢，這些口号已成為古董，只能為遮蔽解放派的假面具和新„火星”派尾巴主义的工具了！

〔註一〕一九〇一年的二月與三月间，許多地方曾行举行學生與工人的群众遊街運動（二月十九日，哈尔柯夫城為農奴解放四十週年紀念，举行遊街示威，继而起者，有莫斯科，也得堡和嘉在等处）。二月二十三——二十六数日内，莫斯科的示威運動特别表現的勇敢，工人群众曾擊退干涉示威運動的哥薩克。莫京之有巷战，此為第一次。這時候，„經濟派”的机関報„工人事务”（前此反对普列漢諾夫與專制政府激烈鬥争的）便大吹大雷地叫喊起来，用大号字發表一篇論文，題為„歷史的轉变”，主張„應有強有力的組織，以向專制

政府斷絕猛擊”。列寧關于這問題曾發表一篇評論：„從什么做起？”（一九〇一年五月間），說明在現時革命階段中号召群衆起来暴動為糊塗，——要号召暴動，須先做很多的准備工作，如組織和訓練群衆，出版一全俄政治机関報等。只有時々跟着群衆尾巴上跑的人，才可一見政治運動有高漲的傾向，不經任何过渡時期，便号召群衆起来直接暴動斷絕。——摘譯自本書附録。

〔註二〕拉德金為„自由社”的首領，俄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前，該社存在于国外。其思想是一種經濟派和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混合物。他們主張„恐怖行動”，列寧稱之為„恐怖主义的經濟派”。——摘譯自本書附録。

或許是我錯悞了吧？或許革命現在还未開始吧？各階級的公開政治運動時期現在还未到来吧？或是国内战爭还沒有，且武器的批評不應当現在就成為一定必要的批評的武器吧？（註）

〔註〕馬克思在一八四三年„批評黑智兒的人权哲學”一文裏說：„批評的武器，自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評，物質的力量，自然應以物質的力量才能推倒”。

你只要看，自身的週圍，從讀書室去到街上，便可回答問題這些。難道政府不已經開始国内战爭，到處槍殺徒手的和平群衆嗎？難道保護專制政府的武裝百人團

不已開始向群衆運動進攻嗎？難道資產階級（甚致連資產階級）不已覺悟到有〝公民警察〞（ГРАЖДАНСКАЯ МИЛИЦИЯ ）的必要嗎？難道斯先生——思想上很溫和，頭腦很清楚的斯先生不正在說（喂！只在口頭上說，以便避隱起來吧！）〝公開的革命行動〞（像我們現在這樣！）〝為現時訓練民〞最重要的條件之一〞嗎？

誰是明眼人，他就不能不毫無疑义的知道，現在的革命党人对於武裝暴動的问題應持若何態度。試閱現時能夠稍許影响群衆的机關報，便可曉得对於這问題的態度有三種。

第一種態度，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決議案所持的態度。該決議案承認且大声疾呼的說，現在普遍的民主革命運動已經發展到武裝暴動之必要。為暴動而組織無產階級，是目前急不容緩的責任，是全党最实际，最重要且最必要的責任。且為武裝無產階級與保証直接指揮暴動之可能起見，已決定採取各種最有力量的办法。

第二種態度，是〝解放〞報中原則上的論文，〝俄国立憲派的首領〞（斯先生不久以前曾把歐洲資產階級的机關報〝法国報〞這樣的称呼过），或俄国進步資產階級的首領所持的態度。関於暴動必然的意見是他們所不同意的。由他們看來，秘密與倒乱——是愚蠢革命派的專長手段。共和主义——是糊闹的办法。武裝暴動——

老实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最根本，最主要的事情”，是向群衆宣傳且准備社会的心理條件。

第三種態度，是新„火星”派臨時大会決議案所持的態度。他们以為我们的責任——是在於准備暴動。有計劃的暴動是沒有可能。有利于暴動的條件，是由於政府的散漫，我们自己的煽動和我们自己的組織而造成。只有在那些条件之下„技術上战鬥的准備才能得着多少真正的意义”。

新„火星”派的態度只是這樣嗎？只是這樣。暴動是否成了必要，無産階級的首領新„火星”派对於這問題是還不知道的。為直接鬥爭而組織無産階級的責任是否可容遲緩，他们也還不明瞭。他们以為不要号召採取最有力量的办法，而对於他们最重要的（這是在一九〇五年，而不是在一九〇二年）是在于一般的解釋這些办法，在些什么条件之下這些办法„總能”得着„多少真正的”意义…………

新„火星”派的同志们，你们傾向馬丁諾夫已使你们走到什么地方了，現在該看清楚了罷？你们政治哲學已再成了解放派的哲學，你们自己明白了罷？——你们自己成了（固然這是違背你们的志願且未按照你们的覺悟）資産階級君主派的尾巴，你们明白了罷？你们重犯舊錯，「專尚清談」，忘掉了一種情形，即（用斯脫盧威先生那篇不可忘記的文章中不可忘記的話来形容）„公開的革命行動為現時訓練民衆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這話你们現在該明白了罷？

第九節　何謂在革命的時候持極端反對政府党的態度？

我们現在且回頭来講臨時政府的问题。我们在上面已經証明，新„火星”派的策略不是把革命推往前進，——若要有這可能，他们便要拿自己決議案来保証，——而是把它推往後退。且已証明，與不徹底的資産階級奮鬪時致使社会民主派自己掣肘，且不能提防自己不解于資産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者，就是新„火星”派這個策略。決議案的前題既不正確，自然由此所得的結論也不正確，所以該決議案說：因此，社会民主派不應当以奪取政权或在臨時政府中分得政权為目的，而應持極端革命之反对政府党的態度”。試以他们這一結論的前半節——規定自己目的的前半節来看一看。新„火星”派是否把革命对專制的徹底勝利看作是社会民主派行動的目的呢？——是的，他们是這樣看的。不过他们不会界說徹底勝利的條件，而與解放派所說的條件混作一塊。再，他们是否把臨時政府與暴動看得是有密切联系的呢？——是的，他们是把這兩件事看得是有密切联系的，且他们直說臨時政府是„由民衆暴動勝利產生出来的”。末了，他们是否以指導暴動為自己的目的呢？——是的，他们固然與斯脫盧威先生一樣，不承認暴動是必要的，且是急不容緩的，但他们同時卻又與斯先生不同，謂社会民主

小應設法使暴動 自己的影响和指導，并利用之以实現工人階級的利益。

你们看，這不是很有联系嗎？我们的目的是使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革命的暴動受我们的响影和我们的指導，并利用之以实現其自的利益。所以我们的目的，是在暴動的時候指導無產階級，又指導革命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非無產階級的部份”），換言之，即社会民主派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分開”来指導暴動。我们的目的，是在使暴動勝利而建立臨時政府（„由民衆暴動勝利而產生的臨時政府”）。因此……因此我们不應以奪取政权或在臨時革命政府中分得政权為目的！！

我们的朋友，無論怎樣也不能使得頭尾相合。他们在避向暴動的新先生之現点與承認要即時進行這個问題社会民主派之現点之间，搖擺不定。無政府主义在原則上是承認一切参加臨時革命政府都是对無產階級变節的而馬克思主义，却在社会民主派对暴動有指導影响的条件之下，是要求参加臨時革命政府的，——我们的朋友还在這两者之间搖擺莫定。他们因沒有何獨立的態度：不像斯脫奧威先生的態度一樣，願意與「沙皇」妥協故此，他們當避向暴動的问題，也不像無政府主义者的態度一樣，否認一切„自上而下”的行動，否認对于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切参加。新„火星”派把與「沙皇」勾結和对「沙皇」勝利的兩件事弄得糊塗莫辯 他们想参

加資產階級的革命。他们比馬丁諾夫的„兩個專政”稍許進步了些。他们甚致贊同指導民衆的暴動——以便於暴動勝利之後（或許在要直接勝利的時候？）馬上放棄這個指導，換言之，以便於暴動勝利之後，不利用這個勝利的結果，而把這些結果完全交給資產階級。這在他们看来，是叫做„利用暴動以实現工人階級的利益”。

沒有必要再将這個糊塗观念分析下去了。現在就他们„持極端革命之反对党的態度”一辞句来观察一观察這個糊塗观念的起源，却較有益处。

我们有一個国际革命社会民主派所大家認識的原則。這是完全正確的原則。是在有国会的国家裏一切反对修正主义或機会主义的共同方法。是抵抗国会主义，米里蘭主义，伯因斯坦派（註一），意大利改良主义者都拉底（註二）一流人物的必要的公律。我们那些善良的新„火星”派对於這一原則大吹大雷，且把它運用起来……這完全不合時節。現在什么国会都沒有，決議案中却罵起国会鬥爭的原則来了。„反对党”一观念，是在沒有人真正說到暴動時政治局面的一種反映和表現，——現在的政治局面，是暴動已經開始，且凡是革命的党人都正在討論对於這個暴動的指導，——在這種情形之下，„反对政府党”的观念無意思的被搬到這里来了。現時的革命要求於勝利時必要自上而下的行動——正在這時候，他们却还大声疾呼，表示願意如存

以前情况之下一樣，„保持”僅止„自下而下”的行動。

〔註一〕伯恩斯坦（Эдуард Бернштейн）——是德國有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於一八九九年曾著„社会民主主义的前題”（Предпосылки Социализма）一書，其內容，主張修正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和社会民主派的实际。——譯者。

〔註二〕都拉蒂（Туратти）——為意大利改良派的首領，主張階級協作，參加資產階級的政府，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時，他的態度是騎墻的和平態度。——譯者。

我们的新„火星”派真糊塗之極！甚致当他们提出社会民主派的正確的原則時，他们还是不会運用這原則。他们不想到，在没有国会，而革命已經開始的時候，在国內战爭和暴動已經爆發的時候，国会鬥爭的观念和術語是怎樣的变成了自己相反的方面。他们不想到，在現時條件之下，上書建議應以遊街示威為方法来实現，請願質疑應以武裝民衆攻擊行動為方法来实現，反对政府的態度，應以武力推翻政府為方法来实現。

俗傳有学道賀弔喪的愚人，当遇見送葬的人，他道賀，遇見接親的人，他弔孝，崇拜馬丁諾夫的人也是一樣不識時節，正当他们自己眼見着武裝直接行動已經開始的時候，却又来大诵那和平国会主义的教訓。臨時大会的決議案開始說„革命的澈底勝利”，„民衆的暴動”，從

面却正々經々地提出„極端反对政府党”的口号，——這是何等的奇怪呀！先生们，你们也想々吧：究竟什么叫做在暴動的時期自己持„極端反对党”的態度？這是説批評政府，还是説推翻政府？是説投票反对政府，还是説在公开的战場上擊败政府的軍事力量？是説拒絶補充政府的国庫，还是説用革命的手段奪取這個国庫，以充暴動，武装工農，召集立憲大会之用？先生们，你们該開始明白了罷；„極端反对党”的观念是表現着消極的態度——批評，投票反对，拒絶？為什么是這樣？因為這個観念是僅止在实行国会鬥争，而誰也不以„澈底勝利”為目的的時期才可運用的。你们該開始明白了罷：在政治上受压迫的民衆為勝利而已起来作堅決鬥争的時候起，這情形就根本变動了哩？

工人们現在向我们，是否要努力来進行不可延緩的事——暴動呢？要使已經開始的暴動能得勝利，應怎麼办才好呢？怎樣利用這個勝利呢？那時候可以而且應当实現一個什么党網呢？深解馬克思主义的新„火星”派回答説：保持極端革命之反对党的態度……哼……我们曾經叫這些英雄為筆筒裏看天，胸襟窄狹，不識時务的上等名角，難道不是对的？

第十節 „革命的公社”與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

新„火星”派臨時大会对於新„火星”報所主張的

無政府主义的態度（僅只„自下而上”，而不„自下而上，同時又自上而下”）没有堅持到底。主張暴動，而不主張勝利和参加臨時革命政府，——這種愚笨未免太打眼了。因此，決議案对馬丁諾夫和馬尔多夫的意見只得添上了一些申明與限制。我们現在且来省々這些申明。該決議案說：

„這個策畧（„保持極端革命之反对党的態度”）对於部份的與非根本的（ЭПИЗОДИЧЕСКИЙ）奪取政权之便利，自然不是除外的，对于在這一城市或那一城市，在這一區域或那一區域建立革命的公社專為促進暴動之擴大和政府組織之破壞一意見也不是除外的”。

若果是這樣，那就是說在原則上主張不但自下而上的行動，而且要自上而下的行動。那就是說，馬尔多夫在„火星”報上（見第九十三期）所做的那篇評論便要推翻（註），而承認„前進”報所主張的策畧：——不僅„自下而上”，且要„自上而下”是正確的了。

（註）馬尔多夫曾在„火星”報第九十三期（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七日）發表一篇評論，題名„工人的政党與„奪取政权”為我们最近的責任”。馬尔多夫在這篇文章中批評巴尔務司（ПАРВУС）與托洛次基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之後所提出的無産階級奪取政权的口号。馬尔多夫主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應持極端革命之反对党的態度。——摘譯自本書附錄。

再，這裡所謂奪取政权（固然是部份的，非根本的等々），不言而喻的是不僅以一個社会民主派和一個無産階級的参加為前題的。這是以主張民主革命且積極参加這個革命的不僅只一個無産階級為前題的。這是以暴動為„民衆的”暴動，参加這個暴動的尚有„非無産階級的部份”（這是臨時大会派決議案中関於武裝暴動的術語）——即資産階級的部份為前題的。這是說，承認社会主义者與小資産階級一同参加任何臨時革命政府都是对工人階級変節的原則，被臨時大会「抛到九霄雲外」去了，這正為„前進”報所曾要求的。若謂造成変節的行為，只是部份的，非根本的，和區域的等，那还是不能說這個„変節”便成了不変節。這是說，把参加臨時革命政府拿来與卑鄙的饒列司主义相对比一把戲，也被臨時大会「抛到九霄雲外」去了，——這也正為„前進”報所久已要求的。若謂這個政府的权力不普及於許多城市，而只及於一個城市，不普及於許多區域，而只及於一個區域，那还是不能說這個政府便不成為政府了，同樣，任憑你把這個政府怎樣命名，那這個政府，还不失其為政府。這樣，新„火星”報对於這問題曾經想要持的原則上的態度，已為臨時大会所推翻。

臨時大会既在原則上主張建立革命政府和参加革命政府，那么，它对於這種政府之建立和参加所規定的限制又有何意义，——現在且就這点来觀察一觀察。„非

根本的"與„臨時的"二觀念有何分別，我們不知道。恐怕這裡是僅以一„新學"字眼來敷衍那思想上的糊塗吧。就這個字眼來看，表面上好像是„深奧点"，但事实上——這只是表示更不明白，思想更混乱罷了。在某都市裏或某區域裏部份„奪取政权"的„便利"與參加全国臨時革命政府有何分別？像彼得保這樣曾經发生过一月九日事变的地方難道不是那些„都市"中之一嗎？像高加索這樣大过許多国家面積的地方，難道不是那些區域中之一嗎？難道監獄，警察局，会計处等々的问題甚致在一個都市裏（且不說在一區域裏）„奪取政权"時不会發生嗎？在力量不夠，暴動不能得完滿勝利和徹底勝利的時候，自然有些部份的，都市的，……臨時革命政府之可能，——誰也不否認這个。但是這與问題有什么関系？不是你們自己在決議案的開始一段中說„革命徹底勝利"，說„民衆暴動勝利"的話嗎？分散無產階級的注意力與目標——指導它去作„部份的"鬥争，而不指導它去作共同的，一致的，全部的和完滿的鬥争，——這種無政府主义者幹的事情，社会民主主义者從何年何月起開始為他們負責代庖的呢？你們預定在一都市裏„奪取政权"，同時自己又說是為„擴大暴動"，——說們可否說把它擴大到其他的都市呢？可否希望把它擴大到其他一切都市呢？先生們！你們的結論與你們的出發点是同樣動搖且無系統，矛盾且非一貫的。俄国社会民主工黨第三次大会関於一般的臨時革命政府的问題，給

了一個完滿而且明顯的回答。這個回答对於部份的臨時政府是包括在内的。而臨時大会的回答，却把问題的一部份任意割分出来，而逃避（但沒有成功）全盤的问題，弄得一團糟，什么都不辯清楚。

何謂„革命的公社”？這個觀念與„臨時革命政府”一觀念有分别沒有？若是有分别，則分别何在？這是臨時大会派自己所不知道的。他们的革命思想之乱雜，如常有的事实一樣，使他们犯了革命的辞令病。在社会民主派代表会議的决議案中運用„革命的公社”一術語，除為一種革命的辞令外，别無他意。這類的辞令是無異拿已成过去之„動心奪目”的術語以遮蓋未来的責任，曾為馬克思所歷次非難。在歷史上有过作用的漂亮術語，在現在的時候却成了空洞而有害的輭語，小孩玩的衝天炮。我们現在对於工人與全体民衆應給一明白確定的觀念，為什么我们要建立臨時革命政府，若已經開始的民衆暴動結果能得勝利，且我们对臨時革命政府將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應实現一些什么改革。這些问題才是政治首領目前應回答的问題。

俄國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对于這些问題曾有最明顯的回答，它对我们將要实現的改革曾歸納成一完滿的政綱，即最小限度的党綱。而„公社”一名詞却什么回答都沒有給，僅只使人家「四顧無聊」，埋頭聽着荒遠的鐘声罷了。歷史上的事实，如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其名声对於我们愈寶貴，則我们若不析它的錯誤

與当時的特殊条件，便絕不可任意借用。如若不然，那便要重犯為恩格思所恥笑，对於「公社」一切行動都拜地秦維的白朗基派（一八七四年白朗基派的〝宣言〞）的錯誤。若有工人对臨時大会派向民決議案中所述這個〝革命公社〞的事情，我们的臨時大会派將怎樣說法呢？他只能說，歷史上〝革命公社〞一名詞是指的一個工人政府，這個工人政府曾經不会且不能瞭解民主主义革命與社会主义革命問題的分別，曾把為共和政体而奮鬥的責任與為社会主义而奮鬥的責任混作一塊。曾不会以軍事手段猛烈地攻擊凡尔塞曾犯了不佔領法国銀行的錯误等了。總之，你们在解釋這問題時，無論拿「巴黎公社」為例也好，拿其他公社為例也好，你们的回答只有一個，即這樣一個政府，應該不是我们的政府。這個回答是好的，別無他話！可是関于党的实踐党綱一声不响，不问必要與否，在決議案中開始講投歷史況来，——是否証明這是一種書呆子的清談與革命党人的儒弱呢？有些人空費力量的非难我们，說我们的錯误是在把與任何〝公社〞不同的民主革命與社会革命混為一談，上述那種情形，不正是表示臨時大会派犯有這種錯误嗎？

臨時政府（把它名為公社是不適的）的目的，在於〝專為〞擴大暴動與破壞政府的組織。〝專為〞二字的本意，是說別開其他一切的責任，而為實施〝自下而上〞行動一总笨理論的口供。這種別開其他責任的態度，仍舊是表示一種近視和空浮。〝革命的公社〞，即革命的政

权（甚致在一個都市裏的革命政权）必然要执行（不管他臨時的执行也好，„部份的非根本的"执行也好）国家的一切事务，若在這裏便害怕起来，把頭躲在被窩裏面，不顧实际，——那就是愚蠢之極。這個政权，一應規定八小時的工作時間制，二應設立工人監督工厰所，三應办理免費的普通教育，四應規定審判官的选举制，五應設立農民委員会，以及其他等々事务——總之，這個革命政权定要施行許多的改革。把這些改革都歸納到„促進暴動之擴大"观念，——無異是說廢話，且於必要澈底明白的地方，反而故意使它更不明白。

*　*

*

新„火星"派決議案最後的一段中，無新的材料可供我們批評本党中„經濟主义"重新發生原則問題之用但這一段却更可以另方面証明上述的分析。

這一段說：

„僅祗在一種情形之下，社会民主派應自動的運用自己一切力量，以求握得政权，且掌握這政权在自己的手裏應尽可能的求其長久，——這種情况，就是要假設革命已經蔓延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已達到相當（？）成熟的西歐各先進国家。在這種情况之下，俄国革命範圍在歷史上所受的限制才能大大地推開，走上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的可能才得出現。

社会民主派採取的策略，是使社会民主党在全部革

命期间对革命行程中，切此覆彼起的政府保持着極端革命之反对派的態度，同時，最好能夠准備起来，俾於政府权力落到（？？）自己手裡来的時候，能利用之”。

這一段中的根本意思是„前進”報曾屡次提及的，它曾屡次説，我們不應害怕（如馬丁諾夫害怕一樣）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完全勝利，就是不要害怕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因為這種勝利，能使我们喚起歐洲的無産階級而歐洲社会主义的無産階級消滅資産階級的压迫，同時就可帮助我们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但請你们省々，這個意思就新„火星”派解釋起来，是如何的减色了。我们且不談枝葉的问題——比如説，政权似乎能„落到”有覺悟的政党手裏来，能„落到”認奪取政权的策畧為有害策畧的政党手裏来；如歐洲实現社会主义的条件不僅已達到相当的成熟，而已達到一般的成熟；又如我们的党綱不知道任何社会主义的改革，而只知道社会主义的革命。現在只拿„前進”報與臨時大会决議案二者在思想上的主要和根本異点来觀察一觀察。„前進”報对於俄國革命的無産階級曾示知以積極的責任——在爭得德謨克拉西的奮鬥中達到勝利，且利用這勝利以轉延革命於歐洲。决議案却不懂得我们這個„徹底勝利”（不是新„火星”派所説的那種„徹底勝利”）與歐洲革命二者间彼此的联系，故所説的不是無産階級的責任，不是無産階級勝利的希望，而是説明一般可能中之一個可能：„假設革命已經蔓延到”……。„前進”報已直接

了當的指明出来（且這些指示已載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的決議案），究竟怎樣可以而且應当„利用政府权力”以求無產階級利益之实現，說明在俄国現時社会發展的階段上可能而且必要首先实現什么，以作為社会主义奮鬥之民主主义性質的先決条件。決議案却是失望的跟着尾巴後面跑，它說：„最好能夠准備起来，俾……利用”，而不会說明怎樣能夠，怎樣准備，怎樣去利用。譬如我们知道，新„火星”派„能夠准備起来，以利用”党中的指導权位，但是問題不在這裏，問題是在於新„火星”派直到現在对於這種利用的經驗及其准備不能夠保証使可能成為实際。

„前進”報已正確說明，究竟有何種实际的„可能以掌握政权在自己的手裏”，——這個可能即在於民主革命之工農專政，在於工農联合之群衆力量，因為只有這力量能夠征服一切反革命，在於民主主义改革一点上工農利益之必然一致。臨時大会的決議案在這問題上也沒有絲毫積極的回答，而僅用些遁辭關這問題。以避不知要在俄国掌握政权，自然應根据俄国階級力量的成份說話，應根据俄国目前民主革命的條件說話。不知歐洲無產階級之勝利（且自革命移到歐洲起至無產階級勝利止，还有相当時间之距离）定然引起俄国資產階級之大反革命，——俄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決議案对于這个反革命力量的意义已有估計，而新„火星”派的決議案関于這问題却一字不提。因此，若是除無產階級

外，我们不能同時拿住農民作為争得共和政体與民主主义之力量，則„掌握政权”的事将成失望。但若這事将不成失望，若„革命对專制澈底勝利”能予吾人以„掌握政权”之可能，——那我们便應明显的指出這種可能來，并積極的使這種可能由理想变為事实；不但應提出革命可能移到歐洲的实际口号，而且應提出怎樣移到歐洲的实际口号。社会民主派的尾巴主义者，總是藉口於„俄国革命範圍在歷史上所受的限制”，這種藉口，只是掩蔽他们对于這个民主革命的責任與無產階級在這个革命中的領導作用瞭解之窄狭罷了！

反对„民主革命之工農專政”一口号的意見有好幾種，其中傳佈最普遍者，謂專政應以„共同意志”(ЕДИНАЯ ВОЛЯ)為条件，而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無共同意志之可能。這種意見不澈底，因為它对„共同意志”一观念，是根據抽象的„形而上”的態度來解释的。不知意志在某一時候是可以同共的，而在另一時候是不可以共同的。在社会主义的问題上和為实現社会主义的鬥争中無共同意志，但這不是説在民主主义的问題上和為实現共和政体的鬥争中也無共同意志。如果忘了這点，就等于是忘了民主革命與社会革命在邏輯上和歷史上的分别。如果忘了這点，就等於是忘了民主主义革命的全民性質：若是„全民的”，那就是説這裏有一個„共同的意志”，因為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一個实現全民需要與要求的革命。超乎民主主义的範圍以外，自然説不上無產

阶級與農村資產階級之意志共同。這兩個階級間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但以民主共和制為基礎，這種階級鬥爭將成為爭得社会主义之最深刻且最普遍的民衆鬥爭。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像世間一切存在的物件一樣，是有其过去與將来兩方面的。其过去的方面為皇政，農奴制度，君主，特权等。在反对這些过去的成份時，與反革命鬥爭時，無產階級與農民有〃共同意志〃之可能，因為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其將来的方面——是反对私有財產制，僱傭工人為反对主人而鬥爭，為社会主义而鬥爭。這裏却沒有共同意志的可能。因為這裏的道路，不是由專制達到共和的道路，而是由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達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歷史上具体的事件中，过去的成份與將来的成份自然沒有這樣分明，前一道路與後一道路總是交相綜錯。僱傭勞動及其反对私有財產制之事实，在專制之下也是有的，而且它在農奴制之下就已萌芽了。但這不是不妨碍我们把社会發展的过程在邏輯上和歷史上劃分為數大時期来观察。我们都是主張把資產階級革命與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兩对立個的東西，而且都是主張必要把這兩个革命嚴厲分開的；但是因此便能否認歷史上前一革命與後一革命的各個成份是交相錯雜的嗎？難道在歐洲的民主革命時期中，不曾有过許多社会主义運動與社会主义的企圖嗎？又難道在將来的歐洲社会主义革命時，不

還有許多帶着民主主义性質的問題需要完滿解決嗎？

凡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應時刻不忘無產階級為着社会主义是必然要與民主共和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鬥争的。這話毫無疑义。唯其如此，所以社会民主党應是一独立的嚴厲的階級政党。唯其如此，所以我们與資產階級„合作”是臨時的性質，所以„对待同盟者，應如对待敵人一樣”，取嚴厲監視的態度。凡此等々，也都是毫無疑义的。但若因此便忘記，不理或輕視目前臨時过渡的緊急責任，那便是笑話，是反革命。與專制鬥争——是社会主义者的一個臨時过渡責任，但若不理或輕視這個責任，便無異对於社会主义變節，為反革命当工具。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自然只是社会主义者的一個臨時过渡責任，但若在民主革命的時期置這責任于不理，那簡直是反動。

具体的政治責任，應在具体的環境中提出来。一切情况都是相对的，流動的，變迁的。德意志的社会民主派，没有把共和政体的要求載入自己的党綱。他们那裏的情况不同，故共和政体的問題與社会主义的問題在实踐上很難分開（固然恩格思在一八九〇年批評愛尔富政綱(註)的時候，也曾提醒德国人，不要輕視共和政体，以及為争得共和政体而奮鬥的意义）。俄国社会民主派中，連關於党要取消綱裏和日常鼓動工作中共和政体要求的問題都未曾发生过，因為在俄国這樣的国家，要說共和政体問題與社会主义問題有不可分離的聯系，簡直

無從起齒。一八九八年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專心提出共和政体的问题作為首要的问题，是一種尽人皆懂，不引起任何非難的自然現象。如果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一八四八年把関于共和政体的问题放在一边不理，那他们便成為革命的直接叛变者了。沒有抽象的真理。凡真理總是具体的。

〔註〕德国社会民主派的爱尔富政綱（ЭРФУРТСКАЯ ПРОГРАММА.）曾受恩格思之批評。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恩格思寄此批評給柯祖基，僅至後十年才在„Neue Zeit"雜誌上發表。列寧在„国家與革命"一書中，对此批評有詳細的分析。——摘譯自本書附錄。

当與專制的鬥爭要完結時，俄国民主革命的時期便要成為过去；若在那時候还来談什么無產階級與農民之„共同意志"和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等話，便要成為笑話。那時候，我们便要直接地想一想無產階級之社会主义專政，且詳々細々地来討論一討論這个專政。而現在呢，先進階級的政党，不能不很努力的以求達到民主革命对專制之澈底勝利。而民主革命之澈底勝利不是别的，就是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

第十一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與„臨時大会"幾個决議案的概畧比較。

臨時革命政府的问題，是社会民主派目前策畧问題

中的中心问題。要将臨時大会所有其他决議案都拿来作同樣詳細的分析，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我们只将提出数条，以証明我们在上面已經分析过的第三次大会與臨時大会决議案在策畧方向之原則上的異点。

試就革命成功前对政府策略應持的態度一问題而言。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議案中，你们对這问題能找得完滿的回答。這個决議案，曾观察到特殊情形時各種不同的条件與任務：如揭破政府讓步的假面具，利用„民衆代表会議的滑稽形式”，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現工人階級現時的要求（其中首要者為八小時的工作時间制），以及與„百人團”〔註〕奮鬥等事。這问題在臨大会時的决議案中，却是分為幾個单独的决議来叙述的：„抵抗反動势力”的问題僅在对其他政党関系一决議案的原由中提了一提，参加代表机関选举的问題，却在專制政府與資産階級„妥協”一决議之外，另有决議。不号召群衆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現八小時的工作時间制，而却用標題為„関于經済鬥争”的另種决議案，仅把争得„法定八小時工作時间制”之舊的煽動口号重鈔一篇（這是在高唱„俄国社会生活中佔中心位置的工人问題”一些蠢笨口調之後呀）。這個口号在現時情形之下之缺点與落後已經是很明显，用不着多費口舌来証明。

〔註〕„百人團”（ЧЕРНАЯ СОТНЯ ）是一九〇五年〔沙皇〕政府的官僚組織的，其份子為城市小資産階級和流氓無産階級。此種强盗

團体之設立，專為殺害工人，学生，自由主义的智識份子和犹太人等。„百人團”為君主團体之基礎，君主團体中之最大者，為„俄民同盟……(„Союз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和„亚尔漢格联合会”(„Союз Михаила Архангела”)——摘譯自本書附録。

如関於公開政治鬥爭的向題。第三次大会观察到我们目前工作中根本的変更。我们無論如何不可放棄秘密工作與秘密机関的發展，否則，將正合于巡警的要求，对於政府是最便利也沒有的了。但是現在已經不可不想到公開的政治鬥爭了。必須從速準備這種鬥争的適当的形式和適合于這个目的特殊机関——比較不秘密的机関。必須利用公開的與半公開的会社，俾盡可能的变牠们為俄國社会民主工党將来实行公開的重要对外組織。

臨時大会把這個向題也弄得七零八落，没有完整的口号。特別滑稽的是責成„組織委員会”注意对于一班公開的文学家之„利用”。最無聊的是決議„使以帮助工人運動為目的々民主主义的報紙，服從自己的影响”。這個目的，是俄國所有自由主义的公開報紙——按其傾向，差不多全数為„解放”派的報紙——都承認的。為什么„火星”報的編輯部不自己执行自己的意見，不給我们一個模範，究竟怎樣使„解放”服從社会民主派的影响呢？……不把利用公開会社以造成党的重要对外机関的口号提出来，而第一，只說関于„職工”联合会

（凡党員皆應参加）的部份的意見，第二，建設指導„工人的革命團体"——„没有形成的組織"——„革命工人的俱樂部"。這些„俱樂部"怎樣弄到没有形成的組織一塊去了，這是一些什么„俱樂部"——只有鬼知道這。我们在這裏所看見的，不是本党高級机関正確而明瞭的訓令，而是一種什么文学家預備发表意見的芻議和草稿。関於本党全部工作開始过渡到完全另一基礎的総個的見解，一点也得不着。

对于農民问題，大会與臨時大会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大会对這向題所擬定的決議是„與農民運動的関系"。臨時大会对這向題所擬定的決議——是„農民中的工作"。前者是把為全民利益而專制奮鬥的全部民主革命運動之指導責任，看得異常重要。後者是把全部向題都歸納到農民一特殊階級中的„工作"。前者是把即時組織革命農民委員会以施行一切民主主义的改革作為現時的中心实际口号。後者謂„組織委員会的要求"應提交立憲大会。為什么我们等應該候這个立憲大会？這个大会是否将在事实上成為立憲的大会？如果不預先同時組織革命的農民委員会，這種大会是否将能穩固？——這些向題都為臨時大会所未曾注意到的。在資產階級的革命中，我们應只实行自己的專门工作，不要以指導全部民主運動和独立实行這個運動為目的，——所有臨時大会的決議案都反映着這樣一個見解。経濟派曾常々說过，社会民主主义者——要幹経濟鬥爭，而自由主义者——則幹政治鬥

争，現在的新„火星”派也抱同一態度：在他们对于一切问題的論調中，都以為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对資産階級革命只要对岸观火，很謙恭的坐在一边就好了，而資産階級——却去積極地实行這个革命。

末了，關於对其他政党关系的决議案也不可不略為提及一下。俄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的决議案說，要揭破了資産階級解放運動的一切不徹底性和缺陷，而不一味的在每次大会上都来說那種不徹底性之一切可能的事实，以及規定一些標準以界别善良的資産階級與不善良的資産階級。臨時大会却重犯了斯達洛威的錯誤，拼命的在那裏找這種界别資産階級好壞的標准，發表其所謂„試驗紙”（„ЛАКМУСОВАЯ БУМАГА.”）的理論。斯達洛威理想上的出發点是很好的，就是給資産階級以嚴厲的条件。可是他忘記了一点，就是拿各種標准来預先界别那能夠得到同情和称贊等々的資産階級民主主义者與不能夠得到同情称和贊的資産階級民主主义者一類的„公式”，總是馬上為事变的發展所推翻而徒然混乱無産階級的階級覺悟。斯達洛威把问題的重心由实际鬥争的一致，移到了一些空洞的申明，允許和口号。他認為這種口号之最主要者，是„普通，平等，直接和不記名投票的选举权”。两年的時间还未过去，——„試驗紙”便証明了自己的無用，普通选举权的口号為解放派所採用，可是他们不但未從這個口号更與社会民主派接近，而是相反——正是以這个口号為方法，使工人们的观念模糊，

離開社会主义。

現在的新„火星"派向資產階級提出更„嚴厲"的条件，„要求"專制的敵人„努力且毋懷二心的（!?）擁護有組織無產階級之各種堅決行動"……直至„積極参加民衆自動的武裝為止"。他们曾不断的這樣計劃，可是這種計劃又已經陳舊，即刻現得無用了。譬如為什么沒有共和政治的口号？怎樣社会民主派為实行„猛烈的革命战争以反对君主等級制之一切根基"，向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隨便„要求"什么都可，而不„要求"為共和政体的鬥爭？

此问題并非小的问題，新„火星"派的錯誤有很重大的政治意义，——這有„俄国解放联合会"(註一)為証(参閱„前進"報第四期(註二))，此处用不着多說。這个„專制的敵人"对于新„火星"派的„要求"是能完全接受的。而同時，我们已知道這個„俄国解放联合会"的党綱中（或無党的党綱中）是充滿着解放派的思想，且解放派是很容易使它跟着自己背後走的。臨時大会在決議案的末尾說：„社会民主派將如以前反对民衆的假朋友一樣，現在亦反对一切高举自由民主主义旗幟，而拒絕实际擁護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政党"。„俄国解放联合会"不但不拒絕這個擁護，而且自己誠心建設有這個擁護。但這是否能担保„联合会"的首領——甚致是解放派的首領——不会為„民衆的假朋友"呢？

(註一)„俄国解放联合会"的党綱載在列寧„全集"

第六卷六二四頁附註第百五十。

〔註二〕一九〇五年七月三日，,前進”報第四期出版，載有,,新革命工人联合会”一文，介紹該,,革命工人联合会”宣言的内容。該会曾名,,俄国解放联合会”，以武裝暴動召集立憲大会為目的。再，此文中規定了社会民主派对于這類無党联合会的關系。

这樣：新,,火星”派于事前規畫一些,,条件”，提出一些紙老虎的滑稽,,要求”，便將自身即刻陷入了可笑的地位。他们的条件和要求，即刻成了不足以計标時起变化的具体情形之白紙黑字。他们那種捕風捉影的公式是沒有希望的，因為任便用什么公式，你總不能把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各種各色的假面具，不徹底和限制等々的表現一一歸納無漏。问題不在於,,試驗紙”，不在於公式，不在於白紙黑字的要求，不在于事前分別,,民衆朋友”的假面具者與非假面具者，而在于实际奮鬥之一致，在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方面对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一切,,動搖”步驟之竭力批評。為,,團結所有需要民主革命之一切社会力量”計，不要有臨時大会發了九牛二虎之力所規定的那些什么,,条文”，而要有真正的革命口号。要有把革命的和要求共和政体的資產階級提高到無產階級水平綫的口号，而不要把無產階級的責任低降到資產階級君主派水平綫的口号。要極努力的参加暴動，而不要用滑閑的遁辭以逃避武裝暴動的責任。

第十二節　若資產階級離開民主革命，則這個革命力量的擺動是否因之減小？

在以上各節已經作好的時候，我们接到了新„火星"派高加索臨時大会在„火星"報上所發表的決議案。為作一好的結論，我们連想都想不出也這還再好的材料了。

„火星"報的編輯者很公正的說：„在策略方面的根本問題上，高加索臨時大会的決議，還是與以前全俄臨時大会(即新„火星"派的臨時大会——譯者）所通過的決議案相似的(真話！)。"關于社会民主黨對臨時革命政府之關係的問題，高加索同志決定堅決反對„前進"報一派份子及傾向于他们的所謂大会代表所宣傳的新方法"。„無產階級政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應持的策略，要承認臨時大会所規定的是最適當的"。

是真話，還是真話。關于新„火星"派的根本錯誤，真个誰也不能這樣„適當的"說明出來。我们現在且把這段說明全部抄錄於下，先在括符中略為贊嘆，後再分析。

新„火星"派高加索臨時大会關于臨時政府的決議案說：

„臨時大会認為自己的責任，是在利用革命時期以加深"（呵，當然！不過還要加一句：用馬丁諾夫的方法來加深！）„無產階級之社会民主主义的覺悟"（只利用革命時期以加深覺悟，而不利用革命時期以爭得共和

政体嗎？这是对于革命何等„深切"的瞭解呵！)，„且为保証社会党对於正在發生的資產階級国家制度之批評完全自由起見"(保証共和政体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事情只在保証批評的自由。無政府主义的思想產生了無政府主义的語調：„資產階級的国家"制度！)，„臨時大会反对組織社会民主主义的臨時政府，并反对加入臨時政府"(参阅恩格思在西班牙革命十個月前所引証之巴枯寧派的决議案：見„無產者"第三期(註))，„而認為最適宜者莫如自外而内的"(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威逼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使国家制度得相当的(?!)民主主义化。臨時大会認為由社会民主主义者組織臨時政府，或加入这个政府——一方面必使無產階級群众对社会民主党灰心而离開社会民主党，且为社会民主派固奪取政权，但不能滿足工人階級的緊急需要，直至实現社会主义為止"(共和政体不是緊急的需要！作决議案的人自己未注意到，用無政府主义的口吻来說話，似乎已否認参加資產階級的革命了！)，另一方面，逼迫資產階級离開革命的事業，致减小革命力量"的擾動。

〔註〕恩格思在其„巴枯寧派的工作。關於一八七三年西班牙暴動的日記"一文中曾說过，不管巴枯寧派的大会(一八七二年九月)是如何决議，如何承認一切臨時革命政府都只是一種欺騙，是無產階級的危險，但西班牙的巴枯寧派為西班牙的事变所逼迫，还是違反了决議做事的，且„这些巴枯寧派曾于事变前数月在哥尔多夫城說过，建立革命政府便是叛賣工人

騙哄工人,現在他们却在安達路组（　　　　　　）各部市革命政府中工作了,——不过他们到处佔少数就是"……

列寧在"無產者"第三期中"論臨時革命政府"对于恩格思这篇文章曾有詳細的分析。——摘譯自本書附錄。

这就是问題实質的所在。这就是無政府主义的理想与纯粹机会主义交相錯綜（如西歐伯恩斯坦派中常有的現象一樣）的所在。你们只想々々不加入臨時政府,因為加入臨時政府,可逼使資產階級离開革命的事業,以致减小革命力量的攏動！这原來是新"火星"派全部哲学觀最清楚,最澈底的表現,即謂革命既為資產階級的,所以我们應該拜倒於資產階級的道德之前,把路讓給它走。如果我们真受这種理論一分鐘的支配和部份的支配,真以為我们参加臨時政府,可逼得資產階級离開革命,那我们便要把革命的全部指導权交給資產階級,我们便要把全部無產階級交給資產階級去指揮（自己則持完全"批評自由"的態度!!),强使無產階級处恭順柔和的態度,以便資產階級不离開革命的事業。我们便要把經濟派及其生徒永不曾好々瞭解的無產階級的政治需要去犧牲,以便資產階級不离開革命的事業。我们便要完全由革命的鬥爭——实現無產階級所需要之民主主义範圍的鬥爭——走上與資產階級妥協的道路,而以自己出賣原則,出賣資產階級的革命來换得它願的同情,俾資產階級不离開革命的事業。

高加索的新"火星"派,竟於兩小行的辞句中,把

掀賣革命,要無產階級為資產階級毛把的策畧描寫出来了。我们在上面内分析新„火星”派一些錯誤所得的結論,不過是一種傾向,而現在却成了一个明確的原則;作資產階級君主派的尾巴。因為实現共和,可迫使(且已經迫使——如斯脫盧威先生就是一例)資產階級离開革命,故應打倒争得共和政体的鬥争。因為無產階級方面種種有力而徹底的民主主义的要求,總是迫使全世界的資產階級离開革命,故工人同志们,你们還是躲起來吧,只要自外而内的行動,不要為着革命,想方設計去利用„資產階級國家”制度的各種武器和工具,而保存自己的„批評自由”吧。

对於„資產階級革命”一名詞瞭解的根本錯誤,這裏已完全显露無餘。馬丁諾夫或新„火星”派对於這一名詞的„瞭解”,結果直是把無產階級賣給資產階級。

誰要是忘了以前的經濟主义,要是不研究這问題,不回想這问題,他便難於瞭解現代經濟主义的新生命。試一回想伯因斯坦主义的„我的信仰”(„КРЕДО”)〔註〕。是書著者從„純粹無產階級”的觀点和党綱出發,得到了這樣一个結論,即謂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要作的事,——經濟,為真正工人的事情,对于一切政治的自由批評,為真正加深社会民主派的工作。他们自由主义者要作的事,——政治。上帝去保佑他们,使他们不傾向„革命主义”吧,因為這可使資產階級离開革命。誰能把„我的信仰”全部細覽一遍,或把„工人思想”〔註二〕第九期(一八九九年九月)的附錄細讀一遍,他便能看

見這類論調中一貫的論点。

〔註一〕„我的信仰”為„經濟派”主要文件之一。是書之創設者為古司柯互（КУСКОВА ），但總其成的，卻有其他經濟派的參加。列寧當時與一部份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同囚于葉民司豐克省，發起宣言反対是書，署名者共七十人。——摘譯自本書附録。

〔註二〕„工人思想”于一八九七年十月在彼得堡出版。主張只為改良目前工人經濟生活而奮鬥，不理政治。曾與„合法的馬克思主义派”打成一片，注意于工人運動之純粹理論上的研究，以便于專制政府檢查出版条件之下，得到公開言論之可能。這種態度，不期然而然把革命的思想與战鬥爭的口號改変了色彩，且從而發生階級合作與和平進化到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的理論。——譯者。

現在新„火星”派的理論也是一樣，不過範圍較大，用以觀察全部„偉大的”俄国革命，継續從前平凡正統理論家的手段，把這个革命全部描寫得像一種庸俗卑鄙的諧劇罷了！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只要批評自由，加深覺悟，自外而内的動作；他们資産階級——作事自由，革命的（讀作„自由主义的”吧）指導自由，自上而下的施行„改革”自由。

這些研究馬克思主义的卑鄙愚渴的人们，從来对於馬克思所謂「必要拿武器的批評来代替批評的武器」一

語，未加以过思索。他們徒誦馬克思之名，事实上，在起草策略上的決議案時，却完全採納了法朗克府資產階級那些雄辯家紙上談兵的精神——自由地批評專制主义，加深民主主义的覺悟，殊不知革命的時候，是行動的時候，是要自上而下，且自下而上行動的時候。新"火星"派把馬克思主义变成了清談主义，把最先進，最徹底，最奮勇的無產階級思想，做成了這階級中一部份最無覺悟份子的思想，——逃避艱難的民主革命責任，而把這些責任双手奉送給斯脫盧威一流的先生們。

如果資產階級因社会民主派參加臨時革命政府而离開革命的事業，那他們（資產階級）即此就是"減小這個革命力量的擺動"。

俄国的工人們，你們聽吧：如果由不被社会民主派嚇得心驚胆落，不想对專制勝利，而想與專制分贓的斯脫盧威一流先生來实行革命，那末，革命力量的擺動，就要强大些！如果從我們在上面所述俄国革命兩個可能的結局中，实現第一个結局，就是說，如果資產階級的君主派能根據謝波夫一類的"憲法"基礎與專制政府商量妥善，那末，革命力量的擺動就要强大些！

社会民主派在指導全党的決議案中既然說出這樣無廉恥的話語，或在机関报中嘉許這類"適当"的決議案，事前已經辯論得頭昏目眩，失掉了馬克思主义的全部活潑的生氣，現則不知這些決議案，是何等的把他們所說的一些好話变成了空談試看"火星"报的偉大那篇論文

来看，拿我们的名角馬丁諾夫的傑作来看都可以，——你们能到处看得見民衆暴動，实行革命到底，憑藉下層民衆以與不澈底的資產階級奮鬥…………等語。可是從他们自己說，或嘉許人家說，因資產階級的脫离，„革命力量的攏動便要减小”這話起，他们的一切好話都成了可憐的空談。先生们，下面两種情形中，只能就中取一的：或是我们應不顧慮不澈底，自私自利，战々兢々的資產階級，與民衆在一塊兒来实行革命，完全推翻專制；或是我们不能„不顧慮”，我们害怕資產階級脫离革命，那時就要把無產階級和民衆出賣給不澈底，自私自利，战々兢々的資產階級。

你们不要誤解我的話。不要大声疾呼的說，人家罵你你们為有覺悟的叛賣無產階級。不是的，你们以前無意識地時々陷入了泥坑，與現在無意識地混入了乱山歧路，亦猶如舊時的經濟派一樣，高山滾石，牢不回頭的往下跑去，以力求„深解”馬克思主义，直弄到反革命，無精神且無生氣的道学儒生了。

„革命力量的攏動”要依靠些什么社会实际力量来决定，——這问題你们曾經想过嗎？我们現在且把对於我们很有利的国外政治與国际情况的力量放在一边，不歸入觀察範圍之内，因為這裏的问題是関于俄国内部社会力量的问題。你们是試看々這些内部的社会力量吧。反对革命的有專制政府，皇族巡警，官僚，軍隊，高級貴族。民衆中的不满愈深刻，則軍隊对于政府亦愈無希望，

官僚中的動搖也愈激烈。其次，資產階級，全盤的說來是同情於革命的，且大叫要求自由，不但常々代表民衆說話，而且常々代表革命說話。但我們都是馬克思主义者，由理論上固得知道資產階級的本性，且現在觀察自由主义者，鄉紳派，和解放派等的行為，無日無時不証明資產階級之同情于革命是不徹底的，是自私自利的，是畏首畏尾的。全部資產階級只要滿足了自私自利的狹隘的利益，只要„离開”徹底的民主主义（它現在已經開始离開徹底的民主主义！），它便必然地即刻变到反革命方面，变到專制政府方面以反対革命，反対民衆。餘下的便只有„民衆”，即無產階級和農民；無產階級是幹到底的，因為只有它無遠近的走出民主革命的範圍。故此，無產階級站在革命的陣头上為共和政体而奮鬥，対於一切愚笨而無價值的規劝——不要使資產階級离開革命等話，置之不理。農民本身中除小資產階級份子外，尚括包有許多半無產階級的份子。這種情形使農民本身無固定的性質，使無產階級不得不團結成一嚴厲的階級政党。但是農民之沒有固定性，是與資產階級之沒有固定性根本上不同的，因為農民現時把沒收地主土地（私有財產的一重要形式）的事情，看得比無条件的保存私有財產一向題要重要。固然不可說農民因此便成了社会主义的份子，而不為小資產階級的份子了，但它能為民主革命最完滿且最激進的擁護者。若是提高農民智識的革命行程不太早為資產階級的叛变與無產階級

的失败所割断，则它定然为这样的拥护者。农民在这种条件（即革命行程不太早为资产阶级的叛变与无产阶级的失败所割断。——译者）之下，定然为革命与共和政体之拥护，因为只有得着完全胜利的革命，能给农民以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满足农民自己所需要的及其日常所想像的一切，且农民亦须要这一切，也不是如"社会革命党员"所想的一样，要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要使自身脱离半农奴制的渊泉，脱离农奴的黑暗境遇，以便于商品经济可能的范围内，改良自己的生活条件。

不但如此：不仅仅是激烈的农村改革促进农民倾向革命，而且农民日常的一般利益亦唤醒它自身起来革命。甚到与无产阶级奋斗，农民也需要德谟克拉西，因为祇有德谟克拉西的制度能确切表现农民的利益，能表现它在民众中占大多数的优越地位。农民的文化程度愈高（自日俄战争起，它的文化程度已在很快的提高，这是许多惯用学校尺码来度量文化程度的人们所未注意到的）则它的同情于德谟克拉西革命亦愈将坚决而激底，因为它不想像资产阶级一样害怕民众抬举出来头脑，而是愿意有这种头脑，这种民众的上层头脑于它正是有益。只要农民能开始从专制的君主制度解放出来，民主主义的共和政体便即刻成为农民的宝贝，因为资产阶级想造出来的君主制度（设立上议院等々）使农民还是一样的没有权利，一样的黑暗，一样的受压迫，不过这种制度稍许盖有欧洲宪法的粉饰罢了。

所以資產階級自然而且必然要跑到自由主义的君主政党旗幟之下去，而農民群衆——必然要跑到革命共和政党領導之下去。所以資產階級不能实行民主革命到底，而農民能实行這个革命到底，且我们應尽己之所能以帮助農民這種傾向。

有人可反对我說：這用不着証明，這是A,B,C，凡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十分明瞭這。這話不对，誰能說因資產階級离開革命，致使革命力量的"擺動減小"者，他就不懂得這个A,B,C.。這樣的人，知道背誦我们土地政綱裏面的話，但是不懂得這些話的意义，因為若是懂得這些話的意义，他们便不会害怕由全部馬克思主义政治观及由本党々綱所必然產生的民主革命之工農專政一观念，若是懂得這些話的意义，他们便不会拿資產階級力量的擺動来限制俄国大革命力量的擺動。這樣的人，拿自己反对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的具体的決議案来推翻了自己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抽象的辞句。

誰要是真正瞭解農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他就不能說当資產階級离開革命的時候，革命力量的擺動就要減小。因為事实上，只有在資產階級离開革命，而農民群衆與無產階級共同積極参加革命的時候，俄国革命力量的真正擺動才能開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中可能的真正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擺動才能開始。為使我们的民主革命能貫澈到底，這个革命所憑藉的力量，便要是能使資產階級必然而有的不澈底性成為不發生作用的力

量(即能"這使資產階級离開"革命的力量，為高加索的"大量"派所懼怕者)。

無產階級應实行民主革命到底，連絡農民群衆，以便用实力压倒專制政府的抵抗，用实力來停止資產階級的不固定性。無產階級應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联絡民衆中半無產階級的份子，以便用实力压倒資產階級的抵抗，用实力来停止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不固定性。這就是無產階級的責任；這些責任，是被新"大量"派在其自己関于革命力量擺動的一切論文和決議案中看得異常窄狹的。

不过还有一種情形是在人们討論"力量擺動"的時候常々不注意到的，我们却不要忘却了它，就是不要忘却這裏的问題，不是関于責任困难的问題，而是関于在怎樣一条道路上去尋找這个責任的解決。這裏的问題，不是関于要把革命力量的擺動做成强而有力——容易，还是困难，而是應怎樣去使這但擺動更有力量。這裏的爭論，恰々是関于行動的根本性質，関于行動本身的方向。我们所以要把這話更明白的說出来，是因為有些不注意的人和故意倒乱的人，總是把兩個不同的问題混作一塊：(一)関于道路方向的问題，即関于從兩条條不同的道路中选择一条的问題(二)関于在該道路上容易实現目的的问題，或实現目的較速的问題。

後一问題，我们在上面完全未分析过，因為這问題

并未引起本党中的異見和爭論。但是這問題本身自然極重要，值得一切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注意。若是忘却吸收工人階級群衆與農民群衆加入革命運動的困難，那便是一種不可寬恕的樂观主义。唯其有這種困难，所以实行民主革命到底的努力，已經不止一次的失敗，且在這時候，最興高彩烈的是不澈底的自私自利的階級資產，它既得君主勢力之保護以提防民衆，以得„保持”自由主义…………或„辯教派”的„純清潔白”。但是不能因有困难，就說什么都不能執行了。這裡重要的是在於自己相信所选擇的道路之正確，而這個自信又可增加無數倍的革命熱誠與革命奮勇，能使我们排除困難，百折不撓地向自己的目的前進。

現代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関於选擇道路的問題，意見已紛歧到何種程度，從新„火星”派高加索臨時大会與俄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兩種決議案的比較中就可显明的看出来。第三次大会的決議案說：資產階級是不澈底的，它定將竭全力以奪反我们在革命中所得的勝利品。故工人同志们，你们要準備去努力的鬥爭，武裝起来，把農民吸收到自己方面来。不決一勝負，我们是不把在革命中所得的勝利品讓給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的。高加索新„火星”派的決議案說：資產階級是不澈底的，它可离開革命。故工人同志们，請你们别要想參加臨時政府吧，因為那時候的資產階級定然离開革命，而革命力量的擺動定將因此而减小！

前者說：把革命推往前進，推得到底吧，不要顧慮不徹底的資產階級之反抗與消極。

後者說：你們別想自己實行革命到底吧，因為那時候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會離開革命哩。

難道這不是兩條完全相反的道路么？難道這不是很明顯的兩個不能并存的策略么？又難道不是很明顯的，前一策略是革命的社会民主派唯一正確的策略，而後一策略，實質上純粹是一種解放派的策略么？

第十三節 結論。我們敢不敢勝利？

只從表面上認識俄國社会民主派內部情形的人，或是從旁觀察，不知道我們內部自從經濟派時代起爭鬥歷史的人，常々藉口於一切社会民主運動中兩個自然且必然完全可以調和的傾向，以敷衍特別自第三次大会後策略上已經形成的分裂。他們說：這裏一方面，是特別注意經常的每日工作，特別注意發展宣傳和煽動之必要，特別注意準備力量，使運動更加深切等々之必要。另方面，注意革命運動之戰鬥的，一般的政治責任，指出武裝暴動之必要，提出民主革命專政，臨時革命政府等口號。不要把兩方面都吹噓得太大，兩方都不好走極端，等々。

在這類的論調中間，自然含有些平凡才智的廉價格言，不過這種格言，常々埋沒着政黨中緊急不容遲緩的需要。試拿現在俄國社会民主派中策略上的爭論來看吧。

新„火星”派在討論策略問題的時候，特别注意日常方面的工作，——僅祇這種情形，自然还不能發生任何危險，且於策略方面的口号問題上，自然还不能引起任何意見上的分裂。但只要拿俄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的決議案與臨時大会的決議案来比較一下，這個意見上的分裂便馬上現得刹目了。

究竟這裏是怎樣一回事呢？第一，僅祇一般的抽象的指出革命運動中有兩個水流和兩方各走極端的弊病，自然还不夠。還應具体的知道，為什么這個運動在現在的時候受着痛苦？党的实际政治危險，究竟何在？第二，要知道，究竟那些实际政治力量因有這些策略方面的口号或那些策略方面的口号（或没有這種口号和那種口号）致能更加轉激？你们試聽„新„火星”派的說話，便能得着這樣一個結論，即社会民主党有放棄宣傳和煽動，放棄經濟鬥争且放棄批評資産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而專注意於戰争上的準備，注意於武装暴動與奪取政权等事之危險。事实上实际的危險并不是從這方面来的。稍許知道革命運動情形的人，留心观察這種運動的人，都能看得出新„火星”派這種恐懼心的可笑的方向。事实上，俄國社会民主工党的全部工作已完全練成了一鞏固的形式，完全能保証工作的重心集中於宣傳和煽動，集中於傳单和群衆的秘密集会，集中於傳单與小冊子分派，集中于經濟鬥争的帮助及其口号上的擇定。所有党的委員会，区委員会，中央联席会議，工廠小組等無不總是常々把

自己百分之九十九的精神，力量與時间用在這些还是從九十年代下半期起就已經固定了的工作上向。只有完全不認識俄国革命運動的人，才不知道這種事實。祇有最天真或完全不通消息的人们，才可不辯青紅皂白，拿起新„火星”派的說話就到处背誦。

現在的事实是，我们不但未太过注意於暴動的責任，太过注意於一般的政治口号，太过注意于全部民众革命之指導，而是相反，在這些问题上，我们的落後特别表示得明顯。这是我们最大缺点的所在，是革命運動的实际危險，使这个運動可由（且有些地方已經發現）事实上是革命的變而為只在口頭上是革命的。從進行党的工作的千百個支部和小組中间，你们找不出一個，和新„火星”派的博士，像發現了新定律在這那裏吹噓的一樣，從其發生起直到現在，未施行过那種日常的工作。反之，你们从这些支部和小組中间，僅能找出很少数很少数的支部和小組，是曾經覺悟到武裝暴動之任務的，是已經開始執行这些任务的，是已經明白有對指導全部民众革命以反对專制之必要的，是明白為了執行这個指導任务應提出这樣的口号，而不是其他口号的。

我们比真正的革命任務要落後許多了，我们在許多時候没有覺悟到这些責任的施行，我们因自己之落後，到处未曾使得革命的資産階級德謨克拉西更加強固。而新„火星”報的記者却回轉身来，把背心对着事变的行程和時间的要求很嚴重的說：你们不要忘了舊的！不要

為新的所建議！這是臨時大会一切决議案中牢实根本不變的要旨，同時，你們在第三次大会的决議案中也可牢实的讀着：我們評定已往的旧事（且不去邊編讀累的阻礙它，就是因為它是已往的旧事，是已經决定，已經載之於書，筆之於决議案，集之于經驗的已往的旧事），同時提出新的任務，注意新的任务，提出新的口號，要求一切真正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速即实行这種口号。

事实上，社会民主派中關於暴動問題的两派别原来是这樣。革命時期自己提出了新的任務，不看見这些任務，只有双目不明的人才可办到。現在一部份社会民主主义者堅决的承認这些任务，且視之為現時必行之事：武裝暴動不容遲緩，速即努力地准備起來，記着為要澈底勝利，必須武裝暴動，提出共和政体的口号，提出臨時政府的口号，提出民主革命之工農專政的口号。而另一部份社会民主主义者，却是往後退縮，走踏步，不提口号，而牢作緒言，不評定已往回事，且同時指出新的工作，而牢实拉雜無味的咀嚼这些已往回事，且濫設遁辞以逃避新的任务，不会說明澈底勝利的条件，不会提出唯一能適合達到完滿勝利目的的口号。

這个尾巴主义之政治上的結果，我們現在看得很清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党員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接近的謠言，現在还是謠言，因為沒有一件事实，沒有一個"多数"派的决議案，沒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方向的半個举動可以証实这个謠言。而同

時，以„解放”報為代表的机会主义資產階級的君主派，却好久就欢迎新„火星”派„原則”上的傾向了，現在且得着他们的帮助以增加自己的影响，接受他们的論調異„思想”，反对密秘和„倒乱”，反对鼓吹革命„技術”方面的事情，反对直接提出武装暴動的口号，反对主張激烈要求的„革命主义”等々。社会民主黨高加索„少数”派全体臨時大会的決議案，以及新„火星”報对于這个決議案的称贊，对於上面這種傾向作了一個政治上直接了當的結論，就是：不要無產階級参加民主革命專政，致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吧！用这样一句話，什么都說明了，說明了無產階級之變成資產階級君主派之尾巴，已告最後的成就。且事实上說明了这裏的証据不是一個人偶然的說話，而是一個為總个派别所嘉許的決議案，說明了新„火星”派尾巴主义的政治意义。

能对于这些事实加以思索的人，他就能明白現時人们所指出的社会民主運動中两方面和两個傾向的真正意义。試就伯因斯坦派的思想来观察一观察，以便大規模的研究这两種傾向。原来伯因斯坦派也恰々是这样肯定的說，只有他们瞭解無產階級的真正需要，只有他们明白发展無產階級力量的責任，只有他们明白使全部工作更加深切，准備新社会種子，宣傳和煽動的責任。伯氏說，我们要求公開承認現在有的東西，藉此以創造一个没有„終結目的”的„運動”，創造一個防禦策畧，宣傳畏懼驚慌的策略，„不要使資產階級脱離革命”。而且伯

因斯坦派也曾大吽特吽地批評过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甲可賓主义”，批評过不懂„工人自立性”的„文学家”等々。事实上，大家都知道，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連想都未想过要抛棄准備力量等々的日常小工作。他们只曾經要求过对于終結目的之明確的認識，对于革命任务之明確的態度；他们曾要把半無產階級和半小資產階級的份子提高到無產階級的革命程度，而不把無產階級的革命程度低降到机会主义的思想，„不要使資產階級离開革命”。„我们敢於勝利嗎？許可我们勝利嗎？我们勝利不危險嗎？我们應当勝利嗎？”——这個问題，可說曾經是社会民主党裏智識階級机会主义派與無產階級革命派中間偏了相差的最显明的表現。表面上看来，似乎很奇怪，為什么有这樣的问題發生，但是这樣的问題已經有过，且是不会不有过的，因為机会主义者自己曾經害怕勝利，使無產階級也畏懼勝利，預言勝利的不幸，嘲笑一直到達这個勝利的革命口號。

現在俄國也同樣的分成智識階級机会主义派與無產階級革命派兩種傾向，所不同的，只是我们这裏的问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題，而是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題。我们也有一個同樣在表面上看来是很愚蠢的问題：„我们敢于勝利嗎？”這问題曾經在馬丁諾夫的„兩個專政”中提出来，該書預言說，若是我们很好的准備暴動且很順利的進行这個暴動，定得發生許多不幸。这问題曾經在維新„火星”派関於臨時革命政府的一切著作中提出

来，且他们曾經誠心（但無成績可言）想把米拉蘭参加資產階級机会主义政府的问题拿来與瓦尔龍参加小資產階級革命政府的问题混為一談(註)。這问題更显露于臨時大会的決議案：„不要使資產階級离開革命"。固然像柯祖基一樣，現在也在那裏試々譏諷我们說，我们关于臨時革命政府的争論，猶之如熊还未打死，便爭分其骨，然而這種譏諷只是表示給我们看，甚致連聰明而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聽見人家爭論，只就傳聞所得，而不知其底細的時候，都致弄成莫明其妙。德意志的社会民主派距打死熊（完成社会革命）的時间还不很近，但是„我们敢不敢"打死这熊的争論，是有过很重大的原則上的实际政治意义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要有能力以„打死自己的熊"（完成民主革命）——距这時间还不很近，但是„我们敢不敢"打死这熊的问題，对於俄国的将来，对于俄国社会民主派的将来，是有極其重大的意义的。譬如我们不相信自己„敢于"勝利，則要竭力順手的集中軍隊，好々的指揮軍隊，简直無從說起。

(註)瓦尔龍（ВАРЛЕН　）是第一国际的会員，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時曾掌理財政。列寧在論„「巴黎公社」與民主專政的任务"(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一日„無產者"第九期）一文中說，加入公社的除無產階級的代表外，还有小資產階級的份子，因此得着一個这樣的結論，即謂：„無產階級的代表與小資產階級一同加入革命政府，在

原則上是完全許可的，且于相当条件之下——是必要的……”

„巴黎公社曾要执行的任务实际，首先就是实現民主主义的專政，向不是社会主义的專政……”。

——摘譯自本書附録。

就拿我们舊時候的經濟派来講吧。他们也曾大吽特吽地說过，他们的敵人——陰謀客，甲可賓派，這些人離開了群衆，迷于政治，忘却了工人運動的基本，不注意工人的自立等話。事实上呢，这些„工人自立”的擁護者，是一批把自己对于無産階級的任务瞭解得異常窄狭，異常淺俗的観念傳遞給工人们的智識份子——机会主义者。事实上呢，凡是讀过四„火星”報的人都知道，經濟派的敵人并未放棄且并未輕視过社会民主主义工作的任何方向，并未忘却过經濟鬥争，且同時，曾把各種臨時緊急的政治任务也完滿的提出来，以防止工人的政党変為自由資産階級之„經濟”的附屬品。

經濟派時常背誦过，政治的基礎為經濟，且对这話的„瞭解”是，要把政治鬥争压低到經濟鬥争。新„火星”派時常背誦过，民主革命在自己的經濟基礎上是資産階級的革命，且对這話的„瞭解”是，要把無産階級的民主主义責任压低到資産階級温柔和順的水平綫，压低到不使„資産階級离開革命”的界限。經濟派以加深工作為藉口，以工人自立和純粹階級政策為藉口，事实上，却把工人階級交給自由資産階級政治家的手裏去了，

就是說，他们領導党所走的道路，其客观的意义正是如此。現在的新„火星”派藉口于同樣的話語，事实上，却把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賣給資產階級，就是說，他们領導党所走的道路，其客观的意义正是如此。經濟曾以派為政治鬥爭中的領導任务，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事情，而是自由主义者私有的事情。現在的新„火星”派，以為積極实行民主革命——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事情，而是民主資產階級私有的事情，因為無產階級之領導與積極参加，可使革命力量的„攏動減小”。

總而言之，新„火星”派不但按自己在本党第二次大会上的產生是經濟派的生徒，而且按其現在对於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策畧问題方向的態度，也是經濟派的生徒。这也是本党的智識階級机会主义派。在組織上，这個派別是開始於智識份子之無政府党的個人主义，其結果，是一个„破壞組織的过程”，在臨時大会上通过„章程”，内中固定了出版物离開党的組織，規定了间接选举法（幾乎是經过四層階段的选举法），拿白蘭巴尔特（法国皇朝名。——譯者）的平民投票法来代替了民主主义的代表制，末了，还規定了部份與全体中间„協商”的原則。在党的策畧上，他们也沿着同樣的斜逕跑了。在„鄉紳会議的計畫”中，他们把在鄉紳面前的說話叫作„示威的最高形式”，同時，在政治的舞台上，他们仅曾找得两種積極的势力（这还是在一月九号前呀！）——即政府與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武装的緊急任务，他

们拿来弄很得„深切了”，⌞用自己武装的熱烈要求来武装⌝之口号，代替了直接实践的口號。武装暴動，臨時政府和民主革命的專政等任务，現在被他们在自己的正式決議案中挖精去，歪曲解了。„不要使資產階級离開革命”——这是他们最後決議案中的一句結語；这個結語明白告訴我们，究竟新„火星”派的道路把無產階級的政党領導得往那裡去。

俄罗斯的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經濟实質，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這個正確的馬克思主义的原則，若僅只會来重背重讀是不够的。必須会瞭解它，会運用它于政治上的口号。全部政治自由——在現代資本主义生產関系的基礎上——是資產階級的自由。⌞自由⌝的要求，首先就是表現着資產階級的利益。資產階級的代表，曾首先提出此要求。資產階級的擁護者，依着主人翁的地位，曾到处利用已經得着的自由，在和平的時候，把这个自由作成很温和很正確的資產階級的法碼，用以為最文雅的方法来对付革命的無產階級，而在情形不安的時候，却用以為野獸不知的殘暴手段来对付革命的無產階級。

但因此便否認或輕視争得自由的鬥争，那只有民粹派中的⌞暴動⌝派，無政府主义者和„經濟派”才能办到。且要使这種智識階級的淺陋思想能傳染給無產階級，那永远只是暫時的現象，永远只是違背無產階級意志才可做到。無產階級已經知道，政治自由固然是直接鞏固資產階級，組織資產階級的東西，但自身还是需要这个

自由，且宅任何人都要需要這个自由。無產階級不是离開階級鬥爭來等着別自解放的，而是發展階級鬥爭，擴大階級鬥爭的範圍，提高階級鬥爭的覺悟，組織和堅決來求得解放的。凡看輕政治鬥爭者，他無異把社会民主主义者由民衆的首領变而為英国職工会的秘書。凡看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者，他無異把社会民主主义者由民众革命的首領变而為自由工人联合会的指導員。

是的，民众革命的。社会民主派曾經反対，且現在还是反対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对于民衆二字的濫用。社会民主派要求不用这两個字以掩蔽自己对于民衆內部階級矛盾之不瞭解。它無条件的主張無產階級政党應有自己階級的完全独立性。但是它所以把„民衆”分為各„階級”，不是為的要使先進階級只掃自己门前雪，緊々地遂住自己，限制自己的行動，使使世界上的經濟主人翁不离開革命，而是為要使先進階級不受各过渡階級不澈底，不固定，不决心的連累，且因此要更努力，更勇敢地為全民事業而奮鬥，且領導全体民衆去奮鬥。

這就是現代新„火星”派時常不瞭解的问題，他们只把„階級”二字放在口頭上念來念去，变世変格，而看不見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積極政治口號！

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黑硬瓜分」或「土地與自由」，——這是智識閉塞，環境黑暗，可是正在拼命尋找光明和幸福之農民群衆中最普遍的口号，——

这个口号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口號。但我们是馬克思主义者，應当知道要使無產階級與農民達到真正的自由，除資產階級的自由和資產階級的發展道路外，沒有第二條道路，且不可能有第二條道路。我们應当知道，在現在的時候要跑近社会主义，除政治上的完满自由，除民主主义的共和政体，除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外，沒有第二個方法，且不可能有第二個方法。無產階級是先進的階級，是無条件，無疑义，無躊躇地可說它是唯一革命的階級，我们為這個階級的代表者，應当尽可能廣大，勇敢且積極地把民主革命的責任在全体民衆中提出来。藐視这些責任，便無異是在理論上侮辱馬克思主义，卑鄙的曲解馬克思主义，而在实踐上與政治上，是無異把革命的事業奉送給資產階級，奉送給必然离開徹底革命的資產階級。在達到革命完全勝利的道路上，自有許多很大的困難在。如果無產階級的代表们能就已之所能尽力奮鬥，而一切力量都為反動势力之抵抗所挫折，為資產階級之叛变和群衆之黑暗所挫折，那是誰也不能責駡他们的。但是，若社会民主派竟以害怕勝利為藉口，以使資產階級不离開革命為原因而限制民主革命的革命奮勇，限制革命的熱烈，那是人人（首先就是有覺悟的無產階級）得而誅之的。

革命為歷史的車頭，——馬克思曾經这樣說过。革命是被压迫者與被剝削者的紀念日。民衆之能為新社会秩序的積極創造者，只有在革命的時候表現得最力。根據

小資產階級漸進的狹小觀點來說，這種時候的民眾，能有不可思議的力量。但是在這種時候，也還需要革命党的首領能很廣大很勇敢地把自己的任務提出來，需要他们的口号能時々領導群眾革命的自動精神，為它的灯塔，用其偉大與光明以表示我们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目的，表示達到完全澈底勝利之最捷近且最直的道路。„解放"派資產階級的機会主义者害怕革命，害怕直的道路，我们且讓他们去尋思那些灣曲的，间接的，妥协的道路吧。如果他们以实力来强迫我们走这些道路，那我们在日常小的工作中还是能尽自己應尽之職的。但是首先應拿無情的鬥爭来解决擇選道路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利用现在群眾中这個鼓舞的奮勇心和革命的熱烈心以忠实而拼命的争得澈底的直的道路，那我们就要成為革命的叛变者，讓資產階級的机会主义者去望而生畏地想像那将来的反動局面吧。工人们是不会為反動勢力将要很厲害，資產階級将要脫离革命等念頭嚇倒的。工人们不是坐等分贓，請求打化的，而是要拼命地達到反動勢力的破壞，換言之，即達到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

不用說，我们的船——党，在狂風大浪的時候，自然要比平風息浪的時候所招的危險要多些，就是說自然要比照着自由主义的和平發展，工人階級能受痛苦拖延，被剝削者吸吮着自己的血汗時所招的危險要多些。不用說，民主革命專政的任務，自然要比一个„極端反对党"和一個国会鬥爭的任務要困難万倍，要複雜万倍。但要

是有人在現在革命的時期就預先擇定平安的„航綫”和沒有危險的„極端反对党”的道路，——那就最好讓他暫時離開社会民主派的工作，讓他坐待革命的結束，等到„紀念日”的時期過去，日常工作重新開始，而他那種不適用的政策不会成為這樣討厭，這樣曉呶的曲解工人階級任務時，再來不遲。

領導全体民衆，特别是領導農民，——為完滿的自由而战，為徹底的民主革命而战，為共和政体而战！領導一切勞苦群衆和被剝削的群衆，——為社会主义而战！這就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在事實上應有的政策，也就是革命時期中，應當貫徹並籠罩工人階級政党所有策略問題決議案及其一切步驟的階級口號。

書後

——還有一次„解放"派就還有一次新„火星"派——

„解放"報的第七一期至七二期和„火星報"的第一〇二期至一〇三期对於我们在本書第八節所分析的问題又貢献了一些新的材料。我们現在沒有可能来詳细研究这許多材料，只得就其中幾個最重要的问題来分析一分析：第一，„解放"報所称贊的社会民主派中底„現实主义"（РЕАЛИЗМ）究竟是一種什么樣色的„現实主义"，為什么„解放"報要称贊它；第二，革命與專政两観念的相互関系。

※
※ ※

第一節 為什么自由資産階級的現实家要贊美社会民主派的„現实家"？

„俄国社会民主派的分裂"與„健全思想的凱旋"这两篇文章（見„解放"報第七十二期）是代表自由資産階級的人们对于社会民主派所發表的言論，这種言論对于有覺悟的無産者是很有價值的。可惜不能介紹給每一個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去源々本々地認識这两篇文章，且对于其中的一字一語都加以考慮。現在且先将这两篇文章中的要点摘録如下。

„解放”報說：

„外間之觀察者，很难得悉使社会民主党分成两派之争論中，究竟其实际政治意义何在。人们对„多数派”與„少数派”之定义，以為此二者之不同，在于前者是比較急進的，徑往直前的，而後者則為於事有益起見，認為可有幾許之妥協。此種定义，不能認為完全正確，且無論如何，亦不能認它能總括情形之各方面。至少，馬克思主义的傳統教條在少数派方面比之于在列寧派方面恐怕要精明得多。故此，若為如下之觀察，实較為正確。„多数派”之根本政治傾向是一種抽象的革命論，是一種暴徒思想，不拘於或種方法，只要達到鼓起民眾暴動且代農民眾從速取得政权之目的為是；這種傾向很使„列寧派”接近于社会革命派，且使其階級鬥争的思想為識圍全民革命的思想所蒙蔽；列寧派一方面在实踐上抛棄了社会民主思想的許多狹隘之点，另方面，却犯了革命論之狹隘病，除準備速起暴動外，其他一切实际工作均為他们所拒絕。公開與半公開之各種鼓動形式，以及與其他反政府派别于实际有益之各種妥協，亦均為他们原則上所輕視而不採用。反之，少数派能堅守馬克思主义之教條，且同時又能保持着馬克思主义世界观裏面的現世的原則。此派之根本思想，即在于以„無產階級”之利益與資產階級之利益相对立。但另方面，無產階級鬥争之

举行——当然在社会民主派教条所許可的相当範圍之内——必須实际而確当，且此種鬥爭之所有具体条件及任務亦都須明白瞭解。此两派别，对于自己根本現点之实行，都不完全徹底，因其于自己政治思想之創造上均為社会民主主义教条中之嚴厲公式所縛束；“列寧派”為此種公式所障碍，致不能如少数社会革命派一様，成為公然直接的暴徒，“火星”派為此種公式所障碍，致不能成為工人階級現在政治運動之实际指導者”。

“解放”報的作者，以下便把幾個重要決議案的内容都举出来，并以具体的批評来說明自己对于这些決議案的一般的“意見”。他說：

“对于武裝暴動的問題，少数派臨時大会的態度與第三次大会態度完全不同”。“因对于武裝暴動的態度不同，故関于臨時政府的決議案亦各異”。“对于職工联合会的関系問題，也有同樣意見上的分歧。“列寧派”在自己的許多決議案中，関于这個組織工人階級及其政治訓練之最重要的出发点，甚致一語不提。反之，少数派関于这問題曾有一很嚴重的決議案”。对于自由派的関系問題，似乎多数派與少数派的意見一致，但是第三次大会“差不多字字都是剿寫着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普列漢諾夫的決議案，而推翻了同一大会所通过的斯特藘威的（对自由派傾向較好的）決議案”。関于農民運動的問題，大会

和臨時大会的決議案事實上大概相同，但„多數派較注重以革命的方法讓取地主等々的土地一說，而少数派則想以國家和行政上的民主主义的改良一些要求来作為鼓動工作的基礎”。

還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解放”報從„火星”報第日期举引一個少數派的決議案出来，其中的一段說：„因現時僅只一個秘密工作，不能保証群衆充分的参加党的生活，且有時还使群衆與本党（秘密的組織）对立，故本党必須把職工联合会的鬥爭拿到自己手裏，且在公開的原則上由工人们實行之，同時，必須熱篤的使这種鬥爭與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務發生密切的連系”。„解放”報関于这个決議案欣然地說：„我们很熱烈地欢迎这个決議案，因為它是健全思想的凱旋，是社会民主党中某一部份分子之策略上的光明”。

讀者現在对于„解放”報諸重要的論斷，可一目瞭然了。從適合於客觀的事實與否一点來看，若認為这些論斷是对的，自然是絕大的錯誤。這些論斷中的錯誤，每一個社会民主主义者都能到处易容發現。若忽視这些論斷是徹頭徹尾的体現着自由資產階級的利益及其觀点，是徹頭徹尾的帶着这種傾向，——那也未免太無政治常識。这些論斷之反映社会民主派的見解，猶之和凸面鏡或凹面鏡反映着某種物件一樣的可笑。但是若忘了資產階級的这些曲解的論斷終畢竟还是反映着真々資產階級的利益，——那就要鑄成更大的錯誤，因資產階級是一個

階級，社会民主派內部的那些傾向是于它有利益的，與它親近的，與它心々相僡的，再，那些傾向是于它有害的，與它遠隔不相親的，為它所嫌惡的，——它对于這些，自然都有正確的瞭解。同時，資產階級的哲学家也好，資產階級的政論家也好，無論对于少数派的社会民主派或多數派的社会民主派，任何時候也不能正確瞭解的。可是任何稍具聰明的政論家，他總不会為其階級的根性所愚弄，且社会民主派內部各種派別对于資產階級之意义，他固然描寫地不对，但在实質上，他總能領会得正確。所以，我們階級敵人之階級根性及其階級的論斷，時々值得每一個有覺悟的無產者最大的注意。

俄國資產階級的本性經着解放派的口，告訴我們些什么呢？

它对於新„火星”派的傾向，十分肯定的表示自己的滿意，稱贊新„火星”派的現实主义及其理論上的確当，健全思想的凱旋，決議案的嚴重，策略上的光明……，——而对于第三次大会的傾向都表示不滿意，貫稱它為狭隘革命論，暴徒思想，說它不該否認于实行有益的各種妥協等語。我們的出版物中，曾經幾次根據很精確的材料証明說：新„火星”派是俄國社会民主派中的机会主义派，而其敵人則為俄國社会民主派中的革命派，現在資產階級的根性，恰把這話暗示資產階級自己了。自由主义者不能不同情于新„火星”派的傾向，而非難第三次大会派的傾向。自由主义者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家，

他们很知道工人階級的„实际，確当，嚴重”是有利于資產階級的，因为工人階級的这種傾向，就是实际上拿資本主义，改良主义和工会鬥爭等々的範圍来限制自己的行为。他们又很知道，無產階級的„狹隘的革命論”及其为着自身的階級任務，在俄国全民革命中得到指導作用是对于資產階級有危險的。

„現去主义”一名詞的意义，在解放派看起來的確是如此，——要証明这，只要看前此„解放”報及斯脫盧威先生对于这一名詞的運用就夠了。連„火星”報自己也曾經不能不承認„解放”派所謂„現去主义”的這種意义。試一回想„火星”報第七三——七四期附錄中„什么時節！”一文吧。這篇文章的作者（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上表示各種搖擺意見最激烈的一人）简直这樣說：„亞坝坦夫在大会上的作用，與其說是机会主义的真正代表者，寧可說是机会主义的一種象徵”。„火星”報的编輯部为更正„什么時節！”作者的說話，不得不馬上在附註中作如下之申明：

„我们对这個意见不能同意。在亞坝坦夫同志对于党綱的見解中，明白的表示着机会主义的傾向，這連„解放”報的記者都承認的——該記者在最近„解放”報某期中說，亞坝坦夫同志現在接近於„現去主义的”（請讀为„修正主义”的）傾向”。

这樣，„火星”報自己很知道，解放派的„現去主义”就是机会主义，而不是什么別的東西。如果現

在„火星”報揭露„自由派的現实主义”（見„火星”報第百〇二期）的时候，関於自由派前此曾怎樣賛美„火星”報的現实主义的事一句話都不提及，那這只是因為這樣的賛美，也之於任何非難和責罵都要來得傷心刺骨。這樣的賛美（已里為„解放”報不是偶然且不是第一次所表示的賛美），事实上証明自由派的現实主义與社会民主派的„現实主义”（請讀為　机会主义）傾向是有一種同性的緣分在，且這種„現实主义”的傾向，因新„火星”派全部策略原理的錯誤，是充滿着他们（新„火星”派）整個決議案的。

事实上，現在俄國的資產階級已經显露出它在„全民”革命中的不徹底的性質和其自私自利的性質了。顯現於...的言論，大批自由派報紙的内容和傾向，大批那那派，智識分子；以及其他站在托魯別茨基（Трубецкой）卜托龍凱維奇（Петрункевич）拉吉謝夫（Радищев）等方面的一流人政治活動的性質，——這些都把資產階級不徹底和自私自利的性質显露出來了。資產階級当然不能处处精確的瞭解，但就一般而言，因其階級條性的衝動，它很能領会：一方面，無產階級和„民衆”对于它的革命是有利的，因為可用他們來当砲灰，当反对專制的攻城器，但另方面，如果無產階級和革命的農民对„專制徹底的勝利”，且將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行到底，那末，這樣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对于它是十分危險的。因此，資產階級竭全力要使無產階級

在革命中只抱着„謙恭”的作用，要使無産階級格外精当些，格外实际些，格外現实些，要使它的行為拿这樣一個原則為標準，就是：„不要使資産階級離開革命”。

資産階級的智識份子，很知道工人運動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并不反对工人運動，并不反对無産階級的階級鬥争，他们甚且还大吹罷工自由，高唱文明的階級鬥争，不过同時是拿着布連塘（БРЕНТАНОВ）與洞舒洛夫（Гирш-Дункеров）的观点来認識工人運動和階級鬥争的。换句話説，只要工人们能放棄„暴徒的思想”，放棄„狹隘的革命观”，不要仇視„於实际有益的各種妥協”，不要企圖对於„俄国的全民革命”予以自己階級鬥争的影响，予以無産階級澈底鬥争的影响，放棄無産階級的堅决手段，放棄„平民式的甲可賓主义”，——只要工人们能夠这樣，那他们对于工人们的罷工自由，結社自由是準備„讓步”的（实际上，工人们差不多已经自己争得这種自由了）。因此，俄国資産階級的智識份子，到处千方百計（如書籍，研究班，講演和討論等々），竭力要使工人们对於（資産階級的）確当説，（自由主义的）实际論，（机会主义的）現实观，（布連塘的）階級鬥争説，（洞舒洛夫的）職工联合会説等々都能吸收到自己腦子裏。尤其是後面这两個口号对于資産階級的„立憲民主党”或„解放党”特别方便，因為就表面上看起来，这两個口号是與馬克思主义的口号相同的，因為稍許不留心和稍許加以曲解，都可使这

兩個口号與社会民主派的口号混為一談，有時候簡直可認為是社会民主派的口号。譬如公開出版的„黎明”報（關於它，我们將與„無產者”的讀者另作詳細的討論）關於階級鬥爭，關於資產階級欺騙無產階級的可能，關于工人運動，関于無產階級的自動性等々，常々說出这様„勇敢”的話來，致使不留心的讀者和程度不高的工人，莫辯青红皂白，容易認作是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而在事实上呢，这是一種資產階級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假冒，是階級鬥爭一觀念底機会主义的曲解。

資產階級的这個大把戲（按它对群眾的影响範而言），其根本上的傾向，是要使工人運動偏重於職工運動，使它遠々離開自己單独的政策（即向民主專政走出的革命的政策），„使工人们的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為階級鬥爭的思想所蒙蔽”。

讀者看到这裏，知道我们已把„解放”報的說話頭尾倒置过来了（上面引証中，„解放”報曾說列寧派„使其階級鬥爭的思想為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所蒙蔽”。——譯者）。这句說話，很能表示对于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之作用的兩個態度，即資產階級的態度與社会民主派的態度。資產階級想要無產階級只作職工運動，且藉此„就使無產階級的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為階級鬥爭的思想（布連塔諾的思想）所蒙蔽”，——这完全與„我的信仰”（„КРЕДО”）的著者伯恩斯坦派曾以„純粹工人運動”的思想来蒙蔽工人们政治鬥爭的思想

一様。社会民主派則反之，它要使無産階級的階級鬥爭發展到在俄国全民革命中佔得領導的地位，即要使这個革命達到工農的民主專政。

資產階級对無產階級說，我们的革命是一個全民的革命。—因此，你既是一個特殊的階級，就應該只限于自己的階級鬥爭，—應該為着„健全的思想"，把自己的注意自光移轉到職工聯合会及其組織的公開，—應該把这些職工聯合会認為是„自身政治訓練和組織之最重要的出發点"，——應該在革命的時候期，像新„火星"派一樣，起草些„嚴重的"決議案，—應該对„对自由派傾向較好的"決議案表示愛惜，—應該选擇的首領，要是有„成為工人階級現在政治運動实际領導人材"傾向的首領，—應該„保持馬克思主义世界观裏面的現在的原則"(若是你很可惜，傳染了这個„非科學的"教条之„嚴厲的公式")。

社会民主派对無產階級說，我们的革命是一個全民的革命。—因此，你既是一個最先進且唯一能革命到底的階級，你就應該对于这個革命不僅祗作最努力的參加，而且要領導它。因此，你的行為就應該不僅祗陷於狹义的階級鬥爭的範圍，偏重於工会運動，而要設法將自己階級鬥爭的範圍及其意义擴大到不僅祗能包括現在俄国全民德謨克拉西革命所有一切的責任，而且要擴大到能包括將來社会革命的責任。因此，你对於職工運動固不應該輕視，对于公開活動的半点可能固都應利用，

但同時，你應該在革命的時期，把武裝暴動和組織革命軍的任務看作是自己的首要任務，因这是民衆对專制完全勝利和取得民主共和政体及真正政治自由之唯一的道路。

致新„火星”派的决議案，以其„路线之錯誤，对于这問題所持的態度是如何的不澈底，如何的流產，如何的為資產階級所同情，这裏用不着多說了。

第二節　馬丁諾夫同志又来„深解”問題

現在且来看々馬丁諾夫在„火星”報第百零二期和百零三期所發表的文章。馬丁諾夫在自己的文章中，想要証明我们從馬克思和恩格思著作中所引出来的許多說話解釋得不正確，而他自己的解釋却正確，—对于这種企圖，我们在这裏当然不能答復。这種企圖是值不得注意的，馬丁諾夫的詭猾是很明显的，问題对于我们是已經很清楚的，若再把它提起来說，当然沒有趣味。凡是有思想的讀者，都能容易看出馬丁諾夫对于全部问題退讓的詭猾，尤其是在„無產者”編輯社現時正在準備的譯稿——恩格思之„巴枯寧派的工作”（„Бакунисты за работой”）和一千八百五十年三月馬克思之„共產主义者大同盟幹事会宣言”（„Обращение Правления Союза Коммунистов”）出版時，更容易看出这種詭猾。現為使讀者明白馬丁諾夫的退讓思想，只要從他的論文中舉出一個証據就夠了。

馬丁諾夫在„火星"報第百零三期說：„„火星"報是承認建立臨時政府為革命發展的許多可能和有利的道路中之一條道路，而否認社会民主派參加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之有利，其理由，就在為將來完全掌握那個國家的機器，以便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換句話說：„火星"報現在已承認前此畏懼革命政府要對于國庫與銀行負責的謬誤，已承認前此畏懼奪取„監獄"等到自己手裏來的危險和不可能之荒謬。但是„火星"報的糊塗還和以前一樣，它把民主主义的專政和社会主义的專政混為一談。馬丁諾夫要掩護自己的退却，這種混亂簡直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新„火星"報的糊塗蟲中，馬丁諾夫是一位頭等的糊塗角色，也可說是一位特殊的糊塗角色。当他把問題弄不清楚，而竭尽氣力以求„深化"這問題的時候，他差不多每一次都„想出"一些新的語句來，而這些新的語句很能把馬丁諾夫所持態度的全部虛偽都告訴我们。試一回想他在統一以前經濟派時是如何„深化"了普列漢諾夫的意見吧，他曾經創造一個語句說：„與業主和政府作經濟鬥爭"。我们從經濟派所有的作品中，很難找出比這更能表示經濟派一傾向全部虛偽的語句。現在也是這樣。馬丁諾夫很熱烈的為新„火星"報服務，且当他每次說話的時候，差不多次次都貢献我们一些新材料以估計新„火星"報所持態度的虛偽。他在„火星"報第百零二期中說，列寧無形中把專政和革命的兩個觀念

交相替用了"。

實質上，所有新"火星"派对于我们的非難都可歸納到这一点。对於这種非難，我们是如何的感激馬丁諾夫呀！当他給我们以这様非難的語句的时候，对于我们與新"火星"派的鬥爭是予以如何大的幫助呀！我们簡直要請"火星"社多把馬丁諾夫拿出来反对我们，以便能对"無產者"作"深一層"的攻擊，以便能把这些攻擊的背景拿"自然原則"的語句表現出来。因為馬丁諾夫愈就原則来討論問題，他愈出醜，且愈將新"火星"派的錯誤表示得透徹，对于自己和自己朋友所給的教訓愈有益处：使新"火星"的原則一直達到無稽荒謬為止。

"前進"報與"無產者"是把革命和專政的兩個觀念"交相替用"的。"火星"報不要这樣"交相替用"。正是这様的，最尊敬的馬丁諾夫同志！你無意中把一個大的真理說出来了。你用一句新語句，把我们所說的話証实了，就是我们曾說"火星"報跟着革命的尾巴後面跑，它对於革命任务的規定，是傾向着解放派的观点，而"前進"報與"無產者"所提出的口号，是領導民主革命前進的口号。

馬丁諾夫同志，你不明白这個意思嗎？因為問題重要的原故，我们且来費点氣力，对你作番解釋。

民主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性質，除上述各節中的分析外，还表現于下一点，就是有許多社会的階級和評价，虽然是完全站在承認私有財產和商品經濟的基礎上說話

的，是不能超越這種基礎的範圍的，但客觀的条件，使他们不得不承認專制政府和整全部農奴制之無用，而傾向于自由的要求。同時，為„社会”所要求且為地主和資本家口頭（也只有口頭）所擁護的這個自由，其資產階級性質的暴露，已一天天明顯了。為自由而战的工人階級的鬥爭與資產階級的鬥爭，無產階級的民主主义與自由派的民主主义，其間根本上的分别，也一天天瞭然了。工人階級和其有覺悟的代表者自己前進，且把这個鬥爭推往前進，它在这時候，匪但不害怕把这個鬥爭实行到底，而且竭力要把这個鬥爭推得比民主革命的最澈底还要澈底。資產階级是不澈底的，是自私自利的，它採取自由的口号是不完全的，是带着假面具的。資產階級於两個陣地（專制政府與無產階級）之間，能適應潮流之轉变，要左則左，要右則右，不断的調和，不断的妥協，以千方百計改变的自己態度和口号，因此，要以特别標識，特殊„条文”（如斯達洛維尔或臨時大会派決議案中所提条文之類）来畫出一定的界限，以為到了某田步自由的朋友——資產階級便開始帶假面具，或到了某田步，自由的朋友——資產階級便開始出賣自由，那是然是沒有効果的。無產階級民主主义的任務，不在乎想出这種死笨的„条文”来畫出一定的界限，而在乎熱烈批評現時正在發展的政治局面，在乎暴露與日俱新且為我们所預先見不到的資產階級之畏退和叛变。

試一回想以前斯脫蘆威先生在公開出版物中的論文，

以及社会民主派與他作战的歷史，你们便可明顯地看出無產階級民主主义的擁護者——社会民主派对于这種任務是怎樣实现的。解放先生是從一個纯粹謝波夫派的口号開始的，即所謂"地方自治與鄉紳会議的权力"（Права и властное земство）。社会民主派曾揭露過他的假面具，且把他推入一定的憲法綱領。当这種"推促"因革命行程特别迅速而得有势力的時候，他们的鬥争便集中到了第二個問題，即不僅止要求一般的憲法，而一定要求得不記名投票的普遍平等直接選舉权。当"敵人"的这一新陣地也為我们所"佔領"的時候（即解放联合会採取普選選舉权口号的時候），我们便再往前進，指明两院制的假面具和虚偽，指明解放派承認普選選舉权的不完全，且根究他们的君主思想，指明他们那種民主主义的妥協性質，換句話說，即指明解放派這批英雄是以俄国大革命業的利益在那裏作買賣。

專制政府的頑固，国內戰争的大進步，君主派之陷困於絕境，這些情形，使最滑頭的頭腦，也要覺醒起来了。革命已是一個事实。現在說革命，已經不要求先就為革命党人。專制政府之破產，已是人所共見的事了。一位自由主义者（格雷德斯古 Гредескул）在公開的出版物中說，实际上，這個政府已經無人服從了，——這話却是很公平的。現在專制政府表面上似很强固，实际上，只是一個紙老虎；革命的發展，簡直把这個要死的寄生物抛在一边了。自由主义的資產階級份子，已

不得不把自己的行為（或正確点說：把自己的買賣行為）建築在事实上已經形成的社会関系上，而開始走到承認革命之必要。他們其所以如此，不是因為他們是革命党人的原故，而是因為他們非革命党人。他們其所以如此，是不得不已的，是違背自己的志願的，是懷着嫉忌的心臟看往革命進步的，是咒罵着專制政府不該革命的，因專制政府不想妥協，而願為生死存亡之奮鬥。他們的生性是如此，仇視鬥爭，又仇視革命，但是環境逼得他們走到革命的立場上去，因為現在找不出其他立場的原故。

我們現在好像看滑稽戲劇一樣，带假面具的資産階級自由主义者公然企圖着起革命的礼服来了。解放派（請你們这批老爺們慢点開玩笑吧！）公然開始代表革命說話了！解放派公然開始向人們說，他們„不怕革命了"（解放"第七十二期中斯腊警藥的言論）!!! 解放派公然表示自己„要当革命的首領了"!!!

这種特殊現象，不但表示資産階級自由主义之進步，而尤表示革命運動之真正的發展，因这個革命運動已使人們不得不承認它自己了。現在連資産階級亦開始覺得站到革命方向之有益。但是另方面，这種現象是証明革命運動正在發展到較高的階段，因之我們目前也有一些較新和較高的任務發生。資産階級之承認革命，不管其其個思想家個人的意識如何，但總不会是誠心誠意的。在現在革命運動轉变到較高階段的時候，資産階級亦必

然表現其自私自利，不澈底和反動的狡猾行為出来。故此，為着我们的党綱，為着我们党綱的發展我们應当把最近革命的具体任务另行審定。昨天夠用的口号，今天已不夠用了。譬如我们昨天的第一個民主主义口号是要求承認革命，現在都不夠了。革命这件事实，甚致使斯脫盧威先生也不得不对它承認了。這個革命底急不容緩的任務，其内容的本身如何，現在的局面，要求先進階級有確當的說明。斯脫盧威等一流人物雖然承認了革命，但他们馬上就張洋着自己驢子式的耳，又在那裏唱旧調，說什么和平了结的可能，以及尼古拉号召解放派去掌握政权等々的話。解放派这流人物之承認革命，為的是要更無危險的埋葬革命，出賣革命。我们現在要作的事，是要告訴無產階級與民衆，僅只„革命”一口号是不夠的，應当把革命内容的本身精確了当，毫無二可，澈底堅決的表示出来；而能作这種表示，且能正確說明革命之„澈底勝利”者，又只有这樣一個口号，就是„工農的民主主义專政”。

我们已經說明，在民主主义的承認一問題上，解放派已步步升高了（自然不無社会民主派推進之影响）。我们開始與他们的爭論是：謝波夫的計畫（地方自治與鄉紳会議的权力）还是立憲？後来：有限制的選举制，还是普選制？再後：承認革命，还是與專制分贜妥協？現在是：承認革命而不承認工農專政，还是承認民主革命中工農專政的要求？解放派（無論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左

派中之那一派：現在的解放派或其後起者）很有可能延前進一步，就是時候一到（也許在馬丁諾夫同志再前進一步的時候），他们也承認專政的口号。若是俄国革命大踏步的前進，一直達到堅決的勝利，那當宜必然將承認。那時候社会民主派的態度又將如何呢？現時革命的完全勝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終結，也就是社会革命堅決鬥争的開始。实現現在農民的要求，完全压倒反動势力，取得民主共和政体，——这就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甚致連小資產階級，——譯者）革命性之終結，也就是無產階級真正為社会主义而鬥争之開始。民主革命愈完滿，則無產階級之新鬥争亦愈將快實，而堅決的發展。„民主主义”專政一口号，就是表示現時革命之歷史的联系性，且表示站在新制度的基礎上為完全解放工人階級，推翻一切压迫和剥削，实行新鬥争之必要。換句話說：当民主主义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再向前進一步的時候，不僅止革命成為事实，而革命完全勝利亦成為事实的時候，——这時候，我们要把無產階級社会主义專政的口号（即社会革命的口号）來„代替”（也許那時候的馬丁諾夫派还要悲惨伤痛叫）民主主义專政的口号。

第三節　資產階級对于專政的鄙陋見識與馬克思对於專政的觀点。

梅林格曾將馬克思於一八四八年在„新萊茵報”上所發表的文章重新出版，并加以附註，謂資產階級的出

版物上曾对該報有一度的非難，就是說„新萊茵報”似乎曾經要求„速即实行專政，作為实現德謨克拉西的唯一的方法”（見馬克思，昂格思全集第三卷，第五三頁）。以資產階級庸俗的鄙陋觀点来觀察問題，則專政的觀念與德謨克拉西的觀念是不能相提并論的，是彼此不相容納的。資產階級的份子不懂得階級鬥爭的理論，看慣了政治舞台上資產階級各種朋党和会社之小自由和自治，以為專政的意思，就是取消一切自由和德謨克拉西的保証，就是各種自作自為，就是為着個人的、推克退托）而濫用政权。实質上，我们那位馬丁諾夫就犯了資產階級庸俗的鄙陋觀点，因為他在新„火星”報自己的論文結論中說，„前進”與„無產者”之堅持着„專政”的口号，是因為列寧„苦心願一嘗幸福”（見„火星”報第百零三期第三頁）。為使馬丁諾夫明白階級專政與個人專政的分別，以及民主主义專政的任務與社会主义專政的不同，我们若把新„萊茵報”的觀点拿来分析一分析，是不無裨益的。

一八四八年九月十四号的„新萊茵報”說：„革命後一切臨時的組織國家都需要專政，且要強有力的專政。我们从最初起就責備干加仁（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後的内閣總長），說他未按專政的手段行事，說他未馬上打破旧機関的殘餘。当干加仁先生在那裏作憲法夢的時候，已被擊破的政党（即反動党）已得在官僚和軍隊中鞏固自己的地位，敢于在各地開始公開的鬥爭。”

梅林格說，这幾句話中，曾把„新萊茵報”論干加仁的内閣一篇長文的内容簡畧重述出来。馬克思的这幾句話告訴我们什么呢？这幾句話告訴我们說，臨時革命政府應該按專政的手段行事（这個原則是„火星”報所不能瞭解的包害怕„專政”的口号），这是第一；第二，這个專政的任務是在消滅旧机関的殘餘（这正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関于與反革命鬥爭決議的案中所明白指出来的一点，上面已經說諸过）；第三，馬克思罵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者，說他们都在革命和公開的国内战爭時期，不該作„憲法夢”。这幾句話的意思如何，可從一八四八年六月六号„新萊茵報”的一篇文章中看得特别顯明。馬克思說：„國民立憲会議首先就應該是一個積極的会議，是一個革命的積極的会議。而佛蘭克府的会議却在那裏拿着学者的態度，練習国会主义的辞令，同時讓政府行動去。我们假設这種学者的会議在長篇討議之後，能得現出一個最好的議事日程和最好的憲法出来。但德国政府已經把刀鎗来作議事日程了，試问在这時候，從那個最好的議事日程和最好的憲法能發生什么効力？”

这就是„專政”一口号的意思。我们由此可知，若馬克思能看見新„火星”派請„組織立憲大会的決議”為澈底勝利，或宣告„持極端革命之反对政府党的態度”等々決議案，其態度將如何了！

民衆的偉大问题，只有拿力量才能解決。反動階級

自己總是首先採用武力，採取國內战爭的手段，„把刀鎗作為議事日程”，從一月九号起至現在，俄國的專制政府就是到处有系統的這樣作法。時局既已如此，刀鎗既已真正成為政治議事日程的首要问題，暴動既已成為必須且急不容緩的事，——那么，憲法夢和以学者的態度去練習國会主义的辞令，就都要成為資產階級出賣革命的掩蓋物，都要成為資產階級怎樣„离開”革命的掩蓋物。真正革命的階級，这時候就應該提出專政的口号来。

关于这個專政的任务问題，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述說过：„國民会議應該以專政的手段去对付已被淘汰的政府的反動陰謀，那時候，它才能在民衆意見中取得一个能夠破壞一切刀鎗的力量。……否則這種会議只是拿些寂寞的辞令来疲困德國的民衆，不能吸引民衆，也不能被民衆所吸引”。按馬克思的意思，國民会議本應該„把德國当時实际上存在的制度中一切與民主原則（ПРИНЦИП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НАРОДА）相矛盾的都肅清”，而後鞏固这个國民会議所托足的革命基礎，保証革命所取得的民主，不受一切攻擊的危險”。

故按內容来說，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对于革命政府所提出的一些任務，首先就是歸結到民主主义的革命一点：防止反革命，一切與民主原則相矛盾的都实际上肅清。这不是别的办法，就是革命的民主主义專政。

現在且再往下看：按馬克思的意見，那些階級能夠而且應当实現这些任務（实行民主原則到底，擊破反革

命的一切進攻)？馬克思說„民衆”。但是我们知道，馬克思曾經很激烈的反对小資産階級関于„民衆”一致和民衆内部無階級鬥争的妄想。当馬克思運用„民衆”二字的時候，他并未拿这一籠统的名詞来抹殺了階級的分别，而只是把能夠革命到底的一定的分子 聯合并称罷了。

„新萊茵報”說：柏林無産階級于三月十八号勝利之後，革命的結果可分兩方面說：„一方面——民衆武裝，集会权，实际上已獲得民主的政治，另方面——君主制的保存和康加仁及干節曼内閣的成立，即大資産階級政府的成立。这樣，革命得到了一個兩重性的結果，这種結果，是必然要破壞的。民衆是勝利了；他们已獲得民主主义澈底性質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統治权未移轉到民衆手裏，而落到大資産階級手裏去了。總之，革命未得实行到底。民衆曾使大資産階級的代表们得建立内閣，而这些大資産階級的代表们馬上就表示了自己的图謀，提議與旧時普魯士的貴族和官僚合作。亞尔尼(АРНИМ)康尼剌(КАНИТЦ)和史維林(ШВЕРИНГ)等都加入了内閣。

„大資産階級從最初起就是反革命的，它因害怕民衆，即害怕工人们和民主主义的資産階級，便與反動势力結成了攻守的同盟。

这樣，不僅止一紙„組織立憲大会的決議”还不夠使革命澈底勝利，甚致于这種会議事实上已經召集都还

不夠，甚致于在武装鬥爭中（柏林工人群衆于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对于軍隊的勝利）已经得到部份的勝利，都还有革命„不完成"，„不实行到底"的可能。怎樣才可使革命实行到底呢？要看直接的統治权移轉到手誰的裏，——移轉到别德龍凯维赤（ПЕТРУНКЕВИЧ）和罗基杖夫（РОДИЧЕВ　）一班人手裏去（于加仁和于節曼一流的人物），还是移轉到民衆手裏去，即工人们和民主主义的資產階级手裏去。在第一種情形之下，資產階级将獲得政权，而無產階级将得着的是„批評自由"，„持極端革命的反对政府党態度"之自由。獲得勝利後的資產階级，必馬上就與反動勢力结為同盟（設若巴得堡的工人们在街上與軍隊鬥爭的時候只能獲得部份的勝利，且使别德龍凯维赤等一班人得建立政府，那德國当時的情形必然要在俄國發生）。在第二種情形之下，有民主主义革命專政的可能，即革命完全勝利的可能。

現在还要的證明白的是，馬克思拿来與工人们一併称為民衆且以之與大資產階级对立的那个„民主主义的資產階级"，究竟是什么？

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九号„新莱茵報"所載的一篇文章对于这问題有一個明顯的回答：„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不过是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的一種騙人的模仿罷了。

„一七八九年八月四号，佔領巴西利（БАСТИЛИЯ）三星期後，法國的民衆于一日之内把一切封建的負擔都

解除了。

„一八四八年七月十一号，三月巷战後四个月，封建的負擔却把德国民衆服征了。喬尔棨（Г. ГИРКЕ）和干節曼是其中狠狽為奸的。(附註)

„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資産階级，没有一分鐘曾经抛棄过自己的同盟者——農民。它知道自己统治的基礎是在于消滅鄉村的封建関系，而造成自由的地主農民階级。

„一八四八年的德国資産階级，毫不顧良心地出賣了農民，出賣了自己的最天然的同盟者，这種同盟者是與德国資産階级骨肉相親的，德国資産階级没有他们是無力量反对貴族的。

„保存封建的权利，用着贖買（自欺）的形式来準許这些特权的存在，——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的结果就是如此。真似太山生下了一个老鼠"。

(附註) 干節曼是大資産階级政党的閣員（俄国的土盧白次基或罗基秋夫等人都配得上）。喬棨丕為干節曼内閣中的土地總長，曾起草土地问題草案書，該書本身似乎要„無報酬的" „消取封建的負擔"，但在事实上，僅把那些小而不重要的負擔取消了，而最重要的負担却是保存着或要贖買。喬尔棨这種人，如俄国的加魯柯夫（КАБЛУКОВ）曼能翼罗夫（МАНУИЛОВ），喬尔鐘斯坦（ГЕРЦЕНШТЕЙН）等都配得上（加氏為從前莫斯科大学的教授，長于统計学，為農村與实業

的專门家。曼氏——经濟学者立憲民主党，以前莫斯科大学教長，曾充一九一七年第一届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喬氏——立憲民主党，经濟学教授，為土地问題的專门家。—譯者）。这些人都想„增加農民的土地"，但又不想得罪地主。

上面这段引証，給我们四個重要的结論：（一）未完成的德国革命和已完成的法国革命的不同，是在德国資產階級不僅对一般的民主主义变了節，且对于農民也变了節。（二）造成自由的農民階級為完全实現民主革命的基礎。（三）造成这樣的階級，就是消滅封建的負擔，破壞封建——絶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四）農民為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資產階級）的„最天然的"同盟者，没有这種同盟者，資產階級是„無力量"对付反動势力的。

若把各具体的民族特点相当的加以变更，把封建制来代以農奴制，則上述各点可完全適用於一九〇五年的俄罗斯。

我们把馬克思所分析过的德国經驗中的教訓拿来考慮，為使革命堅決勝利，除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一口号外，我们不能有别的口号，这是無疑义的。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拿来與反動势力和出賣革命的資產階級相对立的„民衆"其主要的成份為無產階級和農民，这也是無疑义的。現在俄国的自由資產階級和解放派也正在出賣農民，且將出賣農民，这就是說，他们必以騙人的改良

来解决问题，而在地主和农民激战的时候，他们必跑到地主方面去。只有無産階級能在这个激战中擁護农民到底。这是同様無疑义的。俄国农民战鬥的勝利，即全部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时候，也将是民主革命的完成，且将為革命已实行到底的社会基礎，但这決还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也決还不是像小資産階級的理論家和社会革命党人所說的那種„社会化”。这是很明顯的。农民暴動的成功，民主主义革命的勝利，只是說在民主共和的基礎上社会主义真正堅决的鬥爭肅清一条大道罷了。這个鬥爭中的农民因為是一个地主階級（ЗЕМЛЕВЛАДЕЛЬЧЕСКИЙ КЛАСС），其作用與現在的資産階級為德謨克拉西而鬥爭一様，也是揺夷的，也是動揺的。如果忘記這一点，就無異忘記了社会主义，無異在無産階級的利益和責任上忘記了自己和他人。

為使馬克思于一八四八年的观点在我们的分析中完滿起見，必須指出当時德国社会民主派（或按当時的称呼，名為無産階級的共産党）與現代德国社会民主派中間的一个重要不同点。関于这问題，且把梅林格的一段話先摘錄如下：

„„新萊茵報”的登政治舞台，是一個„德謨克拉西的机関報”。該報所登載的一切論文，自有一貫的主張，不可忽視。但它直接擁護資産階級革命的利益，反对專制和封建，比較擁護無産階級的利益而反对資産階級利益要多。革命的時候，関于工人運動的特別材料在該報

上找得出来的很少，但要知道該報有一附刊，為堅利容工会（Кельнский Рабочий Союз）的特别机関報，莫尔（Молл）和沙皮尔（Шаппер）為其編輯，每週曾出版两次。固然德国工人運動的能幹人材彭尔（Стефан Борн）曾為馬克思和昂格思在巴黎和普墨鑿（Брюссель）的学生，且于一八四八年在柏林充„萊茵報"的通訊員，但無論如何，該報之少注意当時的德国工人運動，是為現在的讀者看得很顯明的。彭尔在自己的„回憶"中說，馬克思和昂格思從来沒有說出一句話来表示过自己对于他的工人組織之不滿。可是看後来昂格思的声明，使我们推想他们那時候是不滿意的，至少瞭是不滿意那種鼓動的方法。若以彭尔对于当時工人階級覺悟完全还未發達（尤其是德国）一情形所不得不作出的許多讓步（根据„共産党宣言"来观察，是完全受不起批評的一些讓步）而言，他们的不滿意是有根据的。若以彭尔所指導所擁護的鼓動工作比較的还做得有計畫而言，他们的不滿是無根据的。……馬克思和昂格思把当時工人階級最重要的任務首先※就看在尽可能的擴大資産階級革命，這在歷史上和政治上都正確，是無疑义的。……虽然如此，但是馬克思和昂格思在一八四九年四月即主張特别的工人組織，且決定参加東普魯士無産階級所籌備的工人代表大会，這个事是实証明工人運動的一点租淺的机能，如何的能夠改变了偉大思想家的意見"。

這樣，僅于一八四九年四月，即于這个革命的報紙差不多出版一年之後（„新萊茵報”是於一八四八年六月一号開始出版的），馬克思和昂格思才主張特別的工人組織！至此時為止，他们所幹的不过是一个„德謨克拉西的机關報”，是與单独的工人政党没有絲毫組織联系的机關報！这件事实（按我们現在的观察是如何奇怪的一件事实）明白的告訴我们，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與現在德國社会民主工党之間的差別，是達到如何程度。这件事实告訴我们，德國民主革命中無産階級的影响，無産階級的力量是表現的少了多少倍（因為一八四八年德国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国家不統一——都落後）。这一点，当我们考慮馬克思在这一時期（及此後不久）所發表的許多言論（關于工人階級单独組織政党的必要）時，不要忘記。馬克思僅從民主革命的經驗，差不多經時一年之久，纔得到一个实际結論，前此時候，德国的全部環境都是市侩的，小資産階級的。馬克思所得的实际結論，对于我们已經是国际社会民主派半個世記的經驗所獲，從这個經驗，我们已開始組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了。也如現在我们誰都不説到無産階級的革命報紙可存在於無産階級的社会民主党外，或使这種報紙的能够在片刻之內不过像„德蘭謨克拉西的机関報”一樣，發表言論。

但是馬克思與彭尔之間所恰々開始暴露的那種矛盾，現在在俄国比較更顯明的存在，且無産階級在俄国民主

革命一巨流中的力量愈强大，則这種矛盾的形式亦愈将擴大。梅林格推想馬克思和昂格思对于彭尔鼓動工作不滿的時候，其言辞未免太軟弱而偏袒了。其实，昂格思于一八八五年關于彭尔的事曾如这樣說过（見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cess zu Köln Zürich 序言）：

共產主义者联合会的会員，曾到处為極端民主主义運動的領導者，且証明这个联合会是革命行動的一個最好的学校。„排字工人彭尔，曾為联合会在普魯塞和巴黎二处負担工作的会員，在柏林組織了一個„工友会"（Arbeiterverbrüderung ），这個工友会組織的傳佈曾经很廣，存在至一八五十年為止。彭尔是一個聰明的少年，但是未免出馬作政治家太快了。他曾與各樣各色的鄙徒（Kreti und Plethi ）„為友"，唯一的目的是在拿攏一些人到自己的身边。他并不是一種能夠團結各種傾向為一致，使混亂成為有条理的人材。故此他的工友会的正式言論中，常々發現些不明不白的意見，把„共產党宣言"的見解常々與行会式的回憶和希望混作一塊，與路易布蘭（Луи БЛАН ）和普魯東（Пру-ДОН ）的見解混作一塊，與保商主义的擁護等々混作一塊；总之，这種人是想对人人討好處的（allen alles sein ）。他们所作的事，特別是在於提倡罷工，組織職工联合会，組織生產合作社，同時却忘記了問題首先卽在於以政治上的勝利為方法，先取得一個立场，以便能穏固的有希望的实現那些任

務。果然，当反動势力的勝利逼使得工友会的首领们也感覺得有直接参加革命鬥争的必要的時候，那知一班團結在他们週圍的無覺悟的群衆，自然把他们拋棄了。彭尔自己于一八四八年五月曾经参加过德列司顿的暴動，僥倖得免于死。工友会对於無産階級的偉大的政治運動，好像是一個特立的組織，抱着对岸观火的態度。这个組織的存在，大半只是紙上的存在，且其作用小，故反動势力僅至一八五十年才感覺得必須要封閉它，而其各分部，僅到後来好多年数才封閉。彭尔（其真名為 Buttermilsh ）到底都未得成為一個政治家，而僅成了一個瑞士的小大学教授，——他不把馬克思的著作譯成其他文字，却把貴良的列蘭（PEHAH）的著作譯成甜蜜的德文"。

这就是昂格思对于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兩個策略的估計！

我们的新„火星"派現在这樣的热心追隨着„经濟派"之後，致使君主派的資産階級誇贊他们，說他们的„光荣"。他们也把各樣各色的人们拿到自己的身边，諂媚„经濟派"，用独断式的手段，說什么„自動"，什么„民主主义"，什么„自治"。等々的口号，以吸引那些無覺悟的群衆。他们的工会也常々只是存在于新„火星"報的紙面上。他们的口号和决议案，也表現同樣的不瞭解„無産階级偉大政治運動"的任務。


7841